

**Editors in Chief**

李彤 (Li Xing),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林宏宇 (Lin Hongyu), Huaqiao University, China (for Chinese editions)

**Associate Editors**

Ane Bislev, Aalborg University

Jesper Willaing Zeuthen, Aalborg University

**Advisory Board**

Wang Qiubing, Huaqiao University

Shang Huipeng, Huaqiao University

Chen Wenshou, Huaqiao University

Wang Guanxi, Huaqiao University

Zhuang Guotu, Huaqiao University

Huang Rihan, Huaqiao University

Li Yiping, Xiamen University

You Guolong, Huaqiao University

Ye Qilin, Huaqiao University

Zhang Shengju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 Sume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 Q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ang Yang,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ng Yuan,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Wang Huanxiang, Jiaying University

Chen Hongb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Zhang Shu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ournal Manager & English Assistant Editor**

Philip Wade, Aalborg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Editor**

范强 (Fan Qiang)

**Cover Design**

黄日涵 (Huang Rihan)

**Published by**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Huaqiao University

**Distribution**

Download as PDF on [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http://www.journals.aau.dk/index.php/jcir)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CIR

美国贸易霸权及其内在逻辑  
(张馨)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and its Inherent Logic  
(Zhang Xin)

韩国外交的多边化战略  
(于婉莹)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Yu Wanying)

当前美日温馨预算谈判中日本立场分析  
(范强 邓翰东)

A Study on Japan's Standpoints for the Host Nation  
Support (HNS) (Fan Qiang & Deng Handong)

低端锁定、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东亚区域生产  
网络 (张帅)

Low-end Lock-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and the East Asia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Zhang Shuai)

新冠疫情冲击与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深化  
(李冰洁)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US Competitive China Policy (Li Bingjie)

以“复数性”为中心的世界图景——汉娜·阿伦  
特世界主义思想新探 (周毅)

The Plurality-centered Cosmopolitanism: A New Analysis  
on Hannah Arendt's Cosmopolitanism (Zhou Yi)

Aalborg University 奥尔堡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华侨大学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87-7112-078-3

ISSN: 2245-8921

2021年 Vol.9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CIR)  
(中文版)

征稿启事及来稿规范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JCIR)是由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Aalborg University –DIR)和中国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HQU–CIR)联合主办的一本学术性期刊。JCIR由丹麦奥尔堡大学出版社(Aalborg University Press)出版,国际刊号是(ISSN: 2245–8921)。本刊一年2期,分别在每年4–5月(英文版)和10–11月(中文版)出刊,有时根据需要出版1–2期中英文增刊。本刊主编为丹麦奥尔堡大学LiXing教授,副主编为中国华侨大学林宏宇教授。

本刊定位于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和紧密联系,促进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重点刊载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章,特别是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崛起的相关主题,重视在主流研究中未得到足够关注的问题和观点,鼓励富有批判力的创新性文章以及尝试发展非传统的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作者,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责任编辑:范强博士

编辑邮箱:Fanqiang3244@163.com

通讯地址:中国厦门集美大道668号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政编码:361021

联系电话:86–0592–6167148

# 目 录

美国贸易霸权及其内在逻辑.....	1
<i>张馨</i>	
韩国外交的多边化战略.....	20
<i>于婉莹</i>	
当前美日温馨预算谈判中日本立场分析.....	32
<i>范强 邓翰东</i>	
低端锁定、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44
<i>张帅</i>	
新冠疫情冲击与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深化.....	61
<i>李冰洁</i>	
以“复数性”为中心的世界图景——汉娜·阿伦特世界主义思想新探.....	74
<i>周毅</i>	

## Table of Contents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and its Inherent Logic.....1-19**

*Zhang Xin*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Republic of Korea (ROK).....20-31**

*Yu Wanying*

**A Study on Japan`s Standpoints for the Host Nation Support (HNS).....32-43**

*Fan Qiang & Deng Handong*

**Low-end Lock-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and the East Asia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44-60**

*Zhang Shuai*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US Competitive  
China Policy.....61-73**

*Li Bingjie*

**The Plurality-centered Cosmopolitanism ---A New Analysis on Hannah Arendt`s  
Cosmopolitanism.....74-88**

*Zhou Yi*

## 美国贸易霸权及其内在逻辑

张馨

**【摘要】** 在整个美国对外权力体系的分析中，美国贸易霸权长期被归于“低政治”范畴。传统体系视角对它的阐释也日益受到来自权力视角的挑战。这些原因使得美国贸易霸权在相关研究中常被当作服务于经济霸权或金融霸权的手段或载体，甚少作为国家间权力的来源或目的进行就贸易而贸易的专门性规律研究。本文立足于权力的视角，借助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关于国际贸易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先归纳出美国贸易霸权作为一支存在于特定领域内霸权力量的本质特征，再基于该本质特征搭建起了由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组成的理论框架，最后为美国贸易霸权的生成和运行提供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 美国贸易霸权； 贸易收益； 相互依赖； 市场逻辑； 国家逻辑

**【作者简介】** 张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头条3号，邮编100005，电话号码13521172605，邮箱853318586@qq.com。

##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and its Inherent Logic

Zhang Xin

**Abstract:** Among the systemic analysis of American national power, its hegemony over trade has long been categorized as a “low politics” topic. The conventional systemic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For these reasons,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is often treated as a tool or a carrier of American hegemony over economics or finance, and it is seldom treated as a source and objective of American national power, not to mention any specialized research targeting its inherent logic just for trade’s sake. By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and with the help of Albert Otto Hirschman research on the nexu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ational power,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1) identify the most distinguish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2)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market logic and state logic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found previously; 3)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

**Key words:** American Hegemony over Trade; Trade Gains; Interdependence; Market Logic; State Logic

**Author:** Zhang Xi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ail: 853318586@qq.com.

在传统分析中，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对外权力常被视作金融、安全等其他领域对外权力的辅助性力量发挥作用，较少文献就贸易而贸易地做系统性专门性的规律研究。但现实中，美国在贸易领域却频频挥舞权力大棒，迫使贸易伙伴国屈从其意志与利益。这种现象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更为明显。美国在贸易领域到底拥有着什么样的权力，为何大部分情况下总能达到目标？本文聚焦美国在贸易领域所拥有的特殊权力来源、构成及运行规律，试图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在经济领域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sup>①</sup>货币金融、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以下简称“贸易”）是支撑起美国经济霸权的三大支柱。其中，众多相关的著名论述都视美元<sup>②</sup>或者跨国公司<sup>③</sup>为美国建立和维系全球经济霸权的核心工具。至于第三大支柱——贸易，则往往在美国经济霸权的分析框架中面临三大困境。

一是被当作纯经济现象。包括贸易制裁和贸易报复在内的国家间摩擦常被视为围绕经济利益“就事论事”的常规商业“讨价还价”行为，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和结果剖析也因此常停留在经济数据和指标层面而不做深究。<sup>④</sup>

二是就算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也常被当作“次要权力结构”。<sup>⑤</sup>这样的观点认为贸易严

<sup>①</sup> 蔡一鸣：“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研究”，《经济评论》，2009年第5期，第93—102页。文中引述了1970年代至2000年代经济学界对“经济霸权国家”认定问题的主要观点与争论，所有观点均认为美国是毫无争议的经济霸权国家。

<sup>②</sup> 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本杰明·J·科恩：《货币强权》，张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sup>③</sup> 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Basic Books, 1971.

<sup>④</sup> 柳剑平、刘威：“经济制裁与贸易报复——对经济制裁内涵的再界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5期，第36—41页。

<sup>⑤</sup>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重依赖并服务于安全、金融等“主要权力结构”，<sup>①</sup>所以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强势地位较多以“经济贸易”“投资贸易”“商业贸易”“金融贸易”等跨领域复合词做模糊指代，较少就贸易而贸易进行单独深入分析。也就是说，在美国权力体系的分析中，贸易常被视作其他领域权力运行的手段或结果，而非国家权力的来源或目的。

三是哪怕假设美国在贸易领域的霸权确实存在，传统基于体系视角的论述也日益受到来自权力视角的挑战。<sup>②</sup>体系视角的观点认为，美国贸易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霸权”，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制度的建立为其成立标志，<sup>③</sup>主要表现为基于多边合作平台上的“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与控制权”。<sup>④</sup>也就是说，该回答认为多边平台是美国建立并维系贸易霸权的前提和载体，而霸权存在的意义在于维系贸易体系秩序。然而，若从权力的视角出发，这样的解释则意味着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并不足以让其他国家屈从自己的利益，所以才要借助制度工具，也就否定了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实际霸权，或者说这是一种由多边平台予以保证的“有条件”的霸权。<sup>⑤</sup>

然而，美国早已凭借其在二战后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几乎全领域的绝对优势，随战后重建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成功渗透进了大批国家的金融、法律等关键核心领域，实际上已经按照美国的意愿、参照美国的模式在世界各地树立起了国际贸易操作层面的规则和程序体系。<sup>⑥</sup>就算没有国际多边贸易平台赋予的“制度主导权”，美国也能在绝大多数对外贸易往来中占尽实际操作层面的优势，主导其他国家的贸易决策倾向，事实上的贸易霸权已然确立。

这个过程已被多位学者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描述和总结。比如，米尔斯海默从意识形态传播和观念塑造的角度将其描述为“自由主义霸权”；<sup>⑦</sup>吉尔平则在霸权周期论述中将此总结为霸权的“被认可与被赋权”过程：“它们之所以成功取得霸权地位，部分由于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一些小国，部分由于其他国家从中获益而接受了它们的领导”；<sup>⑧</sup>艾儒蔚则用丰富的案例与数据说明

<sup>①</sup> 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华尔兹与吉尔平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参见李晓、王静文：“美国经济霸权与全球经济失衡”，《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2期，第4—5页。此文中提出了“贸易国家的困境”概念，认为像中国、日本等贸易大国恰恰是美国凭美元与金融系统汲取经济霸权的来源。该文同时从美国贸易失衡角度说明贸易并非美国强势所在领域。任东波、李忠远：“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美国敲打日本的历史透视与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第88—91页。此文也提出了与“贸易国家的困境”类似的论述，亦认为美国的优势在货币与金融，不在贸易。

<sup>②</sup> 张亚斌、范子杰：“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30页。

<sup>③</sup> 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sup>④</sup> 舒建中：“美国与‘东京回合’：贸易霸权面临新挑战”，《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页；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sup>⑤</sup> 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67—76页。

<sup>⑥</sup> 强世功：“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第84—93页。

<sup>⑦</sup>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sup>⑧</sup>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页。



“美国并未采取系统化的原则或制度来推行全球化，往往通过单边政策或双边谈判来达到目的”。<sup>①</sup>

上述三大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贸易在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作为“低政治”研究对象的大体地位。然而，本文认为，如果在对美国权力体系展开分析与认知之初，便将贸易预设为“去政治化”的或者“次要”的，则会容易遗漏掉美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构建和运行规律，在类似于中美贸易战的交锋中频频被动，更容易忽视贸易在两国战略竞争中本可以发挥的作用和既有的战略空间。那么，美国在贸易领域到底有没有霸权？如果有，是什么样的？

## 二、文献回顾

回顾既有文献，针对美国贸易霸权的规律性研究普遍认可它是一种权力分布状态。但由于立足点的不同，导致大部分观点在具体的分布范围、分布特征等关键要素的认识上产生了主要以体系与权力两种视角为代表的分流。

体系视角立足于整体大环境的作用，认为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既是其贸易决策的原因，也是其贸易决策的目标。比如，在解释国家间为什么会产生贸易联系时，持这种观点的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体系内权力分布情况决定了国家对自身外部环境是否足够安全的认知判断，由此形成的安全预期决定了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意愿及其强烈程度，而对外贸易的政治目标和效果正是为了在体系内权力分布结构中争取于己有利的变化。<sup>②</sup>这类观点认为霸权就是体系内权力分配“极化”的结果，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体系与国际稳定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霸权国国力与国际冲突频数之间存在逆相关关系”。<sup>③</sup>又比如，在解释同一个问题时，持体系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则从爆发世界范围安全冲突的可能性极低这一判断出发，认为只有基于国际制度的合作才能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从而安抚贸易国不安全感、消除不信任感，开展对外贸易。<sup>④</sup>这类观点认为霸权存在的必要性体现在对国际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维护上。换言之，霸权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如果这种供给与维护的作用可以由其他力量承担，则意味着原霸权力量的衰落。虽然两种观点对于处理安全焦虑的方法有所分歧，却都关注霸权为促成国家间贸易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国际贸易秩序。

权力视角则剥离了体系视角中预设的外部环境，立足于霸权国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点对点之间“力”的相互作用，强调霸权国的施动者身份与非霸权国作为权力实施对象的身份，认为霸权是国家彼此之间权力分配的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当一个行为体施加权力的能力比第二大权力行为体更大、接

<sup>①</sup> 艾儒蔚：《资本规则：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杨培鸿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7页。

<sup>②</sup> Joanne Gowa and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2, 1993, pp.408-420.

<sup>③</sup>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14页。

<sup>④</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受其权力驱使的对象比第二大权力行为体更多的时候，它就是霸权。<sup>①</sup>由此出发，权力视角的研究多聚焦于霸权为维系其地位而对外施加权力的手段，以及国家间权力大小的比较与量度等方面。比如，有的研究围绕对“国家利益”或“利益集团利益”的认知变化，探究霸权国对非霸权国政策偏好的塑造力和引导力，这主要针对精英决策群体而言；<sup>②</sup>有的则从“国内——国际双层政治博弈”角度出发，认为霸权国对非霸权国重大国内政治事件（选举或政治对立、政策辩论等）的干涉亦将在国内政治选民中形成对霸权国的喜恶亲疏印象，从而通过换届选举、公众舆论等压力渠道将此印象反映到两国关系的政策制定中，继而对非霸权国的贸易政策倾向造成确定性影响，这主要针对普通大众而言。<sup>③</sup>有的研究则用贸易霸权的特征表现来描摹霸权国施加权力的效果：凭多边平台或双边协议诱压别国最大限度开放市场；强化国内法的单向治外法权，自身贸易政策保护色彩浓厚等。<sup>④</sup>还比如，有的研究为国家间权力大小的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衡量指标：就像每个国家的实力大小不同一样，国家满足自身发展“基本需求”所要求的力量投入大小也不一，而一个国家扣除满足基本需求之后的“余力”才是决定它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权力大小的关键因素，因为这才是真正可用于额外能力提升的建设资本；继而认为传统上普遍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代国家实力的指标选择混淆了“基本需求”与“余力”两部分；遂建议改用特指“余力”的国内生产余值（SDP, Surplus Domestic Product）作为比较国家间权力大小的指标。<sup>⑤</sup>

此外，国内学者蔡一鸣还从产权的视角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解释：“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换”；<sup>⑥</sup>贸易霸权的建立基于准霸权国对产权交易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计算取舍；<sup>⑦</sup>贸易霸权的维系则是通过调整国际产权结构，使其顺应霸权国偏好来实现的。<sup>⑧</sup>

在简要阐述了与本文持不同观点——认为美国在贸易领域不存在霸权——的文献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将贸易预设为“去政治化”的、“次要”的服务型角色），以及概述了既有对美国贸易霸权的规律性研究之后，本文从权力的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探究美国贸易霸权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sup>①</sup> Edward D. Mansfield,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732.

<sup>②</sup> Edward D. Mansfield and Diana C. Mutz, “Support for Free Trade: Self-interest, Sociotropic Politics, and Out-Group Anx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3, 2009, pp.425-457.

<sup>③</sup> Sarah Sunn Bush and Lauren Prather, “Foreign Meddling and Mass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3, 2020, pp.584-609.

<sup>④</sup> 刘晔：“经济全球化与美国贸易霸权主义”，《财金贸易》，2000年第1期，第45—46页。

<sup>⑤</sup> Therese Anders, Christopher J. Fariss and Jonathan N. Markowitz, “Bread Before Guns or Butter: Introducing Surplus Domestic Product (SDP)”,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4, 2020, pp.392-405.

<sup>⑥</sup> 蔡一鸣：“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研究”，《经济评论》，2009年第5期，第95页。

<sup>⑦</sup> 同上。原文中与本文的“贸易霸权的生成”和“贸易霸权的运行”表述分别对应的概念为“反超”和“转变”。原文用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反超”，用国际产权理论解释“转变”。“反超”将经济活动划分为生产与交易两部分。其中，对要素流动与交易的论述依然采用了产权理论，与后文的“转变”保持一致，遂作此概括。

<sup>⑧</sup> 同上，第98页。

为“美国在贸易领域到底有没有霸权？如果有，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提供补充性解释。

### 三、美国贸易霸权的本质特征

美国贸易霸权是美国在贸易领域建立的霸权。所以在探究其本质特征时亦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先把握霸权层面赋予的一般特征，再结合领域特点把握贸易霸权的具体特征。

#### （一）“霸权”层面：一般性本质特征

许多学者选择通过描述霸权的功能效果（effect）来解释“霸权”。比如，有的研究霸权与国际冲突/和平之间的因果关系，<sup>①</sup>有的研究霸权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促进/遏制作用关系等等。<sup>②</sup>虽然检验功能效果确实是识别霸权的有效途径，但它始终是霸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二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其他因素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功能效果。<sup>③</sup>所以，仅凭功能效果定义霸权本质的方法解释力有限。鉴此，本文选择回归到概念分析（concept analysis）的轨道上。

基于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的权力模型，本文对“霸权”做如下概括：第一，影响力是对权力资源的转化。权力资源在部分文献中亦称为“实力”，描述的是行为体所拥有的客观、可调配资源的总体及对该资源的获取能力，这样的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还包括知识技术、外交关系、军事安全等无形的抽象资源。而影响力则是主观、可感知的行动力。拥有资源并不等同于拥有影响力。更何况还因为国内制度等原因，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所有权力资源都能按决策者的意愿进行转化，<sup>④</sup>所以“二者之间并非确定的线性关系”。<sup>⑤</sup>第二，权力作为一种影响力，以单向威慑确保屈从为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相较于“理性说服”这种诱导认同的互动式影响力而言的。第三，霸权是能自主的权力。自主表征的是行为体在对外决策中排除外界干扰、对自我意愿的贯彻执行力。达尔认为，只有当“行动者在重大事情上对（体系内）所有其他行动者都是自主的”，<sup>⑥</sup>这些行动者才是所谓的“权力中心”和“统治集团”。自主如此重要，甚至有政治家将其视作权力的最核心标签：

<sup>①</sup>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14—126页；于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第147—150页；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65—72页。

<sup>②</sup> 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sup>③</sup> 参见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sup>④</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任琳：“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2页；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4—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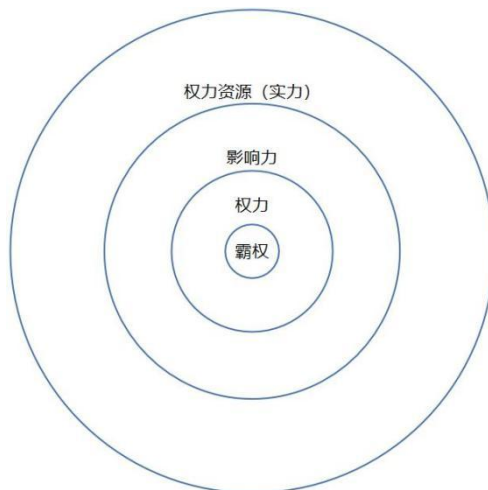
<sup>⑤</sup> 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6页。

<sup>⑥</sup> 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权力就是一种“毋需为适应变革而调整的能力”。<sup>①</sup>

总之，权力资源（实力）经过转化形成影响力；影响效果可由多种手段予以实现，当一种影响力以单向威慑或强制力为手段时，那就是权力；而只有当一种权力同时能自主，才是体系内的霸权。也就是说，自主是霸权得以区别于一般权力的重要特征（参见图1）。

图1 霸权的相关概念辨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由此可见，“霸权”的一般特征主要体现在能够对外施加的影响力和面对外来影响时贯彻自我意愿的自主权上。广义上，影响力是一种“作为原因的权力”，<sup>②</sup>即A的愿望与B的行动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此处的影响力尤以显著的强制性单向威慑手段确保实施为特点。自主权作为“影响力的逻辑补充”，<sup>③</sup>则是一种不被或者少被外界胁迫和影响的能力。

## （二）“贸易”层面：特殊性本质特征

当霸权置诸具体领域时，它的一般性本质特征又会有哪些适应性变化呢？

以体系与权力两种视角为代表的争论主要围绕权力研究的元问题展开：“在什么事情上对谁有多大的影响力”。具体可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sup>④</sup>一是事情范围（scope），指的是霸权可以施加权力的事情，体系的观点关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主导力，而权力的观点则聚焦于某特定领域内形成的国家间联系被用作外交胁迫手段的工具化。二是对象领域（domain），指的是霸权所能影响的对象

<sup>①</sup> John Burton, *System,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8-31, 转引自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sup>②</sup> 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sup>③</sup> 同上，第51页。

<sup>④</sup> “scope”和“domain”两个术语表达引自哈罗德·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王菲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对应的中文译名“范围”与“领域”引自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集合。体系的观点认为这个集合指的是一个类似依附论“中心—外围”结构的世界权力体系，不仅涵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霸权在权力分配中的“极化”地位正是源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权力的视角则常将这个集合描述为国家实力与竞争力在同一重量级的行为体范围内，主要集中在国际资本主义世界内部。<sup>①</sup>三是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程度（inequality），这是基于霸权来源于非对称权力分配的前提假设而引发的争论。体系的观点强调绝对的非对称性优势，认为由霸权提供的公共秩序将确保整个体系的总体福利随霸权自身福利的增加而增加；而权力的观点则强调相对的非对称性，认为不论总体福利或可供分配的权力总量是增加还是减少，霸权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住相对于第二大权力行为体的相对优势。<sup>②</sup>

综上，美国贸易霸权具有如下本质特征：一是在对外界施加影响时，美国的影响力效果可以由单向威慑甚至强制手段保证实现；二是在应对外来影响时，美国有保持充分抗干扰的自主能力；三是美国的贸易霸权地位主要通过保持住它相对于第二大贸易权力行为体的非对称优势确保持续，而这种非对称优势则必须同时满足上文所述对外和对内两个维度的特征。

#### 四、美国贸易霸权的生成溯源

具体就贸易权力的生成而言，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承上启下地强调了相互依赖关系中脆弱性的重要，并创造性地引入了贸易收益（gain from trade）概念，搭建起了贸易收益与贸易依赖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描摹与比较贸易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程度及随之产生的贸易权力大小更具可操作性。<sup>③</sup>基于赫希曼的理论框架，本文对美国贸易霸权内在逻辑的探究亦遵循从权力到相互依赖，再从相互依赖到贸易收益的溯源顺序展开，依次聚焦、逐层递进：相互依赖由此成为了连接贸易权力与贸易收益的转换器；而贸易收益则是决定美国贸易霸权的关键因素。（参见图2）

<sup>①</sup> Edward D. Mansfield,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732.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参见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图2 美国贸易霸权内在逻辑的生成溯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一）第一次转换：从权力溯源至相互依赖

霸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sup>①</sup>与其他权力类型一样，在众多研究其起源的文献中，常溯因于行为体之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sup>②</sup>“所谓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的行为体之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sup>③</sup>非对称相互依赖就是指依赖关系中相互作用力大小不等的状态：较易受到对方影响的行为体，对这段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也更愿意为依赖关系的维系支付代价，这种决策倾向意味着其对自主权的退让。也就是说，对处于贸易决策状态下的同一行为体而言，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与贯彻自身意志的自主程度呈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

至于这种非对称贸易关系的成因，则又有不同的解释。比如，以“贸易和平论”为代表的乐观观点就认为是区域或集团内部的经贸往来带来的经济利益形成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论是否对称，这种“以水平分工为基础、以商品货币关系维系的新相互依赖格局”始终是互利的，<sup>④</sup>互利性是相互依赖的双方维系不平等贸易关系的默契来源。而另外有的研究则认为“相互需求导致相互依赖”，<sup>⑤</sup>是对外需求的不对等造成了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所以相互依赖本质上不是互利的，而是分配配

<sup>①</sup> 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sup>②</sup> Klaus Knor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verage and Its Uses", in Klaus Knorr and Frank Trager, eds.,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7, p.102; R. Harrison Wag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p.461-483;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sup>③</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sup>④</sup> 黄苏：“区域经济集团化与相互依赖的新格局”，《世界经济》，1992年第5期，第27页。

<sup>⑤</sup> 于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第147页；卢林：“论国际相互依赖与相互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3期，第65页。



额的竞争问题。<sup>①</sup>不论哪种解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相互依赖将贸易与权力联系起来。可以说，正是因为贸易行为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产生了相互权力，所以贸易才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属性。

就贸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言，早在20世纪40年代，赫希曼就对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及相关规律做了精彩论述，明确就非对称相互依赖作为连接对外贸易与国家权力的中介变量身份做了三层阐释：一是贸易本身便具有产生相互依赖关系的天然特征，而在国际贸易行为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绝大部分都是非对称的；二是这种非对称性会被国家有意识、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从而不仅实现了国际贸易这种经济领域行为的政治化，还使这种政治化现象成为了具有可比较性质的研究对象；三是在这种关系中，不仅有更高议价权的一方可以获取影响力与统治权，甚至有较低议价权的一方也可以在互动中争取到充分战略空间以扭转劣势，形成新的动态平衡。<sup>②</sup>赫希曼的这番阐述受到了多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肯定，并被迁移至货币等其他经济领域乃至非经济领域，加以适用性修正，以解释相应领域内权力的生成问题。<sup>③</sup>

继在宏观层面明确了相互依赖承担的转换器作用之后，更需要从微观层面剖析它具体的转换机制——相互依赖自身的一体两面性：敏感性与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它立足于依赖关系中各方既有政策框架不变的假设。<sup>④</sup>而脆弱性则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sup>⑤</sup>它立足于既存政策框架变化的假设，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sup>⑥</sup>

近百年间，在关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研究中，围绕其本质（nature）、效果（effect）、度量（measurement）及其权力生成机制（mechanism）等方面的讨论一直未曾中断过。<sup>⑦</sup>在这百花齐放的背景下，以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于1980年的撰文最有代表性。该文厘清了讨论中众多交叉模糊的理论点，尤其在论述相互依赖的一体两面特征敏感性与脆弱性时，以二者为平行主线对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sup>⑧</sup>

鲍德温对相互依赖一体两面性的梳理围绕着杜瓦尔（Raymond D. Duvall）归纳的两层基础内涵

<sup>①</sup> 卢林：“论国际相互依赖与相互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3期，第66页。

<sup>②</sup>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sup>③</sup> 参见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④</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sup>⑤</sup> 同上，第14页。

<sup>⑥</sup> 同上。

<sup>⑦</sup> David A.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4, No.4, 1980, p.481.据此文回顾，相互依赖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可溯至1910年代。

<sup>⑧</sup> David A.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4, No.4, 1980, pp.471-506.



展开：一是相互间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二是基于需求（大多因为难以自足）而产生的、有赖于他者支持或受制于他者的关系。<sup>①</sup>第一层内涵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表征的是跨事件甚至跨领域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强调的是行为体可对外施加的影响力。一个行为体敏感性越高，则意味着依赖关系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就越大。代表学者包括撰写了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基欧汉与约瑟夫·奈，<sup>②</sup>以及第一个对相互依赖理论做系统论述的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sup>③</sup>基于对敏感性的强调，这些学者常重点论述国家间政策协调与国际机制的作用。第二层内涵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表征的是既定关系受损甚至断绝时将产生的机会成本，强调的是承担机会成本的能力，即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抗外来影响、贯彻自身意志的自主。一个行为体脆弱性越高，则意味着其抵御外来影响的自主性越低。代表学者包括从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日益膨胀的贸易关系中预警到了不菲政治代价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sup>④</sup>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以及撰写了名著《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的赫希曼。

通过将“霸权源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霸权”与“相互依赖”分别做进一步剖析后发现，“霸权”层面本质特征中的影响力主要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相关，自主权主要与脆弱性相关，且各自在两个互为补充的维度上演进。（参见表1）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机制，相互依赖承担了贸易与权力之间转换器的功能，实现了从权力层次至相互依赖层次的溯源转换。

## （二）第二次转换：从相互依赖溯源至贸易收益

赫希曼在对贸易权力的溯源研究中，从相互贸易依赖关系里提炼出了他认为最具主导作用的因素——脆弱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贸易收益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分析中，贸易收益这个概念并非赫希曼首先提出。不过在赫希曼之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用贸易收益去解释两个原本并未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间发生贸易行为的原因。这样的解释通常基于对国家自给自足状态的前提假设之上，强调的是国家因贸易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增量。而赫希曼在引入这一经典概念时，假设的研究对象则是业已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通常会在贸易往来中对贸易伙伴国形成需求依赖，难以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这样一来，贸易收益涵盖的就不仅是利益的增量部分了，更强调贸易关系受损或中断时贸易国面临的成本损量。就是这样，赫希曼借助机会成本的概念，不仅将非对称贸易依赖的研究聚焦到了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上，甚至直接就将贸易收益定义为了脆弱性

<sup>①</sup> Raymond D. Duval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ia Theory: Notes toward Precision of Concept and Argu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1, 1978, pp.51-78.

<sup>②</sup>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sup>③</sup> 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sup>④</sup>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73.

内涵中的机会成本，<sup>①</sup>赋予了贸易收益以指代和衡量非对称贸易依赖的工具属性。鲍德温也对这样的界定给予了肯定：“贸易收益与既有贸易关系受损或中断时产生的机会成本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介变量的相互依赖在第二次转换中实现了隐身。

需要说明的是，赫希曼提出具有指代机会成本功能的贸易收益并非是对贸易收益传统意义的否定，而是有益的逻辑补充。为作区分，他将传统意义上强调利益增量的贸易收益定义为“客观贸易收益”，将自己提出的强调成本损量的贸易收益定义为“主观贸易收益”。客观贸易收益与主观贸易收益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从利益与成本两个维度共同组成了贸易收益的整体。

此外，赫希曼还在自己关于国际贸易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中纳入了这两种意义的贸易收益：客观贸易收益立足于国家自身的资源要素禀赋，它的多少主要受国际大分工与市场需求情况等客观因素限制，它的变化直接决定了贸易关系在本国贸易决策中的分量，也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而主观贸易收益则立足于可供解危纾困的国家间关系，它的多少主要受可替代选项集合弹性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它的变化将直接决定贸易关系破裂带来的可预见成本，也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由这微观层面的决定机制出发，贸易依赖关系源于贸易收益，遂完成了第二次溯源转换。

通过将贸易收益按照赫希曼的理论框架做进一步剖析后发现，贸易霸权在“贸易”层面的本质特征——“在什么事情上对谁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力”——三要素也在这次转换中有所对应：客观贸易收益对应着贸易霸权可对外施加影响力的事情范围（scope），主观贸易收益对应着贸易霸权可对外施加影响力的对象领域（domain），由这两种贸易收益形成的非对称贸易依赖关系则对应着贸易霸权所占有的非对称贸易权力优势（inequality）。

### （三）基于两次转换的美国贸易霸权内在逻辑

基于上述两次转换，美国贸易霸权内部的两条逻辑主线呼之欲出：客观贸易收益决定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继而形成对外界的影响力，这是第一条逻辑主线；主观贸易收益决定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继而形成应对外来影响的自主权，这是第二条逻辑主线。（参见图2）所以，贸易收益是美国贸易霸权最核心的变量。第一条主线强调的是国家对外施加影响力的范围，要素流动的边界越模糊，要素交换成本越低，能影响的贸易内容与贸易伙伴范围也就越大。这种通过“模糊边界”实现利益增量的思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逻辑”相呼应。第二条主线则强调的是边界赋予

<sup>①</sup>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8.

<sup>②</sup> David A.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4, No.4, 1980, p.489.

国家关于贸易内容与贸易伙伴的自主选择权，敌我亲疏边界越清晰，当遭遇因国家间关系而导致的外来冲击时，由备选方案支撑起来的缓冲力与危机管控能力就越稳定，面临风险时所需承担的成本也就越可控，越有利于提高对要素流动的管控力。这种通过“明晰边界”控制成本损量的思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逻辑”相呼应。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内容便是这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概念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上文对贸易收益、相互依赖与霸权三个概念进行剖析后发现，不论是客观/主观贸易收益、敏感性/脆弱性还是影响力/自主权，每对变量都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剖析前原概念的一体两面特征。既然组成部分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也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并且共同构成美国贸易霸权的一体两面特征。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本文将从贸易权力生成机制的角度对上述推论进行验证。（参见表1）

表 1：美国贸易霸权内部逻辑的层次演进

主线 层次	贸易收益	相互依赖	权 力
市场逻辑	客观贸易收益	敏感性	影响力
情况 1	外 界：高	外 界：高	霸权国：高
情况 2	霸权国：低	霸权国：低	外 界：低
国家逻辑	主观贸易收益	脆弱性	自主权
情况 1	外 界：高	外 界：高	外 界：低
情况 2	霸权国：低	霸权国：低	霸权国：高

\*本表将与霸权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所有国际贸易行为体视作一个整体，称作霸权国的“外界”。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既然贸易权力源于贸易依赖，且据赫希曼关于绝大多数贸易依赖都是非对称的论断，那么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成为贸易霸权需要从两个方面尽可能扩大非对称性：一是提高外界对自己的贸易依赖程度（情况1）；二是降低自己对外界的贸易依赖程度（情况2）。又因为贸易依赖于贸易收益，所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具体操作上，贸易霸权国一方面要尽可能提高外界可获取的客观贸易收益（情况1），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降低自己可能承担的机会成本，即主观贸易收益（情况2）。基于上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之所以说贸易霸权国与外界建立的贸易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是因为非对称性实现了外界对霸权国的赋权；二是情况1在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同时演进的结果是霸权国获得较大对外影响力，情况2的演进结果是霸权国获得较大抵御外来影响的自

主权，只有情况 1 和情况 2 在两条逻辑主线中的演进同时有效发生，一个占有贸易权力优势的国家才能将这优势转化为贸易霸权。鉴此，由于两条逻辑主线的演进结果分别对应着贸易霸权的一体两面特征，所以说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此外，还需明确以相互依赖为支点的两次溯源转换中，相关概念的逻辑周延性问题。如前文所述，本文的溯源分析是个逐层聚焦的过程，所以溯源的目的在于论证如下结论：在贸易领域中，由于贸易收益对相互依赖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并且相互依赖对权力产生的作用亦如是，所以贸易收益是决定国家相互间权力的重要变量。具体就贸易收益、相互依赖与权力三个层次的逻辑周延性而言，贸易收益决定的是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一体两面特征敏感性与脆弱性，并不能涵盖贸易相互依赖这个概念的所有外延。比如，对于前文回顾相互依赖相关研究时提到的本质、效果、度量等内容而言，贸易收益就只能从敏感性与脆弱性的角度部分地发挥作用，并不能决定这些内容的全部。贸易相互依赖与贸易权力的周延性也如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收益是贸易相互依赖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而贸易相互依赖是贸易权力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所以贸易收益是贸易权力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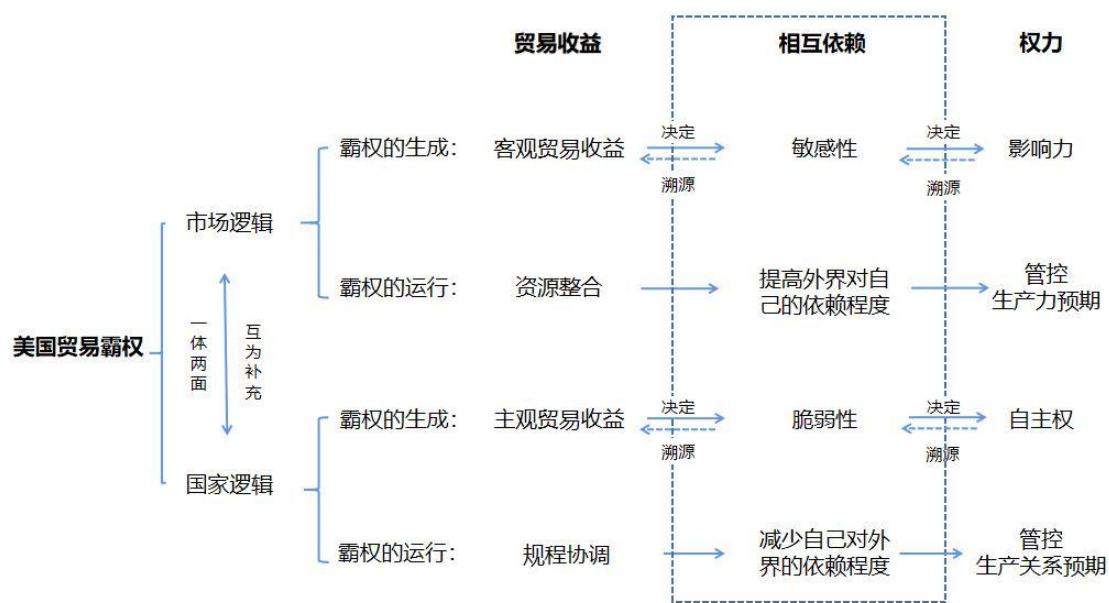
综上，本文认为美国贸易霸权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也反映在经济领域，实质上却是美国在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两个维度上有意识操纵的政治结果。通过具有鲜明政治导向的操纵，美国在保持住外界对自己高位依赖的同时，将自己对外界的依赖持续管控在低位水平，符合美国贸易霸权本质特征要求。美国学者赫利威尔和帕德莫尔在《国际经济学手册》第二卷中为以上论述提供了经验性证据：他们在研究中“特别介绍了针对 7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国家具有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而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却不强烈，因而是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的典范”。<sup>①</sup>由此可见，美国贸易霸权是确实存在的。

## 五、美国贸易霸权的运行操纵

不论是对美国贸易霸权进行溯源分析，还是针对贸易霸权内部逻辑进行分层次的逻辑演进，贸易霸权的权力根源都落脚在贸易收益这个变量上。所以，对贸易收益的操纵决定了贸易霸权的运行结果。接下来，本文将沿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两条主线分别介绍美国作为贸易霸权国对贸易收益的主要操纵手段。（参见图 3）

<sup>①</sup> 胡方：“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国际贸易摩擦”，《WTO 经济导刊》，2013 年第 Z1 期，第 114 页。

图 3 美国贸易霸权的生成与运行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一）市场逻辑：用资源整合操纵客观贸易收益

资源整合指的是通过对所有可调动资源的整合，提高外界对自己的依赖程度，从而管控自己和贸易伙伴各自生产力预期的手段。这里的整合，除了横向供应关系上范围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在纵向需求关系上抢占具有“一对多”映射关系的有利位置。

横向供应关系的资源整合是贸易伙伴和贸易内容范围的延伸。这种延伸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逻辑效率优先的天性。为实现贸易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目标，市场逻辑不断驱动要素的跨境优化配置，天然地具有消弭边界、扩大贸易范围的倾向。其中，供应关系的范围既包括贸易伙伴，还包括贸易内容。贸易伙伴的范围指的是贸易对象的数量，尤其是不同类型贸易伙伴的数量。具体分类方法既可以参照土地—劳动力—资本的要素禀赋分类法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sup>①</sup>，还可以按照政治关系亲疏远近大致分为盟友国家与非盟友国家。而贸易内容的范围指的是资源的获取渠道数量。由于美国从外界输入的产品以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为主，所以扩大贸易伙伴和贸易内容的范围增加了美国获取相似原材料或寻找替代加工地的渠道，为美国提供了稳定持续的进口来源，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扩大贸易范围的市场逻辑除了显著的经济意义而外，还有重要的政治安全意义。

纵向需求关系的资源整合是国际贸易价值链结构的塑造。历史上，贸易霸权国在攫取霸权地位

<sup>①</sup> 参见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之前都必然经历一个生产率急剧提升的阶段。然而，国内的市场需求却往往是相对滞后的。因此，如何化解国内日渐过剩的产能与有限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便成了贸易大国迈向贸易霸权国历程上的必经难题。英国选择了帝国殖民主义的方式开拓国外市场，哪怕诉诸武力。而美国选择了结构化调整：通过重组自身资源要素禀赋结构来提升出口产品在知识技能方面的附加值，再借助国际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自发运作机制，在与贸易伙伴建立的相互需求关系上形成具有单向“一对多”辐射效应的战略地位。具体说来，不论是像芯片这样知识富集的高科技产品，还是像大豆、小麦这样高度自动化机械化的农产品，美国在出口产品上所附加的知识技能往往呈现出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为支撑的特点。也就是说，综合国力不及美国的国家不具备生产出同品质产品的能力（高科技产品）或须付出更高代价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农产品）。尤其当某项美国出口的产品对进口方来说属于无可替代的战略必需品时，美国就成了唯一的购买选项。凭借这份特殊地位，美国不仅拥有了对这项战略必需品的定价权，甚至还拥有了额外权力，可以趁势将这样的供需关系转化为外交威慑工具，以在贸易行为中附加条件的方式胁迫进口国在多项涉及双多边利益的安排上屈从其意愿，从而用贸易手段达到超贸易目标。

总之，美国一方面通过横向上的资源整合将自己从对外贸易关系中获取的客观贸易收益管控在较低水平，降低自己在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从而获取较高的决策自主权（参见表1“情况2”）；另一方面通过纵向上的资源整合将贸易伙伴从与自己建立的贸易关系中获取的客观贸易收益维持在高位水平，提高外界在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从中获取较高的对外影响力（参见表1“情况1”），最终实现了对市场逻辑的有效操纵。

## （二）国家逻辑：用规程协调操纵主观贸易收益

规程协调指的是通过协调贸易操作层面的规定与程序，减少自己对外界的依赖程度，继而管控自己与贸易伙伴之间生产关系预期的手段。这里的协调，除了指在国家间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对金融、法律等核心领域具备塑造跨国界行业标准并形成路径依赖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国家间利益冲突时胁迫对方屈从自己意愿的能力。

首先，在跨国界行业标准塑造力上，规程协调主要通过法律、金融等核心关键行业形成路径依赖的方式来实现。这两大领域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是对跨境流动的资本要素具有管束和引导作用的“非流动资本要素”。而“现代经济中，（国家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存在于不可流动的生产领域中”。<sup>①</sup>就对贸易的功能而言，法律是解决贸易争端、维护交换秩序的工具，代表的是市场对“过去”

<sup>①</sup>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李杨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页。



既已存在的交换程序和原则的信任；金融则是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维系更长久交换关系的工具，代表的是市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换领域和内容的信心。二者从这两方面形成合力，牢牢把控着国际贸易体系中资本流动的方式、方向、流量和速度。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形成国际范围内的路径依赖，主要得益于其二战后与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间存在的巨大优势差距。二战后，美国在与贸易相关的法律和金融领域发达程度最高，且有久经现实检验的机构设置、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序等成套经验。反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普遍在战后迫于民生压力无暇亦无力进行相关领域的探索和试错，所以在经济重建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大多选择了直接迁移美国现有经验，以压缩本国行业发展周期，尽快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增加经济收益。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后续融入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就算已经具备了开创更符合自己实际情况新规程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基础，也多会放弃修正的权利。究其原因，采取与大多数或者主要贸易伙伴国不同的规定与程序将意味着提高国家间贸易往来成本，不利于吸引外来资本投资，从而有损于该国本可以从规程一致的国际贸易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特殊的历史时机赋予了美国在这两个核心领域形成路径依赖的优势地位，更赋予了美国将此优势地位进一步工具化为在贸易关系中设置政治“门槛”的特权。这里的门槛既包括法律领域以“长臂管辖”为代表的治外法权，<sup>①</sup>还包括金融领域以资信评估为代表的准入资质评鉴资格。<sup>②</sup>

其次，在使对方屈从自身意志的胁迫力上，规程协调主要通过提高贸易伙伴不屈从的成本来实现。为清晰呈现双方利益冲突下的胁迫过程，并将重点放在美国采取的胁迫手段上，本文假设美国与贸易伙伴间既存的贸易关系已经是按美国意志建立起来的，贸易伙伴若选择保持现状就是屈从，若单方面作出政策调整就是不屈从。本文继而基于赫希曼关于贸易国家政策转向风险的论述，认为美国主要以三种手段实现规程协调。<sup>③</sup>一是提高贸易净收益。这种手段的突出特点在于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产品具有强烈需求。这里的“强烈”既可以表现在如上文所述在需求内容上具有“一对多”辐射效应的不可替代，还可以表现在供应时间和数量上的紧迫。二是提高对方不屈从的国内成本。这里的国内成本既包括诸如产业结构、就业群体结构等对该国进出口结构具有直接影响的现实成本，也包括政策调整周期时长等间接的可预见成本。三是用利益集团势力为对方不屈从设置国内障碍。一段成型的贸易关系意味着在贸易伙伴国内，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成本利益分配格局也随之成型。若贸易伙伴单方面改变与美国的贸易政策，这样的行为必然会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整个贸易成本利益分配格局的重组等情况。所以，捍卫自身利益的天然本能让既得利益集团具有在国内政治层

<sup>①</sup> 参见强世功：“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第84—93页。

<sup>②</sup> 赵磊、张馨：“美国资信评估霸权背后的场域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78—94页。

<sup>③</sup>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73.

面上对可能的政策转向造成阻力的倾向，从而服务于美国胁迫贸易伙伴维持现状的目标。<sup>①</sup>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都以提高贸易伙伴政策转向的成本为手段，上述两种规程协调针对的却是不同的成本来源。第一种成本主要源于对象国融入世界市场的意愿及其强烈程度。具体说来，这种成本描摹的是对象国两种状态之间利益的权衡：其一是获准加入世界市场后，从世界贸易体系中得到的收益；其二是保持自给自足状态的固有收益。只要前者大于后者，对象国就有加入世界市场的动机。

第二种成本则主要源于对象国承受改变贸易关系带来的机会成本的能力。具体说来，这种成本描摹的是对象国两种状态之间成本的权衡：其一是继续保持较低议价权地位，这是一种自身贸易安全在一定程度上由霸权国予以保证的状态，意味着在两国利益冲突中大概率妥协退让，这样的妥协退让必然在国内换届时在选民心中留下软弱、不称职的负面形象，从而对当权政府造成执政危机成本；其二是单方面改变与霸权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包括自身资源要素与社会劳动力结构在内的系列改革，以提高对自身贸易安全的保障能力，这样的行动将打破国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本国当权政府带来不菲的执政成本。若前一种成本大于后一种成本，那么对象国就有足够的动机主动改变与霸权国的贸易关系。然而，事实却是，第一种状态中，成本仅在两国利益发生较大冲突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而不冲突或小规模冲突则是贸易国家间关系的常态，所以这样的成本估量基于虚拟的情景假设。而第二种状态中，成本则是只要付诸改革行动则必然会产生实实在在的代价。所以，在二者的权衡中，较为常见的选择是尽量避免实实在在的代价，而对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代价心存侥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明知自己身处贸易劣势地位，却依然在与霸权国的贸易关系中继续扮演“逆来顺受”角色的现象。

总之，美国一方面在没有利益冲突时，通过在跨国界关键行业形成路径依赖的规程协调，将贸易伙伴在与自己建立的贸易关系中可能将承担的机会成本，即主观贸易收益维持在高位水平，提高贸易伙伴的贸易依赖脆弱性，从中获取较高的对外影响力（参见表1“情况1”）；另一方面在存在利益冲突时，通过胁迫对方屈从自己意愿的规程协调，将自己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可能将承担的机会成本，即主观贸易收益管控在低位水平，降低自己的贸易依赖脆弱性，从而获取较高的决策自主权（参见表1“情况2”），最终实现了对国家逻辑的有效操纵。

<sup>①</sup> 熊炜：“失重的‘压舱石’？经贸合作的‘赫希曼效应’分析——以德俄关系与中德关系为比较案例”，《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81页；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页。

## 六、结语

基于对美国贸易霸权本质特征的归纳，本文建构了由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组成的美国贸易霸权内在逻辑，并通过微观层面的进一步剖析，在贸易收益、相互依赖和权力三个联动的层次上为该霸权的生成和运行提供了新的解释（参见图-3）。

在这个解释框架中，市场逻辑表征由贸易行为带来的利益增量。非霸权国对利益增量越重视，那么在贸易决策中愿意为其作出妥协让步的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越高，意味着霸权国能够对其施加的影响力越大。由于霸权国对市场逻辑的操纵直接与可预见的收益关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逻辑是贸易霸权国权力的直接来源。

而国家逻辑表征贸易关系破损时的机会成本。非霸权国对机会成本的顾虑越多，那么为减少机会成本而愿意付出的代价也越多，也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越高。高脆弱性赋予了霸权国施加隐性威慑的能力：非霸权国一旦做出超越霸权国划定的选项集合的举动，将难以承担随之带来的成本。从而固化非霸权国的行为路径，为霸权国的贸易决策提供稳定的战略预期，更好地贯彻自身意愿。由于霸权国对国家逻辑的操纵是通过提高机会成本形成威慑的形式，机会成本是否兑现取决于非霸权国自己的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逻辑是贸易霸权国权力的间接来源。

## 韩国外交的多边化战略

——以新南方政策为中心\*

于婉莹

**【摘要】**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推出了“新南方政策”，作为文在寅外交多边化的核心政策之一，意在提高韩国外交战略中新南方地区国家的比重，将韩国与新南方地区国家的关系提升至韩国与中、美、日、俄等周边国家关系的同等水平，以确保经济增长动力，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增加外交自主空间。新南方政策出台后，韩国在外交、经贸领域也展示出了推动这一政策的极大决心，为应对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地区问题，韩国在2020年11月将新南方政策升级为“新南方政策 PLUS”，并发表了面向未来五年的计划。但近来，韩国政府改变一直以来对印太战略的观望姿态，不仅加强了印韩特别战略伙伴关系，还表示积极与美国、印度寻找在“新南方”地区的合作连接点，引发了韩国是否会加入印太战略的猜测。本文将以“新南方政策”为中心探讨韩国外交多边化的战略目标与逻辑，分析“新南方政策”可能给对地区环境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韩国外交；多边化；新南方战略；印太战略；一带一路

**作者** 于婉莹，博士，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博士后，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100871，yuwanying@pku.edu.cn。

##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Yu Wanying

**Abstract:** The New Southern Policy (NSP), one of the core 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s by President Moon Jae-I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2017, aiming to pursue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The policy seeks to elevate Sou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India to the same level of its relations with

---

\* 本文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基金项目“中美竞争格下的韩国外交多边化研究”（项目编号：71006035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he four major power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Russia). The NSP aims to secure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and seek greater diplomatic autonomy in an increasingly sever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November 2020, in response to global conditions brought on by the pandemic, Seoul updated the initiative as “NSP Plus” together with a corresponding five-year plan. While continuously emphasiz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partnership, the NSP Plus identifies collective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ustainability as the critical area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changed its wait-and-see attitude to the Indo-Pacific (FOIP) Strateg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Korea-India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ctively seeking common point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India in the “New Southern” region. The change has aroused speculation about whether Seoul will jo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c goals and logic of South Korea’s 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the NSP.

**Keywords** ROK’s Diplomacy, Diversification, New Southern Polic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o-Pacific Strategy

**Author:** Yu Wanying, Ph.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 一、 文在寅政府的韩国外交“多边化”政策

“多边化”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韩语的语境里与汉语里的“多元化”相似，但又有微妙的差异。<sup>①</sup>“多元化战略”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安索夫于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论文“多元化战略”中主张用心的产品和技术去开发新的市场。<sup>②</sup>“多元”通常用于企业经营领域为了降低风险而进行的“多元化战略”或是“多角化战略”，现在多元化战略已经应用到了各行各业。

### （一）韩国外交多边化

推动韩国外交的“多边化(diversification)”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贯穿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调。文在寅上台后即在多个场合提出了韩国外交多边化的必要性，“外交多边化”就是指摆脱一直以来以

<sup>①</sup> “多边化”的韩文为“다변화”，“多元化”为“다원화”。韩国的“外交多边化”使用的是“다변화(多边化)”，而没有使用“多元化”对应的韩文。在韩国的官方文件中“다변화(多边化)”被译为“diversification”，虽然英文译成中文后为“多元化”，但从韩国的使用情况来看，显然是为了区别于“多元化”。因此，本文中 will 使用“多边化”这一表述。

<sup>②</sup> H I. Ansoff: Strategies for diversific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35, No. 5, September 1957, pp.113-124.



周边“四强国家”<sup>①</sup>为中心的外交，史无前例的提升东盟国家、印度等国家在韩国外交中的地位，参与更多样的全球议题，以扩大韩国外交空间的外交战略。<sup>②</sup>为实现这种外交多边化，文在寅政府重新布局了韩国的外交战略，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外交多边化”的重要性。在2017年6月18日进行的外交部长康京和的任命仪式上，文在寅强调，“韩国应摆脱以四大国为中心的外交，需要与欧盟、东盟、非洲国家的多边化外交”<sup>③</sup>并通过一系列首脑外交、特使外交、部长级外交加大了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非洲、南美地区的互动，并积极利用小多边外交与国际合作平台，扩大外交的范围与交流的深度。在2017年9月以总统身份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接下来访问东南亚的行程中，“多边化外交”作为关键词贯穿全程。

外交多边化(diplomatic diversification)是文在寅政府为提高韩国的外交空间、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的核心外交政策。作为文在寅政府对外政策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新南方政策”与“新北方政策”是构成韩国外交多边化的最重要的一对外交政策。这里的“多边化”有别于“多边主义”或是“多边外交”。<sup>④</sup>韩国外交语境中，多元化主要强调外交手段、方式、层次的多元化；多边主义多强调多边对话与合作，而“多边化”强调修正韩国外交以半岛中心和大国中心的“偏食”传统，扩大韩国外交的外延和空间的一种构想。可以将韩国外交的这种“多边化”概括为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空间上扩大地理范围和增加合作伙伴；其二是扩大交流与合作的议题。

过去韩国曾多次提出出口多边化、市场多边化、观光多边化相关政策，将集中于特定国家的贸易结构多边化，降低外在危险。文在寅政府将“多边化”引入到了韩国外交领域，作为解决韩国外交面临困境的一种方式。但文在寅政府的这种“多边化”构想不仅限于外交，也同时体现与经济的“多边化”。文在寅曾指出，“随着国家的发展，外交和经济多边化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的。”<sup>⑤</sup>本文将新南方政策为中心探讨韩国外交领域的多边化。

## (二) 新南方政策的提出与内容

2017年11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赴东南亚访问，在韩国-印尼商务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

<sup>①</sup> 韩国在部分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习惯上以“周边四强”或“四强国家”来指代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

<sup>②</sup> 한국외교부: <한국외교백서 2018> (韩国外交部:《韩国外交白皮书2018》), p.62

<sup>③</sup> “문재인 대통령 능력으로 보여달라 강경화 장관 임명장 수여”(“文在寅总统授予康京和长官任命状”), <https://www.dailian.co.kr/news/view/640810/?sc=naver> accessed on Oct 18, 2021.

<sup>④</sup> “多边主义”强调的是普遍的行为原则，例如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多边会议、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比较抽象的国际秩序，或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多边外交是区别于传统外交的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的“制度”、“观念”、“原则”等基础之上的一种外交形式。郑启荣、牛仲君 主编：《中国多边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sup>⑤</sup> 문재인: “제 11 회 국무회의 모두 발언”(文在寅: “在第11次国务会议中的发言”),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5790>, accessed on Oct 18,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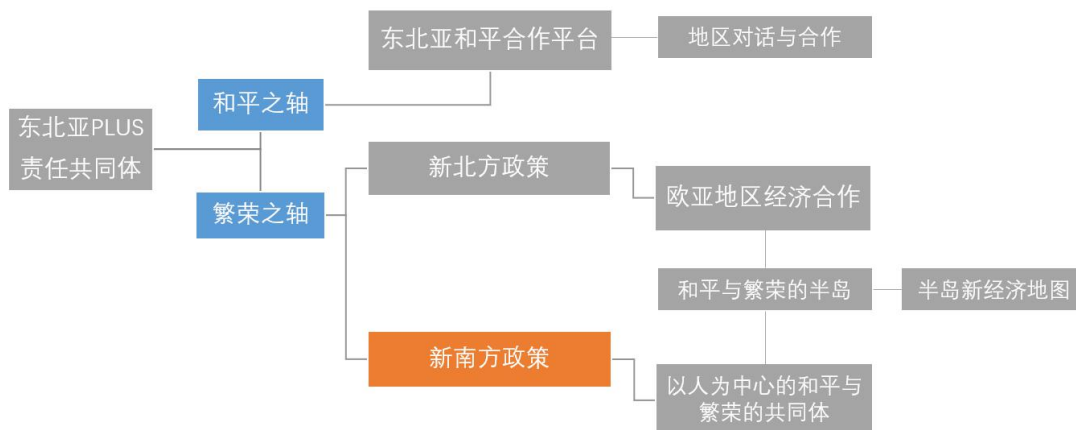
基于“人(people)”、“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简称为“3P”)为原则的对东盟外交政策,即“新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的核心合作伙伴是指东盟十国和印度,其内容主要是扩大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半岛和平进行安全合作。2017年11月13日,在菲律宾举行的韩国-东盟峰会中,文在寅提出了“韩国-东盟未来共同体”,进一步阐释了新南方政策的目标,以及韩国愿意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志。2018年7月9日,文在寅总统出席韩国-印度商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将把韩印关系提升至韩国与周边“四强国家”(中、美、俄、日)外交同等的水平,并同时向印度提议“3P PLUS (+)”,以及新南方政策与印度“新东向行动”的连接可能性。<sup>①</sup>

文在寅早在总统公约中就提出将重视东南亚外交,他是韩国首位将东盟写入公约的总统,文在寅在上台后,在2017年7月9日发布了100大国政课题,其中国政目标的外交领域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半岛”,下设子课题中包括构建“东北亚 PLUS 责任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的构想由“和平之轴”与“繁荣之轴”组成,新南方政策与新北方政策则是实现繁荣之轴的两个部分。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半岛”构想,文在寅政府确定了以下几个外交基调:(1)恢复与周边四国的首脑外交(2)确保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动力(3)新南方、新北方政策等外交多边化政策来扩大韩国外交空间(4)提高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于地位(5)与国民一起的外交。<sup>②</sup>

<sup>①</sup> 문재인: “한·인도 비즈니스 포럼”, <문재인 대통령 연설문집 제 2 권(상)> (文在寅: “韩国-印度商务论坛”, 《文在寅总统演说文集第二卷(上)》), 2019 p.154.

<sup>②</sup> 한국외교부: <한국외교백서 2018> (韩国外交部: 《韩国外交白皮书 2018》), p. 18.

图1 文在寅政府的东北亚 PLUS 责任共同体构想



来源：根据韩国新南方政策官方网站资料制作，<http://www.nsp.go.kr/>，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日。

为推动新南方政策，文在寅上台后即向印尼、菲律宾、越南、印度派出了特使，这是韩国首次在总统上任初期向东盟派出总统特使，当年还在韩国建立了东盟文化院。2017年9月和2018年8月先后出台了总统直属机构新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和新南方政策特别委员会分别推进“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2019年韩国外交部新设东盟分局。2019年，韩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举办韩国-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同时举办第一次韩国-湄公河会议，并提升至首脑会议级别。将现有的16个战略课题57个重点项目扩大改编为19个战略课题和92个重点项目。同年，文在寅完成了对东盟国家和印度的巡访，也因此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内完成东盟10国访问的总统。

从新南方政策的出台到推进过程来看，“新南方政策”与过去的韩国对东南亚政策相比，无论是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体现了文在寅政府为实现外交多边化的决心。那么，为什么是东南亚和印度？首先，新南方地区人口为20.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6.5%，2019年GDP占世界比重6.9%，经济年平均增长4.4%，比世界经济增长率高2.1%，东盟和印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sup>①</sup>；作为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地区之一，地区发展潜力巨大。第二，东盟国家利用东盟、APEC、EAS、东盟+等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合作机制提高了在地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东南亚与印度是韩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受韩流影响较大的地区，并且与韩国在多个多边合作平台已经保持着交集。第三，在半岛问题上，新南方地区国家多数同时与韩国和朝鲜保持着关系，有利于韩国在半岛问题上争取新南方国家的支持。新南方政策旨在通过

<sup>①</sup> 신남방정책특별위원회: <신남방지역 경제·무역·투자 통계집> (新南方政策特别委员会:《新南方地区经济、贸易、投资统计集》), 2021.6, p. 3-4.

扩大与东盟和印度等新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新南方地区提升至周边四强（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在韩国外交中相似的水平，使韩国的外交超越韩半岛。但新南方政策不是以新南方地区替代“周边四强”，而是保持与周边大国关系的同时，扩大韩国外交的空间，增加韩国战略的选择。

### （三）新南方政策的进化

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大流行，给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和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各国都开始积极寻找应对这场危机的方法。新南方地区也不例外，面临着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应对及保健医疗合作需求、非接触经济，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深化、全球供应链重组、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数字差距扩大等国际环境的变化等新的合作需求。在此背景下，2020年11月12日举行的东盟峰会中通过了《东盟全面复苏框架》，作为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复苏的指导性文件，提出了经济复苏的路径和五大战略领域，其中包括提升卫生系统，加强人类安全，发展数字经济等，并强调了加强国际和区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包括加强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展开合作，利用多边平台等。<sup>①</sup>

为了共同应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公共卫生危机，巩固新南方政策的成果，2020年11月12日的韩国-东盟首脑会议期间，文在寅提出了新南方政策的升级版“新南方政策 PLUS”，以新南方政策推出三周年为契机，将已有的合作项目升级为七大重点合作领域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具体指出了未来五年的实施战略（New Implementation Strategy）。七大重点合作领域包括：（1）全面的医疗卫生合作（2）共享韩国型教育模式，支援人力开发（3）双向的文化交流（4）打造互惠、可持续的贸易投资基础（5）支援共生型农渔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开发（6）未来产业领域合作（7）为了安全与和平的跨国合作<sup>②</sup>。

升级版的新南方政策在基本保留了过去的计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调整。第一，反映了疫情等变化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和新南方地区最急需的需要，强调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全面扩大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规模；第二，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原則置于新南方政策 PLUS 的首要位置；第三，较新南方政策相比，合作领域更加合理，便于合作的开展，而且提出了每一项合作领域的更加具体和清晰的合作内容。韩国的新南方政策 PLUS 恰好反映了新南方地区对区域合作的需要，尤其是其中的全面的医疗卫生合作、无接触贸易、新兴产业合作等。

<sup>①</sup> 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lan , <https://asean.org/asean-comprehensive-recovery-framework-and-its-implementation-plan/>, accessed on Oct. 3, 2021.

<sup>②</sup> 신남방정책특별위원회（新南方政策特别委员会），<http://www.nsp.go.kr/>, accessed on Oct 18, 2021.

此外，新南方政策推出后，韩国加快了对东盟地区的双边及多边自贸区的建设。2021年10月6日，韩国与柬埔寨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是韩国在推出新南方政策之后，第一次与湄公河地区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韩国也将继续扩大湄公河地区的市场，并加强这一地区的供应链，推进新南方国家的FTA网络建设。2021年10月26日在第22次韩国-东盟首脑会议上发布了韩国-东盟共同声明，声明中表示将把韩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实质性、活跃、互惠的关系等内容。

表1 韩国与新南方地区国家的双边FTA签订情况

FTA	状态
韩国-新加坡 FTA	已生效（2006）
韩国-ASEAN FTA	已生效（2007）
韩国-印度 CEPA	已生效（2010）
韩国-越南 FTA	已生效（2015）
韩国-马来西亚 FTA	第三次协商（2019）
韩国-印度尼西亚 CEPA	已签订（2020）
韩国-柬埔寨 FTA	已签订（2021）
韩国-菲律宾 FTA	已签订（2021）

来源：根据韩国FTA官方网站资料整理，<https://www.fta.go.kr/main/>，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日。

新南方政策出台至今4年时间，韩国通过不断探索，升级和完善了新南方政策，不仅扩大了新南方的范围和外延，也已经在地区战略的连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通过及时、灵活地引入一些共同关注的地区议题，赋予了新南方政策新的合作动力。

## 二、韩国外交多边化的战略目的

**第一，扩大经济地图和增加外交空间。**首先是要通过外交多边化促进经贸合作伙伴的多边化，摆脱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结构。2017年韩国的对外政策环境首先是不确定的国际秩序与地区、国际挑战因素的增加，尤其是半岛局势紧张，域内国家之间的竞争深化，贸易保护趋势与本国优先主义扩散趋势导致国际合作基础遭到打击；而韩国因为总统弹劾，首脑外交经历了数月的空白，韩国急需在外交领域有新的进展。文在寅曾强调，“韩国政府的原则是以韩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的，而韩国的国家利益是和平”。<sup>①</sup>因此，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和以国民为中心的外交是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指

<sup>①</sup> 문재인: “수석, 보좌관회의 2017.8.14”, <문재인대통령 말·글 집>

导思想。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韩国面临着如何在确保国家自主性的情况下维护安全、经济等在内的国家利益。从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又是韩国外交中比重最大的两个国家,韩国对中美经贸依赖程度高,韩国不想卷入中美战略竞争,但中美贸易摩擦与战略竞争的深化,韩国的外交空间迅速被挤压,也让韩国发现在经贸上过度依赖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潜在风险,韩国需要扩大外交对象以缓冲来自中美竞争带来的压力,提高外交自主权,改变被动局面。韩国外交向来重视以东北亚和欧亚大陆,为了突破这一局限性,韩国东北亚 PLUS 战略提出了“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同时开展。韩国与东盟在 1989 年建交,2019 年迎来了 30 周年,而在这 30 年里,韩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加 20 倍,人员往来增加了 40 倍,这是韩国在这一地区推行外交多边化的基础。

**第二,营造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在半岛问题上获得更多支持。**半岛局势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下,半岛和平进程长期停滞,韩国外交需要可视的外交成果,为半岛和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但半岛周边关系接连恶化,又长期存在着被大国环绕的疲劳感。河内会谈破裂之后,半岛问题的解决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而韩国一直以来,外交政策都主要集中在半岛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政策也都是基于对解决半岛问题而展开,但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不足。所以,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多边化,得到更多支持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利用反对朝核的国家和地区多边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的开展。东盟地区论坛中包括朝鲜,而且论坛还曾就半岛问题进行过对话。东盟地区对朝鲜的态度也较为友好,鉴于东盟一部分国家与朝鲜拥有传统友谊,朝鲜与这些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度较高。朝鲜希望通过东盟这个渠道,为朝鲜半岛危机进行“外交突围”,突破美国等国对其的封锁,拓展朝鲜在东盟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依靠东盟,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发出朝鲜声音,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将可能成为朝鲜外交的一个重要考量。韩国希望通过东盟地区的多边机制和和东盟国家与朝鲜之间的关系等引导朝鲜改革开放,或是请求共同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施制裁和施压,保持韩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第三,随着国力的提升,需要建立面向世界的战略。**2020 年,韩国 GDP 上升两位,重新回到全球前十,在此之前,韩国曾在 2004 年、2005 年连续进入全球前十之后,一直保持在前 20 的位置,在疫情冲击下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尤其是韩国工业竞争力更是从 1990 年的第 17 位上升到了 2018 年的第三位,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仅次于中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sup>①</sup>但与这种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相比,韩国一直以来以“东北亚”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对外战略限制了韩国外交的范围和影响力。一直以来,韩国的对外战略主要集中于东北亚地区,尤其被韩国称为“周边四强”国家的中国、

(文在寅:“首席、辅佐官会议 2017. 8. 14”,《文在寅总统演讲与文章》), 2018, p. 314.

<sup>①</sup> 산업연구원: “한국 제조업 경쟁력”(产业研究院:“韩国制造业竞争力”), 2021, No.108, p. 3.



美国、日本、俄罗斯是韩国外交战略中占据了绝对的比重，这也很直观地体现在韩国历年外交白皮书中有关东北亚地区内容的篇幅。随着韩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韩国一直以来缺乏一个超越东北亚地区的中长期战略，尤其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也更需要这种以亚洲国家的身份放眼亚洲，或是更进一步的全球战略。但从现实考虑，东北亚地区仍然是对韩国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地区，因此如何平衡韩国对外战略中的东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战略布局就成为韩国外交中的课题。2021年7月2日韩国被正式列入发达国家，国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2020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以1.58万亿挤进全球前十，成为十大经济强国之一，这种国际身份的变化，让韩国对从地区国家到地区强国，再到世界强国的意志更加强烈。韩国需要摆脱大国的“边缘”位置，构建一个符合其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地区和全球战略，而不仅仅是参与其他大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sup>①</sup>

**第四，打造海洋与陆地结合的世界强国。**韩国位于大陆与海洋的交叉点，被大国环绕，是一个连接大陆与海洋的桥梁国家，这是地缘政治上的优势。<sup>②</sup>韩国造船业在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企订单量也仅次于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新型船舶制造技术，韩国并没有利用这种优势打造一个韩国型海洋强国的战略。外交多边化战略下，尤其是新南方政策，显著增加了韩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议题。目前，韩国正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扩大在海洋领域的安全、开发与合作，打造“韩国-海洋东南亚合作”形成与韩国-湄公河地区国家合作均衡的发展。2020年7月17日，文在寅总统曾提出了“利用韩国三面环海的优势，在2030年建成世界第五大海上风力强国”的目标。<sup>③</sup>2021年9月文在寅总统访问三星重工船厂时表示，“韩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造船强国。在世界船舶市场取得第一的订单业绩，特别是在大型集装箱船、LNG运输船、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等环保、高附加值船舶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sup>④</sup>2021年11月2日韩国KBS纪录片频道播出了“以航空母舰打开海洋强国之梦”，虽然在刚刚结束的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决定将轻航母的预算从72亿韩元缩减到5亿韩元，但韩国仍表示将坚持在2033年实现拥有航母。

### 三、韩国外交多边化的战略逻辑

**第一，合作博弈。**中韩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依赖日益加强，

<sup>①</sup> 문재인: “2018 무술년 신년 인사회”, <문재인대통령 연설문집 제1권(하)>(文在寅: “2018 戊戌年新年见面会”, 《文在寅总统演说文集第一卷(下)》), 2018, p. 170.

<sup>②</sup> 문재인: “2017년도 재외공관장 만찬 간담회”, <문재인대통령 연설문집 제1권 하>(文在寅: “2017年度驻外公馆长晚餐座谈会”, 《文在寅总统演说文集第一卷(下)》), 2018, p. 136.

<sup>③</sup> “文대통령 “2030년 세계 5대 해상풍력 강국 도약 목표” (“文总统, 2030年实现世界第5大海上风力强国”), <https://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200717/102023526/1>, 上网时间: 2021年11月1日。

<sup>④</sup> “한국-모잠비크 FLNG 선 출항 명명식 축하” (《在韩国-莫桑比克 FLNG 船启航命名仪式上的贺词》),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1470>, 上网时间: 2021年11月15日。



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政治外交领域，韩国却与美国保持着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形成了一种韩国在政治安全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结构。但随着中美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这种结构也给韩国带来了困扰，韩国经常处在一个需要在韩美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寻找平衡的位置，以保持自己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地位。但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选择范围不断缩小，在处理韩美关系上，韩国同样面临着一种困境，即韩美同盟和完全自主权的问题。在处理中韩关系上，韩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减小对华依赖，但同时让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发挥作用。因此，如何平衡中美关系和韩美同盟成为韩国的难题。如果把韩国在中美之间的“两面下注”理解为在对外政策图谱中“制衡”和“追随”为两端的中间进行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sup>①</sup>，但韩国要想将国家利益最大化，应推出配套的对外经济政策，首先将集中于特定国家的贸易结构多边化，降低外在危险，也就是说比起在两端的中间进行选择，更应该通过增加参与这与增加共同关注的议题，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强调“团体理性”的合作博弈。

**第二，开放式地区主义。**韩国外交多边化反映了韩国对过去的对东南亚或亚洲地区外交的一种反思。过去，韩国历届政府都提出了地区政策，卢泰愚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or Peace in Northeast Asia)、金泳三政府时期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Northeast Asia Security Dialogue)、金大中政府时期提出了东亚共同体、卢武铉政府时期提出了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李明博时期提出了新亚洲构想，朴槿惠时期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其中除了金大中时期的构想主要对象国中包括东盟地区，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构想以较为广泛的亚洲地区为构想的对象，其他的构想主要是围绕着东北亚地区开展，而且过去的地区主义政策的特点是自我为中心的、自贸协定为中心的，尤其是以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几个周边大国，以及对朝鲜为主要政策对象，对“新南方”地区一直以来并没有成为韩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在韩国对外战略中的比重一直较小，没有以“新南方”地区为对象进行战略性的规划，而且实践上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也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进行远景规划和构想，政权更替后前后政策缺乏连续性，往往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到了这一届政府就不了了之。国家的对外战略要考虑到国家实力，国家实力也会带来海外利益的扩大，而韩国也需要将自己的对外战略范围进行调整。文在寅政府的“东北亚 PLUS 责任共同体”构想基本上延续了卢武铉时期的构想，在此之上进行了升级。“东北亚 PLUS”仍然将东北亚地区视为关乎韩国生存的核心地区，但以“PLUS”无限延展了东北亚地区的范围，也就是不被“东北亚”这个概念限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突破韩国对外战略中传统上的东北亚地区框架，从而打造一个开

<sup>①</sup> 刘阿明：“两面下注与行为调整——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模式研究”，《当代亚太》，2011年5期，第61页。

放的多边合作平台。<sup>①</sup>

**第三，利用现有平台，通过并存与连接政策，推进共生型多边化。**过去，韩国曾提出过东北亚均衡者、仲裁者，但在外交多边化构想下，更加青睐“桥梁者”的角色。首先可以以新南方政策为平台尝试连接地区内各个国家的地区战略，也可以通过地区内的多边合作平台与地区外部进行连接，例如利用 RCEP 这个平台进行部分合作领域的对接。当前新南方地区已经有马来西亚的“东方政策”、印度的“新东方行动”、文莱的“2035 宏愿”、“泰国 4.0”，韩国正通过积极寻找连接点来形成一个新南方地区的战略合作网络。中国在 2013 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以及“新南方政策”，以及“面向未来”、“以人为本”等内涵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此外，在地理空间上，合作对象；合作领域；合作模式上，都是一开放的平台，进行双边与多边合作；未来目标，都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繁荣，推动地区共同体的构建。韩国外交部表示，在 2021 年 4 月 3 日举行的韩中外长会谈中，两国首脑就一带一路和新南方政策达成共识，决定采纳韩中经济合作共同计划，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 四、 评价与展望

在过去的韩国-东盟关系发展中，韩国的外交目标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在半岛问题上引导东盟国家支持韩国，对朝鲜进行批判，对经济利益与有限权力的追求是韩国对东盟外交的核心动因。<sup>②</sup>并且，韩国的对东南亚政策以建立对话关系周年纪念的访问和 APEC、10+3 的等多边活动为契机进行的会晤。一次性活动较多、不够深入、没有整体规划；韩国的外交目标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在半岛问题上引导东盟国家支持韩国；对经济利益与有限权力的追求是韩国对东盟外交的核心动因。但新南方政策在空间上强调了的整体性，是高度一体化和相互关联的区域；新南方政策作为外交多边化网络的一环，推动重塑韩国外交，被放在了更大的框架下，而非仅仅是地区战略或是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物。时间上强调了渐进性，并非一次性的战略，而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调整和探索（战略模糊、对待印太战略和态度）。结构上强调了的合作性，地区内互补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但也要看到“新南方政策”等外交多边化政策的问题与不足。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新冠疫情

<sup>①</sup> 이대우: <동북아플러스 책임공동체 구상>, 세종연구소 (Lee Daewoo: 《东北亚 PLUS 责任共同体构想》, 世宗研究所), 2019, p.83.

<sup>②</sup> 김형중: “코로나 19 감염증 사태와 신남방정책: 아세안을 중심으로”, <동남아시아연구> (Kim Hyungjong: “新冠肺炎与新南方政策: 以东盟为中心”, 《东南亚研究》), 2020, Vol.130, No.3, p.38.

是新南方政策顺利开展的一大障碍因素。新南方地区国家人口超 20 亿，疫情治理还是跨国问题，如何平衡新冠疫情治理与经济合作是当前面临的挑战。病毒的扩散分国界，应对新冠疫情也绝非一个国家的事，尤其“新南方政策”以构建共同体的目标，必须拿出超越国家的应对方案，如果不能有效治理疫情，那么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将面临阻碍。第二，还有内部平衡问题：新南方国家中，多为韩国 ODA 对象国，新南方政策出台后对东盟整体投资虽提升，但主要集中于新加坡、越南，其他国家投资额反而降低，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sup>①</sup> 第三，2017 年 11 月美国正式发表了“印度-太平洋战略”，以此作为其新的对亚洲战略，之后又陆续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国防战略、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强调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并大力推进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合作，美国在多种场合邀请韩国加入到印太战略，但韩国对印太战略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战略模糊”的态度。2019 年 6 月，在韩美首脑会谈中，提到寻找新南方政策与印太战略的连接点，在之后的首脑会谈中也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态度。这也引发了对韩国是否已经“选边”美国的疑问。对于韩国一直保持“战略模糊”或是“战略平衡”的态度下，美国也可能进一步向韩国施压，逼迫韩国“选边站队”，或者有可能会将韩国边缘化。

过去韩国历届政府都推出了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新南方政策已经推出 4 年，相比下呈现出了持续性、进化的特征。而且从 2020 年发布的面向未来五年的 PLUS 政策来看，还将具有相对长期的特征。新南方政策中，多次强调“面向未来”的价值，尤其是新南方政策 PLUS 中的“PLUS”就意味着未来更多的空间与可能性。因为无法准确预测中美战略竞争将会具体何时呈现出何种状态，韩国必须首先推动构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全新的地区主义秩序，在这一秩序当中，中美战略竞争也只是韩国需要应对的一部分。在推动以外交多边化扩大战略空间的同时，外交结构更加复杂化，韩国需要机智、灵活地处理与当前各个地区多边合作的关系和地区问题，基于制度的地区秩序，管控大国中心的地缘政治方案，这也将极大地考验韩国外交的韧性。

<sup>①</sup>2020 年韩国对新加坡和越南的投资额相加占韩国对新南方地区 11 个国家投资总额的 66.2%。신남방정책특별위원회: <신남방지역 경제·무역·투자 통계집> (新南方政策特别委员会:《新南方地区经济、贸易、投资统计集》), 2021.6, p. 36.

## 当前美日温馨预算谈判中日本立场分析

范强 邓翰东

**【摘要】：** 尽管温馨预算通常被视为美日同盟内部摩擦，但是这一问题给美日同盟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在地区局势变动和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作为日本提高同盟贡献、留住美国的必要手段，温馨预算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且，由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民众更加重视日美同盟，对增加防卫费、提高防卫能力和提高温馨预算的容忍度在事实上得到改善。在日美谈判中，美国会因顾忌日本国内的民意和日本在地区权力转移格局中的价值而避免过度对日本施压，温馨预算仍将继续维持小幅增长趋势。未来美日同盟负担分担问题将更加多元化，美日两国在网络、太空等新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更加重视通过外交手段而非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提升同盟遏制力的可能性都将影响双方对同盟贡献的评估。

**【关键词】：** 温馨预算；同盟负担分担；美日同盟；美军驻留经费

**【作者简介】：** 范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邓翰东，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 A Study on Japan's Standpoints for the Host Nation Support (HNS)

Fan Qiang & Deng Handong

**Abstract:** Although Japan's Host Nation Support (HNS)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nternal friction, the negative effect it brought about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limited. Faced with the regional uncertainties and the strategic contraction of the U.S.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NS as a mean of improving alliance contribu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US presence has been increasing. In addition, with the regional security uncertainty, the Japanese public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become more tolerant to increasing defense expenditure and the HNS. The U.S. would be restrained from posing greater pressure on Japan in light of the Japanese domestic public sentiments and Japan's increasing role in the regional power transition. In future, the burden-sharing issu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will be more diversified.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ome new spheres, such as cyber security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two countries' emphasis on alliance deterrence ability through diplomacy rather than through military alone will affect their assessment on the alliance contribution.

**Keywords:** Host Nation Support (HNS); Burden-Shar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unding for U.S. Military in Japan

**Author:** Fan Q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Deng Handong, Student of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 一、引言

同盟负担分担 (burden-sharing) 问题是观察美国同盟体系变化的一个风向标,<sup>①</sup>以温馨预算为代表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是美日同盟负担分担的典型体现,其变化被认为将影响地区安全动态<sup>②</sup>。根据 1960 年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日本承担驻日美军基地的地租等费用,美国承担基地维护和人工费。1972 年冲绳返还时,两国约定由日本承担冲绳基地的改善、维修费用,美军获得基地使用权。<sup>③</sup>1978 年美国以财政压力、日元大幅升值为由要求日本提供支持,时任防卫厅长官金丸信指示“如果日方不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驻日美军将陷入财务恐慌之中,并考虑大幅增加”,<sup>④</sup>日本正式开始向美军基地人员提供劳务费。由于金丸信曾表示做出这一决定“从关怀和温馨的立场出发,尽量做出努力”、“就算是关怀吧”,温馨预算(又称体贴预算)的名称由此产生。经过 40 余年,温馨预算成为美日同盟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其涵盖范围由最初的美军基地日方雇员工资扩大到基地住宅、水电煤气费、训练费等方面,金额也由每年 62 亿日元提高到 1933 亿日元<sup>⑤</sup>。日本国内对温馨预算的争议一直持续,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一直要求盟友提高同盟贡献,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大幅度提高美军驻留经费并一度威胁撤出美军的报道曾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对美国强硬态度的不满。<sup>⑥</sup>中国学者将这种现象视为美日同盟摩擦,认为同盟分歧还会逐步加大,美日学者也注意到两国分歧,希望尽快

<sup>①</sup> 孙茹:“美国同盟与国际秩序变革——以分担负担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8 年第 2 期,第 1-35 页。

<sup>②</sup> 杨扬:“责任分担与美日同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 年第 4 期,第 1-14 页。

<sup>③</sup> 我部政明、「『思いやり予算』の原型—沖縄施設権返還における財政取り決めの合意形成過程—」、『国際政治』、第 120 号 (1999)、74-89 頁。

<sup>④</sup> 野添 文彬、「『思いやり予算』と日米関係 1977-1978 年—沖縄米軍の再編と日本政府の対応を中心として—」、『沖縄法学』、第 43 号 (2014)、15-45 頁。

<sup>⑤</sup> 「日米、駐留経費の正式交渉開始 1 年暫定合意を念頭」、『日本経済新聞』、2020 年 11 月 12 日。

<sup>⑥</sup> 山崎拓・ケビン・メア・木村三浩、「日米安保改定 60 年・鼎談、トランプ大統領の思いやり予算値上げ要求に物申す」、『週刊朝日』、2020 年 3 月 27 日、164-167 頁。



解决上述问题以免影响同盟的长远发展。<sup>①</sup>

尽管面临国内财政、舆论压力和来自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既能维持现有温馨预算水平，也能克服美国压力只是维持温馨预算小幅增长。<sup>②</sup>为什么日本政府能保持这种平衡？

对这一问题最为常见的解释是成本-收益分析，认为美日通过分担成本进行同盟分工，各取所需，即美国获得日本的军事基地和军费支持，日本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亚太地区权力转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崛起又强化了这种相互需求。<sup>③</sup>威胁认识和美国对外战略取向被视为影响同盟负担分担的两大影响因素，即美国因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胁的认知变化、战略收缩等原因导致要求盟友提高同盟贡献，而盟国则是美国压力的被动接受者。<sup>④</sup>上述分析能够解释美国及其盟友的同盟负担分担变化历程，但是过于以美国为中心，缺乏对盟友立场的关注。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依田达郎曾在2006年分析温馨预算的演变历程和日本国内的各种态度，<sup>⑤</sup>他的分析对了解当前美日温馨预算谈判中日本的立场有借鉴意义。本文将总结当前日本国内对温馨预算的争论，从日本的立场分析日本政府为何能够持续保持温馨预算水平持续小幅增长，并尝试分析温馨预算谈判未来的发展趋势。

## 二、日本国内对温馨预算的争论

依田达郎将日本国内对温馨预算的观点分为支持和反对两类。支持者和反对者均认为温馨预算不透明、反对继续增加温馨预算，驻日美军的职能已经由单纯保卫日本转向维护地区稳定的现实也让日本民众难以认可继续提高温馨预算的合理性。<sup>⑥</sup>反对者认为，应当减少美国驻军和温馨预算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严峻的财政压力，日本应当适应美军职能转变，提升自主防卫能力，通过提高其他领域的贡献来构建更加成熟的同盟关系。而支持者则认为美日同盟不可替代，相比经济规模而言温馨预算对日本的负担有限，因此日本必须通过提高财政贡献的方式来获得美国国会对同盟的支持，以减轻美国国会要求减少驻日美军的压力。<sup>⑦</sup>简言之，争论的焦点是两个问题：面对美军职

<sup>①</sup> 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Nye, "Alliance in 2020: 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alliance-2020>, accessed on January 2, 2021; 庞中鹏：《美军驻留经费谈判——日美嫌隙的诱因？》，《世界知识》，2020年第17期，第28-2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sup>②</sup> 2009年后温馨预算基本维持在每年1900亿日元左右。

<sup>③</sup> Tomohito Shinoda,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from 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3-29; Sheila A. Smith, "Refining the U.S.-Japan Strategic Bargain",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31-52.

<sup>④</sup> 孙茹：“美国同盟与国际秩序变革——以分担负担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5页。

<sup>⑤</sup> Tatsuro Yoda, "Japan's Host Nation Support Program for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Past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Vol.46, No.6, 2006, pp.937-961.

<sup>⑥</sup> Ibid

<sup>⑦</sup> Ibid

能转变，日本应当减少温馨预算、提升自主防卫能力，还是维持温馨预算巩固美日同盟？日本增加防卫费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是否必然要减少温馨预算？

此后，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出现较大变化，美国权力相对衰落、中国崛起使日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思考呈现出新动向。

首先，日本各界仍然不赞成增加温馨预算。温馨预算自诞生起就一直遭到冲绳本土民众和左翼政党反对。美国前国家事务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曾向日方提出要求将温馨预算金额大幅度增加至每年约80亿美元，为现有规模的4倍，该消息披露后引发不满，冲绳本地媒体强烈要求减少甚至取消温馨预算。《琉球新闻》和《冲绳日报》均刊发社论指出，应当更改美军地位协定减轻基地负担。<sup>①</sup>其他全国性媒体也表示负担过重。《朝日新闻》社论指出，美国的强硬态度无法接受。<sup>②</sup>《北海道新闻》社论指出，日本负担的费用数额巨大，作为美军附庸的如此大数额的温馨预算很难得到国民理解。应当借助这次谈判的机会彻底调查。<sup>③</sup>《东京新闻》指出，严峻的财政压力让日本政府更难以取得国民理解。<sup>④</sup>拜登当选总统后，日本媒体纷纷要求政府向美国表达降低温馨预算的意愿。《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日本承担的跟基地有关的费用过重，菅义伟政府应当向美国充分说明。<sup>⑤</sup>显然，这种强烈的媒体批评反应了日本社会的不满。日本国会中也存在反对温馨预算的呼声。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第145回国会到2014年第187回国会期间，日本国会共有议员提交18份要求减少、废止温馨预算的请愿书。<sup>⑥</sup>2010年3月17日、18日，数位参议院议员还曾要求政府调查温馨预算的正当性。<sup>⑦</sup>

其次，2015年日本通过修改安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后，反对者认为日本对同盟的贡献度已经提升，日美应当重新确定同盟分工，减少温馨预算。《朝日新闻》指出，日本除了承担温馨预算，还要承担美军搬迁费用、大力度购置美国防卫装备并加大在宇宙等新领域的防卫支出。美日应当分享

<sup>①</sup> 「思いやり予算日本要請 いびつな日米関係改めよ」、「琉球新報」、2020年8月18日；「思いやり予算交渉」地位協定見直し契機に、「沖縄タイムズ」、2020年11月12日。

<sup>②</sup> 「米軍駐留経費 膨らむ長期の視野で」、「朝日新聞」、2020年10月18日。

<sup>③</sup> 「思いやり予算 聖域視せず米と交渉を」、「北海道新聞」、2020年12月24日。

<sup>④</sup> 「駐留経費4倍に 適切な要求とは言えぬ」、「東京新聞」、2020年7月10日。

<sup>⑤</sup> 「菅・バイデン会談 新しい関係構築したい」、「東京新聞」、2020年11月13日。

<sup>⑥</sup> 笔者以温馨预算的日语名称“思いやり予算”为关键词在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进行检索数据。参见 [http://search.shugiin.go.jp/ja/search.x?q=%E6%80%9D%E3%81%84%E3%82%84%E3%82%8A%E4%BA%88%E7%AE%97&ie=utf8&cat=0&pagemax=10&imgsize=3&pdf=ok&zoom=1&sort=0&ctor=0&lfor=0&ref=www.shugiin.go.jp&pid=xxfgSYj0z59OuC2sJiW\\_aw..&qid=IkE3EA885W9ZGfY1BdxIQ81urpxWQ7z5&d=%E8%AB%8B%E9%A1%98](http://search.shugiin.go.jp/ja/search.x?q=%E6%80%9D%E3%81%84%E3%82%84%E3%82%8A%E4%BA%88%E7%AE%97&ie=utf8&cat=0&pagemax=10&imgsize=3&pdf=ok&zoom=1&sort=0&ctor=0&lfor=0&ref=www.shugiin.go.jp&pid=xxfgSYj0z59OuC2sJiW_aw..&qid=IkE3EA885W9ZGfY1BdxIQ81urpxWQ7z5&d=%E8%AB%8B%E9%A1%98)，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7日。

<sup>⑦</sup> 「第169回国会 予算委員会 平成20年3月17日（火）第9回」、[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gijoho/shitsugi/169/s027\\_0317.html](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gijoho/shitsugi/169/s027_0317.html)，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7日；「第169回国会 予算委員会 平成20年3月18日（火）第10回」、[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gijoho/shitsugi/169/s027\\_0318.html](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gijoho/shitsugi/169/s027_0318.html)，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7日。

对地区局势和财政状况的认识，并再次确认对美国和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sup>①</sup>原防卫厅长官、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已经提升了日本在同盟体系分工中的贡献，希望美国在修改《美日地位协定》方面让步。<sup>②</sup>知名学者北冈伸一认为，“虽然美国一定会帮助日本进行专守防卫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日本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因此，日本在专守防卫之外还应当保留必要的反击能力作为对对手惩罚手段的遏制能力”。<sup>③</sup>庆应大学教授神保谦认为，美国的同盟思路已经由以往通过盟友构筑安全网络的思路转变为要求盟国分担军费，为了更加有效地延续同盟，日美两国应当更加对等地分担同盟地区秩序构建的责任，有必要重新确立内部互动关系。<sup>④</sup>

最后，赞成者强调为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应当继续提高温馨预算、增加同盟贡献度，以留住美国。拜登当选后《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认为，日本应该认识到美国不想再当世界警察的现实，美国要求盟国增加同盟负担的立场不会改变。日本等盟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同盟中的责任，切实减轻美军的负担。<sup>⑤</sup>前航空自卫队官员林吉永在媒体普遍批评美国大幅度提高温馨预算的要求后发文表示，要用雇佣兵的思维看待温馨预算。日本无法独立进行安保，无法接受同盟关系被破坏甚至美军撤离。他将温馨预算视为雇佣美国充当防卫日本“雇佣兵”的“相应投资”，对维持同盟遏制力意义重大。如果日本维持同等规模防卫力量，将要进行远超温馨预算的“莫大的投资”。因此，日本不应该有被害思维，而应转化为雇佣兵思维。<sup>⑥</sup>

综上，虽然日本国内反对温馨预算的声音仍然较为强烈，但是主要以冲绳本地民众、媒体以及日共等反对党、冲绳本地议员为主，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日本精英层面对温馨预算的争论更加聚焦于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与留住美国、维系同盟关系。

### 三、日本政府的立场

面对上述争论，在处理温馨预算问题时，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以下立场：

首先，日本政府表态继续推进减轻冲绳基地负担、提高透明度以进一步获得国民理解。2010年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为了提高温馨预算的效果和效率，应当在确保透明性的同时进行更正以取得国民理解。鸠山还希望就包括美军地位协定在内的日美同盟进行全方位评估。但是一年后民主

<sup>①</sup> 「米軍駐留経費 懸念を抱く長期的視野で」、「朝日新聞」、2020年10月18日。

<sup>②</sup> 山崎拓・ケビン・メア・木村三浩「日米安保改定60年・鼎談、トランプ大統領の思いやり予算値上げ要求に物申す」、「週刊朝日」、2020年3月27日、164—167頁。

<sup>③</sup> 北岡伸一、「ポストコロナの安保を問う」、[https://www.jiji.com/sp/v4?id=foresight\\_00318\\_202007030001](https://www.jiji.com/sp/v4?id=foresight_00318_202007030001)，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7日。

<sup>④</sup> 神保謙、「トランプ政権と日米同盟—四年間の成果と課題」、「外交」、2020年9—10月号、28-33頁。

<sup>⑤</sup> 「バイデン氏勝利 米国の安定と自信を取り戻せ」、「読売新聞」、2020年11月10日。

<sup>⑥</sup> 林吉永、「『思いやり予算』は『傭兵予算』『米軍駐留費日本負担』思考の転換を」、[https://www.jiji.com/sp/v4?id=foresight\\_00318\\_202007030001](https://www.jiji.com/sp/v4?id=foresight_00318_202007030001)，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7日。

党政府以已经向民众说明预算细节、提高透明度并对协议内容作出一定改变为由与美国签署新协议，维持温馨预算规模。<sup>①</sup>2013年安倍上台后则更加坚定支持温馨预算。2017年1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国会表示，财务省坚定希望减少预算，他也认为日美同盟虽然很重要，但是缩减预算更重要。安倍同时还强调日本政府已经加强温馨预算项目的审查，成功减少了娱乐项目预算，日本还会继续加强审查。<sup>②</sup>安倍此举意在向外界表明政府严格审查温馨预算、提高透明度。另外，日本官员还多次在国会接受质询解释温馨预算开支。如2019年3月28日，防卫省地方协力局长中村吉利曾在国会介绍改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施工的具体支出。<sup>③</sup>2019年4月24日，防卫副大臣原田宪治曾在国会介绍关于普天间机场安全、维修费用等事宜。<sup>④</sup>

其次，日本政府一再重申通过谈判确定合理分担比例的意愿，但更加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日本政府一直坚持通过温馨预算维系美日同盟、保证自身安全，这一立场即使经历冷战结束和政党轮替也从未动摇。

1990年11月9日，议员竹内胜彦就当时美国要求日本提高温馨预算提交质询。该质询询问日美两国交涉过程、日本承担的比例、日本承担的最大限度、依据、美国承担比例、是否要削减自卫队经费、如何看待冷战后美军驻留必要性等问题。<sup>⑤</sup>11月27日，海部俊树内阁提交回复称，日本认为承担驻日美军军费一直是维持日美同盟效力以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会在能力范围内努力提供支持。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确保日美同盟和美军驻留对日本的安全和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sup>⑥</sup>

2009年民主党上台执政后也改变了历来反对温馨预算的立场。2011年民主党政府就改变以往在野党时期的反对态度，在温馨预算协议到期后与美国签订新协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温馨预算。时任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回答为何未能实现大幅度减少温馨预算时表示，国际环境不透明、不稳定，

<sup>①</sup> 中内康夫・榎本浩「不透明感を増す国際情勢と我が国の外交防衛～当面する外交防衛の主要課題～」、『立法と調査』、2010年1月、42-56頁。

<sup>②</sup> 「第193回国会 予算委員会 第3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19320170127003.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19320170127003.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sup>③</sup> 「第198回国会 安全保障委員会 第5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519820190328005.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519820190328005.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2日。

<sup>④</sup> 「第198回国会 外務委員会 第9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519820190424009.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519820190424009.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2日。

<sup>⑤</sup> 「在日米軍駐留経費の負担問題に関する質問と答書」、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a119013.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a119013.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sup>⑥</sup> 「衆議院議員竹内勝彦君提出在日米軍駐留経費の負担問題に関する質問に対する答書」、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b119013.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b119013.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驻日美军对于日本和地区的安定和平仍然具有重要作用。<sup>①</sup>当美国国会因为财政紧缩而希望减少驻日美军甚至撤出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时，菅直人政府深感震惊，只能寄希望继续用金钱支持留下美军海军陆战队。<sup>②</sup>

2013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的同盟贡献的同时仍然强调温馨预算的作用和美日同盟的价值。2017年1月，安倍曾在国会表示，由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了维持与美国的信赖关系，日本会继续提供温馨预算。<sup>③</sup>2018年1月，安倍在国会表示，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代表日美同盟抑制力的海军陆战队非常重要，今后会在维持抑制力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冲绳的基地负担。<sup>④</sup>总之，面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日本更加重视温馨预算在维系同盟方面的作用。

另外，日本关注在多重威胁领域下同盟体系分工问题。2020年5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国会表示，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和严峻，需要在网络、宇宙等新领域维持防卫能力，需要进一步找出威胁并确定费用分担比例问题。茂木还表示，驻日美军对日本的安全和地区稳定均有重要作用，但是维护日本的安全不仅是美军的责任，日本自卫队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分担美军军费。<sup>⑤</sup>11月，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均在国会表示美日在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增加合作也会提升同盟的价值。<sup>⑥</sup>

最后，日本开始思考以综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提高防卫能力来巩固同盟关系。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市川惠一指出，201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大幅度深化，“同盟的发展不能只是以往的延长线，需要适应时代变化的灵活思维”。他认为，应当寻找柔软的创造性观点，要在实施务实的外交政策、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改善安全环境的同时，更多运用理念创新力量（如印太倡议）和经济手段（如国际多边贸易机制）联合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支持。<sup>⑦</sup>

<sup>①</sup> 神田茂・高藤奈央子・加地良文「菅内閣の外交をめぐる国会論議～山積する外交課題と東日本震災への対応～」、「立法と調査」、2011年9月、12-29頁。

<sup>②</sup> 加文 查考马光、乘松聪子：《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董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2-205页。

<sup>③</sup> 「第193回国会 予算委員会 第3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19320170127003.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19320170127003.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sup>④</sup> 「第196回国会 本会議 第3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9620180125003.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9620180125003.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sup>⑤</sup> 「第201回国会 外務委員会 第7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520120200515007.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520120200515007.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17日。

<sup>⑥</sup> 「第203回国会 安全保障委員会 第2号」、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520320201113002.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520320201113002.htm)，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2日。

<sup>⑦</sup> 市川惠一、「問われる日本外交の構想力——インド太平洋の将来を見据えて」、「外交」、2020年11-12月号、30-35頁。



总之，日本政府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的同时，仍然维持温馨预算，试图双管齐下留住美国、维系同盟关系的意图更加明显。而应对网络、太空等新领域威胁的需求和同盟分工问题，也会成为日美谈判的重要内容。

#### 四、日本的威胁认知

本部分将借鉴威胁认知影响同盟负担分担的观点分析为何日本政府坚持上述立场。

##### 1、日美对自由主义国际威胁的认知差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孙茹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胁的性质和美国对外战略取向视为影响同盟负担分担的两大影响因素。具体而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大国威胁时，同盟负担增加，反之减轻。美国战略扩张时，同盟负担增加，反之减轻。<sup>①</sup>这种观点将美国盟友的国际秩序威胁认知视为一致，事实上，近年来日美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日本在温馨预算问题上更加强调通过提升自主防卫能力而留住美国、维系同盟，而非实现自主防卫。

美国和日本均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但是日本同时也担心美国的战略收缩举动会加剧中国崛起所导致的权力转移局面。<sup>②</sup>面对中国崛起，日本一直希望通过提升日美同盟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sup>③</sup>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日益兴起，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受到质疑，美国外交呈现战略收缩迹象。<sup>④</sup>当时，日本越来越相信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sup>⑤</sup>后来由于特朗普在安全领域的孤立主义和贸易领域的单边主义，日本对同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sup>⑥</sup>日本一度担心美国会因为介入亚洲的高成本和遏制中国的难度而提前撤出亚

<sup>①</sup> 孙茹：“美国同盟与国际秩序变革——以分担负担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5页。

<sup>②</sup>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日本を守るため11の提言」、[https://www2.jiia.or.jp/pdf/policy\\_recommendations/2018/181010jpn-security\\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https://www2.jiia.or.jp/pdf/policy_recommendations/2018/181010jpn-security_policy_recommendations.pdf)、検索時間：2019年1月5日；PHP総研、「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た」、[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検索時間：2019年3月2日；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ore-important-ever>, accessed on October 30, 2018.

<sup>③</sup> 菊池努 神谷万史 石田康之、「『インド太平洋』地域外交に向けた日本の外交政策への提言」、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5年3月、143-156頁。

<sup>④</sup>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U.S.-Japan Alliance to 2030: Power and Principle”, <https://spfus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US-Japan-Commission-Full-Report.pdf>, accessed on October 30, 2018.

<sup>⑤</sup> Tsuyoshi Sunohara, “The Anatomy of Japan’s Shifting Security Orient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October 2010, pp.39-57.

<sup>⑥</sup> 久保文明、「総論 トランプ政権 14 か月の軌跡」、平成 27～28 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発展型総合事業）「「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の強靱性—米国、中国、欧州をめぐる情勢とそのインパクト」のプロジェクトの一つとして実施してきた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トランプ政権の対外政策と日米関係」、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8年3月、[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9\\_US/index.php](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9_US/index.php)、検索時間：2018年4月1日。

洲。<sup>①</sup>总之，日本精英普遍认为，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对现有自由国际秩序的冲击。美国的举动让国际社会回归到丛林法则时代，日本战后赖以生存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sup>②</sup>总之，日本为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既要应对中国的挑战更要应对美国的战略收缩，后者的重要性更加明显。正如前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所言，日美同盟已经从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瓶颈转变为限制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即防止美国减少承诺甚至抛弃盟友）的瓶颈。<sup>③</sup>

这种认识使得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虽然在安全方面希望加强同盟遏制能力，但是并不希望美中对峙升级，希望继续维持对华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到现有国际体系中而不是排除在外。<sup>④</sup>另一方面，日本更加希望将美国留在亚洲共同应对中国，而提升防卫能力、温馨预算都是日本提高同盟贡献、对美国展示自身价值的手段。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立即前往纽约与其会晤，竭力表明日本的同盟贡献并劝说特朗普重视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的中长期威胁。<sup>⑤</sup>2017年8月，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上，日本以当时已承担驻日美军军费占比高达74.5%和未来将增加购买美国武器为条件说服美方同意延续2015年达成的日本承担驻日美军军费协议。会议声明特别强调，日本每年用于提升防卫能力的军费不少于2060亿日元，体现出日本以提升防卫能力分担同盟义务的认识，解决了特朗普要求日本分担防卫成本的要求，扫除了同盟关系的障碍。<sup>⑥</sup>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维持温馨预算是日本维护同盟关系，应对美国退出以致威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

## 2、对钓鱼岛局势的威胁认识

如前述分析，日本政府需要向民众说明增加防卫费、温馨预算的合理性，近年来东亚局势的不稳定提升了日本民众对提升防卫力和加强美日同盟必要性的认识，提升了日本民众对增加防卫费和

<sup>①</sup> 高木誠一郎・角崎信也、「総括・提言」、平成27～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発展型総合事業）「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向と米中関係」のサブ・プロジェクトの一つとして実施してきた研究プロジェクト「中国の国内情勢と対外政策」、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7年3月、[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China/](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China/)、検索時間：2018年2月6日。

<sup>②</sup> PHP総研、「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2018年10月、[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検索時間：2020年2月2日；PHP総研、「PHPグローバルリスク分析2017」、[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6/12/risk\\_2017.pdf](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6/12/risk_2017.pdf)、検索時間：2019年3月2日。

<sup>③</sup> Yukio Okamoto,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ssential Alli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pp.59-72.

<sup>④</sup> 佐々江賢一、「トランプ外交の彼方にあるもの」、『国際問題』、2020年9月号、1-5頁；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19—自由・公正で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基づ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http://www2.jiia.or.jp/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jp.pdf)、検索時間：2020年1月10日。

<sup>⑤</sup> 「日本復活の礎となった日米同盟再強化」、『外交』、2020年11-12月号、6-15頁。

<sup>⑥</sup>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ugust 17, 2017, [https://www.mofa.go.jp/na/st/page4e\\_000649.html](https://www.mofa.go.jp/na/st/page4e_000649.html), accessed on May 24, 2020.

温馨预算的容忍度，使得日本政府并未因防卫费连续增长、温馨预算维持现有规模而遭遇危机。

冷战以来，日本朝野两党更加公开地直接讨论具体国家在具体领域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最经常被提及的是朝核问题和中国海洋活动。<sup>①</sup>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日本开始强调“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也使得部分原本并不关注国家安保的日本人认同中国是真正的威胁，成为中日相互敌意加剧的重要时间点。<sup>②</sup>而对中国敌意的上升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和对日美同盟的重视。<sup>③</sup>

上述结果在日本内阁府的民调中得到体现。2010年后，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大幅下降至20%以下，并长时间保持在较低水平，对日中关系感到良好的比例甚至一度降至4.8%。同一时期，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长期高于80%，对日美关系感到良好的比例一度高达88%，认为日美关系重要的比例始终保持在95%左右（见表1）。地区局势紧张也提升了日本民众对日美安保体制的评价。对日美安保条约积极评价的比例在2015年一度高达82.9%，对安保体制（日美合作+自卫队）积极评价的比例也在2015年达到84.6%，认为应当增加自卫队防卫力量的比例持续上升至29.9%，是2009年的2倍多（见表2）。这些数据都体现了日本民众对强化日美安保合作、提升自卫队防卫能力的认可。

表1 2008-2019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好感度民意调查表（单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对美国有亲近感	73.3	78.9	79.9	82	84.5	83.1	82.6	84.4	84.1	78.4	75.5	78.7
日美关系是否良好	68.9	81.8	73	73.4	79.3	83.8	80.6	88	87.1	84.4	74.3	80.2
今后日美关系是否重要								95.8	95	95.2	94.5	95.1
对中国有亲近感	31.8	38.5	20	26.3	18	18.1	14.8	14.8	16.8	18.7	20.8	22.7
日中关系是否良好	23.7	38.5	8.3	18.8	4.8	6.8	5.3	9.5	12.5	14.9	18.3	19.4
今后日中关系是否重要								73.3	72.9	76.9	81.2	75.1

表2 2000-2018年日本对日美安保体制和自卫队的民意调查表（单位：%）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5	2018
对《日美安保条约》积极评价	71.6	73.4	75.1	76.4	81.2	82.9	77.5
对安保体制（日美合作+自卫队）积极评价	71.2	72.1	76.2	76.3	82.3	84.6	81.9
自卫队现有规模适合	66.1	61.8	65.7	65.1	60	59.2	60.1
自卫队规模应增加	13.5	15.8	16.5	14.1	24.8	29.9	29.1

资料来源：上述两表为笔者根据日本内阁府历年对外交、安保和自卫队的民意调查资料整理而成，详见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all.html>，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4日。

<sup>①</sup> Eitan Oren, “Japan’s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 Data from Diet Deliberations 1946-201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0, No.3, 2020, pp.477-510.

<sup>②</sup> Ryoko Nakano, “The Sin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Power Transi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29, No.2, 2016, pp.165-186.

<sup>③</sup> Shun Gong and Kikuko Nagayoshi, “Japanese Attitude Toward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1, No.3, 2019, pp.252-270.

综上，日本人的威胁认识具有两重性：对美国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亚洲的担忧和对中国威胁特别是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的警惕同时存在。两种威胁认识共同交织进一步提升了日本被美国抛弃的恐惧，影响日本在同盟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让日本一直刻意压制国内的反对意见、淡化冲绳基地以及温馨预算问题。<sup>①</sup>而且，钓鱼岛局势不稳定也提升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的认可，在客观上提升了日本民众对防卫费和温馨预算的“容忍度”。

## 五、日本政府的谈判筹码

为何日本能够克服美国压力，只是小幅度增加温馨预算？日本在与美国谈判中主要有以下筹码：

首先，美国认可日本国内压力。美国认识到日本国内强大的民意对日本政府行为的限制，为避免引发谈判对手陷入困境甚至引发对美日同盟的批判，美国在对日交涉过程中会有所克制。根据最新解密外交档案，1989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访美前，美国以国会压力为由要求日本增加温馨预算。时任外务省北美局长有马龙夫表示，如果老布什总统在会谈中提及此事，日本国内会强烈批判美国的压力，海部俊树政府会陷入困境。最终老布什在首脑会谈中没有谈及此事。<sup>②</sup>2016年11月，特朗普在与安倍会谈时反复提及美军驻留经费问题。安倍表示，为了提高同盟对等性，日本政府已修改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导致内阁支持率下降幅度超过10%。特朗普回应称安倍非常勇敢。安倍还再三向特朗普解释，日本除了负担驻日美军军费外，还负担美军的水电费和住宅费等，特朗普认可“美军在日本的成本更为便宜”。<sup>③</sup>

其次，美国对同盟关系和日本提升防卫能力的认可。尽管与其他盟国的盟友相比，日本在军队使用、国内立法、军力投送能力和武器出口四个方面仍然受到限制，有学者将日本称为例外的盟友（exceptional ally），<sup>④</sup>但是日本在2015年通过一系列安保法的举动仍然获得美国的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纳蒂亚·夏德罗（Nadia Schadlow）非常赞赏日本为分担同盟义务而调整国内安保法、不断提升防卫费用、改善防卫能力的举动，并表示美日两国应当积极交涉，使同盟成本分担更加公平。<sup>⑤</sup>安倍卸任后表示，通过安保法使得自己的支持率下降，但也向美国表达了加强同盟关系

<sup>①</sup> H.D.P. Envall, "Underplaying the 'Okinawa Card': How Japan Negotiates Its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7, No.4, 2013, pp.383-402.

<sup>②</sup> 「『思いやり予算』日米会談の議題回避へ30年前も官僚奔走」、<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1224/k10012781011000.html>、検索時間：2020年12月24日。

<sup>③</sup> 「安倍外交、同盟強化が起点 安倍前首相インタビュー中国台頭で米と危機感共有」、『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9月26日。

<sup>④</sup> Jeffrey W. Hornung and Mike M. Mochizuki, "Japan: Still An Exceptional U.S. Al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6, pp.95-116.

<sup>⑤</sup> ナディア・シャドロー、「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は日米の肩にかかると」、『外交』、2020年9-10月号。



的诚意，如果没有安保法，日本将在驻日美军军费问题上面临更大压力。<sup>①</sup>

上述因素使得美国在与日本谈判时不得不有所顾忌，毕竟对美国而言，日本的同盟价值仍然不可或缺，目前日本支付温馨预算对美国而言是“一笔非常好的交易”。<sup>②</sup>已经有美国学者公开呼吁美国要更加重视日本，认为日本战略选择将影响美中大国竞争。<sup>③</sup>

## 六、结语

尽管温馨预算通常被视为美日同盟内部摩擦，但是这一问题给美日同盟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限。在地区局势变动特别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作为日本提高同盟贡献、留住美国的必要手段，温馨预算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由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民众更加重视日美同盟，对增加防卫费、提高防卫能力和提高温馨预算的容忍度在事实上得到改善。

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后改变了特朗普时期轻视盟友的态度，对日本而言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举动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威胁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国内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美国总体的战略收缩态势不会改变，要求日本提升同盟贡献的趋势不会改变。<sup>④</sup>在日美谈判中，美国会顾忌日本国内的民意和日本在地区权力转移格局中的价值而有所克制。温馨预算仍将继续维持小幅增长趋势。

另外，未来美日同盟负担分担问题将更加多元化，美日两国在网络、太空等新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更加重视通过外交手段而非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提升同盟遏制力的可能性都将影响双方对同盟贡献的评估。一方面，美日两国都认识到加强在网络、太空等新领域合作以应对中国的必要性，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势必影响两国对同盟负担分担的评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未来美日两国更加重视通过外交手段而非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提升同盟遏制力的可能性。正如文中分析，日本已经注意到推广印太倡议等理念和推动 CPTPP 等多边国际贸易秩序等经济手段来联合其他国家既能提升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又能影响美日同盟。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也指出美国对外政策过度军事化问题，提倡更多使用非军事手段形成“权力交响曲”（symphony of power）。<sup>⑤</sup>在后疫情时代美日两国财政压力可能加大的情况下，两国将更有可能加强外交手段。

22-27 頁。

<sup>①</sup> 「日本復活の礎となった日米同盟再強化」、『外交』、2020年11-12月号、6-15頁。

<sup>②</sup> 加文·麦考马克、乘松聪子：《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董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

<sup>③</sup> Mireya Solís, “The Underappreciated Power: Japan after Ab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0, pp.123-131.

<sup>④</sup> 中山俊宏、「アメリカの選択——二〇二〇年アメリカ大統領選参考」、『外交』、2020年11-12月号、48-53頁。

佐々江賢一、「トランプ外交の彼方にあるもの」、『国際問題』、2020年9月号、1-5頁。石川 卓、

「安全保障政策の根幹に必要な分析、総合、説明」、『外交』、2020年11-12月号、40-41頁。

<sup>⑤</sup> Robert M. Gates, “The Overmilita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cover the Full Range of Its Pow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pp.121-131.



## 低端锁定、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张帅

**【摘要】** 中国制造业是否陷入“低端锁定”，同自身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关系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本文研究表明中国正成为推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深化的关键因素，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仅相关各方的制造业都出现较为明显的产业升级趋势，且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互补性亦有明显提升。因此，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制造业产业布局的调整并非中国制造业正在遭遇“低端锁定”，相反是各方分工关系互利化，中国主动塑造自身发展环境的结果，中国应通过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产业分工，为自身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 产业升级；低端锁定；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作者简介】** 张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Low-end Lock-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and the East Asia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Zhang Shuai

**Abstract:** Whether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lls into "low-end lock-i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its internal division of labour vis-à-vis that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This research paper shows that China is becoming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During the entire process, not on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all relevant parties have seen a obvious tren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also the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y with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ayout within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does not imply that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low-end lock-in".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benefi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hina's initiative to shape its ow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countries creates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own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Industrial Upgrading; Low-end Lock-in; East Asia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Author:** Zhang Shuai, doctoral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随着中国加入 WTO 等国际组织,中国制造业由之进入“加速通道”。2010 年中国制造业以 1.955 万亿美元的总产值超过美国的 1.95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与规模增长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出现明显的升级现象,2003 年前后机电产品出口就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总值比重的 50%以上,服装纺织品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出现缓慢但稳定的下降,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方向迈进。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网络,尤其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支持,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对分工关系是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约束作用,即“低端锁定”效应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 一、文献综述与数据说明

国际分工形式的变化使得高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业,在产业升级前景上受到的影响因素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变得更为复杂化。

### (一) 文献综述

从 20 世纪末开始,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主流的国际分工形式。产品内分工指某种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在空间上分散展开,形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其中。<sup>①</sup>但生产在空间上的延展并非是有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随着地理距离的增长明显下降,从而在地理上集聚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使全球产业扩散出现“大区域离散小区域集聚”的区域特征,区域内国家借助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中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协作分工关系。<sup>②</sup>目前东亚、北美、欧洲等区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区域生产网络,这些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共同组成了全球生产

<sup>①</sup> 卢峰:“产品内分工”,《经济学(季刊)》,2004 年第 4 期,第 55-82 页。

<sup>②</sup> Henry G. Overman, Stephen Redding and Anthony J. Venable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Income: A Survey of Empiric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January 2003, pp. 353-387; Mitsuyo Ando, Fuku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10167, December 2003, pp.1-36; 许南、李建军:“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世界》,2012 年第 1 期,第 182-183 页。

网络。<sup>①</sup>产品内分工使得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不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只需依据自身比较优势承担特定国际分工工序即可,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sup>②</sup>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可替代性高、竞争力弱的特点,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中,虽能获利却难以通过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改善自身要素禀赋,以致出现被限制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装备环节的“低端锁定”状况。<sup>③</sup>目前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业已面临“低端锁定”状况,按可能导致中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研究方向,且大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相关,这与中国制造业“全球销售,区域生产”的现实相符<sup>④</sup>:

一是吸纳 IFDI 导致的中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偏向于低技术阶段。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过积极吸纳 IFDI 的形式逐渐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来自东亚的 IFDI 一度超过中国吸纳总量的 80%,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⑤</sup>中国最初主要通过依靠廉价的经济要素、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内外环境等优势,迅速成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出口平台,承担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的装配环节。<sup>⑥</sup>IFDI 大量进入中国出口部门,短期看带来了资金、技术,但低下的技术基础使中国制造业形成对 IFDI 的依赖,难以实现可持续产业升级。<sup>⑦</sup>这是因为 IFDI 不仅会对所在企业的技术选择产生负面效应,更可能通过“技能员工窃取”效应导致非合资企业的技术“低端锁定”。<sup>⑧</sup>在加工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主导地位则会导致本地产业结构失衡,削弱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sup>⑨</sup>类似现象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也已出现,目前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虽居世界首位,但由于跨国企业对核心能力的垄断,IFDI 借此获得高额利润,中国相关企业的利润空间则被相应压缩,

<sup>①</sup> 唐海燕:“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9页。

<sup>②</sup> 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8, No.1, June 1999, pp.37-70; Alisa DiCaprio and Sithanonxay Suvannaphakdy, “Ar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idelined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Networks?”,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711, April 2017, p.19; Ronald Jones, Henryk Kierzkowski and Chen Luro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about fragmentation and outsourcing”, *HEI Working Paper*, No.09/2004, October 2004, p.5; 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 WIOD 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第70-79页;李翀:“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81-192页。

<sup>③</sup> Hubert Schmitz, “Glob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Cooperation: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Sinos Valley,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Vol.27, No.9, September 1999, pp.1627-1650; 郑卫峰:“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及向竞争优势的跨度——对中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出口变化的分析及建议”,《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6期,第34-37页;王佃凯:“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第28-31页。

<sup>④</sup> 王琳璨:“中美贸易再平衡: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45页。

<sup>⑤</sup> 陈勇:“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经济体的新分工形式”,《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第82-88页。

<sup>⑥</sup>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Understanding It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omment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10, No.3, September 2011, pp:97-99.

<sup>⑦</sup> 时磊:“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第48页。

<sup>⑧</sup> 时磊、田艳芳:“FDI 与企业技术‘低端锁定’”,《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第75-80页。

<sup>⑨</sup> 刘志彪、张晔:“中国沿海地区外贸加工贸易模式与本土产业升级:苏州地区的案例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8期,第57页。

难以推动自身产业升级。<sup>①</sup>随着中国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提升,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出现候鸟式转移,即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向劳动力成本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sup>②</sup>2018年前后,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IFDI从中国流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便曾被部分观察者认为是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衰退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③</sup>

二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体系。通过进口生产投入产品,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外部技术支持和知识引进,虽可在短期内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但会形成对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降低自身研发的积极性。<sup>④</sup>与此同时,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后出口,生产过程本身技术含量和获得的附加值都相对有限,以致中国制造业规模的增长成为“丰收贫困”。<sup>⑤</sup>更为严重的是,跨国公司作为供应链的上游企业,通过掌控供应链使得下游企业形成价值巨大的专用设备,并通过模块化生产的方式使中国的下游企业不仅难以掌控整体生产工艺,再辅之以知识产权或专利技术设置障碍,导致中国企业难以提升自我创新能力。<sup>⑥</sup>如机电产品虽已成为中国的“头部”出口产品,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活动高度依赖外部中间产品的支持,因在一定程度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自身获得的附加值相对有限。<sup>⑦</sup>外部输入技术的高度依赖,还使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一旦出现触及发达国家核心利益的状况就会面临各种形势的阻碍。<sup>⑧</sup>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争端,其实质目的就是限制中国获取外部技术来源的方式,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sup>⑨</sup>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缺乏自身核心技术,因而在产业升级中经常会出现“双重锁定”的状况,即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高端制造业领域面临日韩等国的“围堵”,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受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追击”。<sup>⑩</sup>

<sup>①</sup> 杜传忠、冯晶、李雅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低端及其突破路径实证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18页。

<sup>②</sup> 李玉梅:“东亚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候鸟经济’现象与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因应策略”,《国际贸易》,2015年第11期,第43-48页。

<sup>③</sup> 张帅:“产业升级、区域生产网络与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6页。

<sup>④</sup> 吕越、盛斌:“探究‘中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之谜”,《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10期,第103页。

<sup>⑤</sup> 夏平:“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3期,第60-63页;关志雄:“中国工业应警惕‘丰收贫困’陷阱”,《中国经济快讯》,2002年第36期,第24-25页;欧定余、陈维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下的‘FDI—贸易关联’——基于中国数据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7-111页。

<sup>⑥</sup> 胡大立、殷霄雯、胡京波:“战略俘获、能力丧失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基于网络关系能力的调节作用”,《当代财经》,2020年第1期,第91-92页。

<sup>⑦</sup> 于明远、范爱军:“人口红利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2期,第3-11页;巫强、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第83-93页。

<sup>⑧</sup> 周勤、周绍东:“产品内分工与产品建构陷阱:中国本土企业的困境与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8期,第58-67页。

<sup>⑨</sup> 张宇燕、冯维江:《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光明日报》,2018年4月24日第15版。

<sup>⑩</sup> “Vietnam Beats China, India to Become Next Manufacturing Hub: Reports”, *The Eurasian Times*, <https://eurasianimes.com/vietnam-beats-china-india-to-become-next-manufacturing-hub-reports/>, accessed on November 14, 2021.

尽管既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路径高度受制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但上述研究依然是在传统的雁型模式理论框架下思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业升级，将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其他成员进行二元对立。事实上，在目前区域生产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的背景下<sup>①</sup>。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制造业竞争力整体变动的结果，相应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状况亦会带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行调整。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是否陷入“低端锁定”应该聚焦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的分工关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种状态究竟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升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样本是2003-2018年，全球62个国家相关变量的数据。之所以如此，在于此时中国制造业已逐渐“消化”加入WTO后的影响，而2019年、2020年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外贸环境处于一种急速变动的“非正常”状态，相关经济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制造业与外界分工关系，以及这种分工关系对自身产业升级的影响。样本国家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占据全球同期数据95%左右，足以反映国际分工体系的全貌。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第三版中有关制造业的分类的三位数据刻画制造业状况，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属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为表述之便，当本文提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或“东亚”时，如无特殊说明则指代日本、韩国与东盟十国。

##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当前特征

通过对比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本节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包括中国）2003年（表1）和2018年（表2）的贸易结构，可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有如下分工特征：首先，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不仅贸易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且存在高水平的中间产品（初级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之和）贸易，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水平远高于自身与北美、欧盟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区域内的中间产品贸易占到自身贸易总额的65%左右。特定区域内部经济体之间高水平的中间产品贸易往往被视为考察区域生产网络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标志，这表明样本期间东亚区域分工深度明显上升。

<sup>①</sup> 唐海燕：“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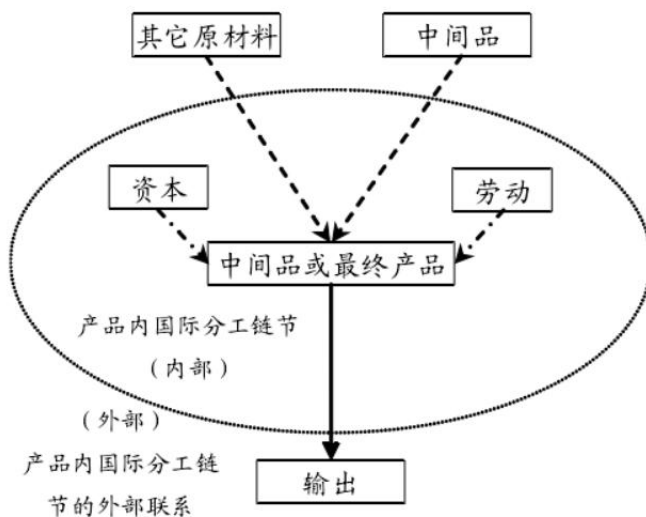


表 1 2003 年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特征（单位：亿美元）

	生产网络							生产网络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半成品	中国	0	919	571	738	1552	1387	零部件	中国	0	2116	614	1488	4478	3896	3896
	日本	1610	0	1106	1387	1449	972		日本	3217	0	1668	3798	9453	5579	5579
	韩国	1345	394	0	615	488	350		韩国	1712	737	0	1224	2775	2169	2169
	东盟	672	716	264	0	687	935		东盟	1270	2157	747	0	4367	3361	3361
	北美	592	992	475	582	0	4264		北美	1349	2085	1247	3125	0	8047	8047
	欧盟	1015	1271	522	1116	8427	0		欧盟	2853	1656	829	2437	12338	0	0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消费品	中国	0	1980	410	359	3484	2240	初级产品	中国	0	920	414	502	315	382	382
	日本	468	0	435	410	990	660		日本	212	0	144	98	95	58	58
	韩国	186	176	0	70	353	166		韩国	263	419	0	112	101	37	37
	东盟	124	613	89	0	1865	1216		东盟	977	2084	615	0	778	815	815
	北美	215	809	217	353	0	2264		北美	950	1740	553	504	0	1718	1718
	欧盟	293	895	283	332	3735	0		欧盟	259	580	129	283	2863	0	0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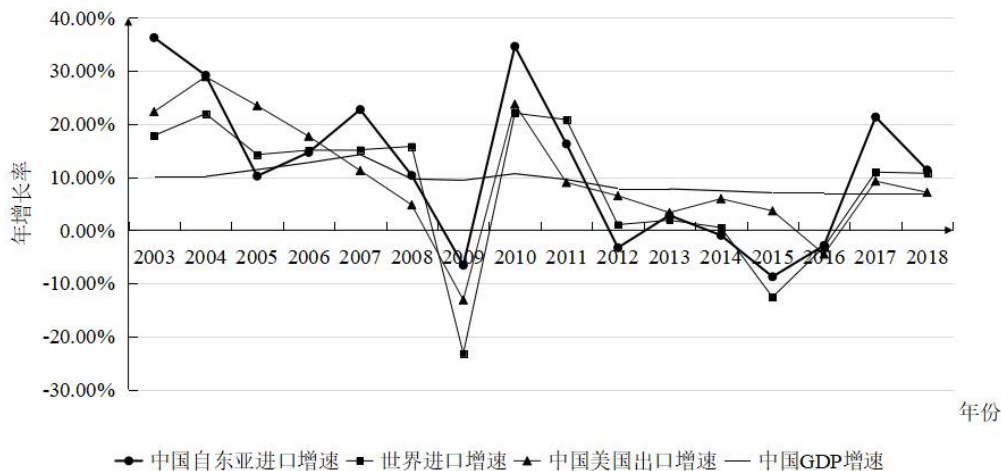
其次，虽然样本期间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仍未能形成一个“经济闭环”，即终端产品的销售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尽管除日本外，东亚国家目前均普遍维持中高速增长，且域内贸易额不断上升，却大都以中间产品为主。目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整体上在域内消费品仅占贸易总额的 12% 左右，甚至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在消费品高度依赖欧美的终端消费市场，难以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完成“生产——消费”的经济循环。这一分工的结果便是中国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中中间产品进口的增速与国际市场的进口增

图1 产品内国际分工示意图



资料来源：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机制与效应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第20页。

图2 2003-2018年中国进口与GDP增速



速，尤其是美国市场进口增速有关，与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成员“弱相关性”（图2），表明中国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进口大都仍是服务于外贸出口，存在明显的“进口引致出口”现象。<sup>①</sup>在终端消费市场领域，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的维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美国则是“重中之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对美顺差占当年中国外贸顺差总额的92%。中国成为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入国际市场的出口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三角贸易”。<sup>②</sup>

最后，中国正常为推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产业分工深化趋势的重要推动力。在东亚区域生

<sup>①</sup> 张杰、郑文平、陈志远、王雨剑：“进口是否引致了出口：中国出口奇迹的微观解读”，《世界经济》，2014年第6期，第3-26页。

<sup>②</sup> 安礼伟、杨夏：“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4期，第15-23页。

产网络内部，日本、韩国均在中间产品贸易上保持较高的对华贸易顺差，但顺差绝对值在减小。与此同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中间产品顺差明显增长，贸易顺差占比从7%上升为34%。国际贸易中，因为中间产品进口国通常还要进行一定的生产再加工，加之中间产品往往凝聚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这一变化证明从制造业技术发展层次出发，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分工状况已经开始从“日韩——中国、东盟”的二级梯度分工，向“日韩——中国——东盟”三级梯度分工转变，即中国已经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上游供应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表2 2018年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特征（单位：亿美元）

	中间产品								初级产品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半成品	中国	0	2890	3084	10736	8592	8065	中国	0	6567	5301	13110	25878	19684	19684
	日本	4052	0	1864	3235	1875	1311	日本	7664	0	1998	5696	10947	5382	5382
	韩国	4295	1171	0	2597	1536	1572	韩国	9068	872	0	5194	5487	3656	3656
	东盟	4572	2046	1166	0	2108	2231	东盟	7198	4123	2367	0	7074	7605	7605
	北美	2589	1716	1115	1532	0	8892	北美	4013	1682	1683	3005	0	8823	8823
	欧盟	4946	2215	1284	2544	16737	0	欧盟	13274	3073	2931	5512	22154	0	0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消费品	中国	0	3784	1680	4605	15736	11771	中国	0	1450	828	3493	1185	1340	1340
	日本	1418	0	558	736	1115	846	日本	611	0	576	538	264	152	152
	韩国	1593	215	0	703	367	309	韩国	1243	785	0	1494	530	216	216
	东盟	1569	1958	949	0	5652	3661	东盟	6364	3206	1523	0	2251	2223	2223
	北美	1182	1051	501	771	0	4394	北美	4277	3359	2407	2731	0	6208	6208
	欧盟	2387	1164	722	1097	6504	0	欧盟	2961	950	763	1699	5412	0	0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中国	日本	韩国	东盟	北美	欧盟	欧盟	

### 三、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样本期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分工关系的深化在中国制造业产生升级中的作用，本节首先使用显性比较优势（Reve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对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RCA指数最早由Balassa（1965）提出。<sup>①</sup>计算方式如下：

$$RCA_{c,i} = \frac{x(c,i) / \sum_i (c,i)}{\sum_c (c,i) / \sum_{c,i} (c,i)} \quad (1)$$

式（1）中， $x(c,i)$ 代表c国i产业出口额。若 $RCA \geq 2.5$ ，表明c国i产业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若 $1.25 \leq RCA \leq 2.5$ ，表明c国i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 $RCA \leq 1.25$ ，则表明c国i产业具有

<sup>①</sup> Bela Balassa, "Trade Liber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33, No.2, May 1965, pp.99-123.

中毒国际竞争力,若  $RCA < 0.8$ , 则 c 国 i 产业仅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sup>①</sup>之所以通过出口数据考察研究对象产生升级状况,是因为在国际层面,国家产品要面临更“纯粹”的市场竞争考验,因此外贸数据能够更“真实”的体现一国产业竞争力,数据的“可得性”何“可比性”也更佳。<sup>②</sup>通过对比表 3 和表 4 可知,可就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在样本期间的制造业发展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样本期间内中国制造业总体竞争力有显著增强,中国制造业拥有中等竞争力及以上的产业门类的数量从 2003 年的 28 个增至 2018 年 35 个,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伙伴相比,数量优势进一步增大。这符合中国“大国经济”的现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规模的增长,目前世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向更加依赖中国的方向发展。

其次,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仍有待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门类依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纺织业领域(171、182),以及机电产品领域(300、314、315、322、332),但在被视为工业化基础的机械制造领域(292)的生产领域,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远逊于日韩等传统制造业强国,日本明显仍居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经济大国,在劳动密集型领域产业升级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初期制造业竞争力主要集中在简单的日用消费品领域(151、153、173)的窘境。<sup>③</sup>

表 3 2003 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国相关制造业门类竞争力状况

	极强竞争力	较强竞争力	中等竞争力
中国	171、173、181、182、191、 192、231、300、314、315、 323、332、342、359	172、202、269、289、293、311、313、 322、333、361、369	252、261、351
日本	332、351、359	251、271、291、292、312、314、319、 321、323、341、343	231、241、243、300、311、 331、333
韩国	243、322、351	171、172、173、300、321、323、332	191、232、241、251、272、 281、314、341

<sup>①</sup>张鑫:“中俄木质林产品贸易显性比较优势及其互补性分析——基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 1996—2015 年的数据”,《世界农业》,2017 年第 10 期,第 117 页。

<sup>②</sup>胡昭玲、江璐、汪子豪:“全球价值链前入、管理效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117-126 页。

<sup>③</sup>关于本文中三位数字对应的特定产业,详见: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Revision 3*, <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Family/Detail/2>, accessed on December 1, 2021.

新加坡	232、300、321	221、241、311、314、322、323	160、312、319、332、333
印度尼西亚	151、160、171、181、192、 202、210、243	154、173、201、222、251、271、272、 314、369	241、319、361
泰国	153、181、243	154、181、191、192、251、269、293、 300、311、319、321、323、332、333、 359、369	172、202、241、252、261、 281、291、312
越南	153、173、191、192、322、 323	171、172、201、202、243、332、359、 361	182、261、269、271、313、 314
马来西亚	202、300、321、323	201、243、251、312、361	232、313、314
菲律宾	300、311、319	160、191、202、312、351	
缅甸	153、154、173、181、191、 192、202、221、321	160、201、272、351	271
老挝	153、155、160、181、201、 210、272、323	154、192、241、269、322	313
文莱	222、241、353	271、281、291、312、331	289
柬埔寨	153、173、181、182、191、 281、351、361	172、192、201、202、311、322、331、 332、341、342、353、359、369	160、173、291、323、333

最后，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在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形成涵盖不同梯度的层次性分布。日韩两国制造业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事关制造业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行业，除上文提及的机械制造业行业外，还包括诸如仪器制造（332）、电子元器件（321）等高附加值产业，东南亚国家除马来西亚、泰国外等拥有一定工业基础国家外，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亦有明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整个分工过程中则扮演中间“沟通者”的角色，而东南亚相关国家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类企业组装基地的角色，因此样本期间东南亚国家终端消费品的竞争优势明显提升。

表 4 2018 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国相关制造业门类竞争力状况



	极强竞争力	较强竞争力	中等竞争力
中国	171、182、300、314、 315、322、332	172、173、181、191、192、202、231、243、 261、269、281、289、293、311、313、321、 323、342、351、359、361、369	251、252、271、291、312、 319
日本	332	243、271、291、292、312、314、319、321、 331、341、343、351、352、359	231、241、251、252、269、 311
韩国	314、321、332、351	232、241、243、293、319	252、281、292、300、312、 323、341、343
新加坡	232、321	154、160、221、241、331、332、333、353	155、242、272、292、300、 312、314、319
印度尼西亚	151、160、171、181、 192、202、210、243	154、173、201、182、222、251、271、272、 314	241、319、361
泰国	153、243、251	154、182、201、241、293、300、319、323、 343、359、369	155、171、173、202、252、 269、289、291、311、312、 321、332、333、341
越南	153、173、181、191、 192、323、361	171、172、182、201、202、243、313、314、 332、359	261、269、271、300、311、 319、321、322
马来西亚	321	201、202、221、222、232、251、293、300、 314、323、331	154、241、243、261、272、 292、312、319、361
菲律宾	300、311、319、321	160、191、202、312、351	323、332
缅甸	153、154、173、181、 192、202、	160、191、201、221、272、351	271、353
老挝	153、155、181、210、 272、323	154、192、241、269、313、322	361
文莱	160、201、222、241、 353	271、281、291、312、331	289、315、332、333
柬埔寨	153、173、181、182、 191、281、351、361	172、192、201、202、322、331、332、341、 342、353、359	160、173、291、333、369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已经形成涵盖高、中、低等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产业体系。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不仅没有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国制造业产生所谓“挤出”或“抢走”效应,反而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通过更为细致的产品内分工推动了彼此制造业产业发展,这也为各方在外贸领域的关系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基础,解释了上节为何样本期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彼此分工会不断深化。<sup>①</sup>

#### 四、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贸易互补性分析

样本期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中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门类数量和技术含量都有明显提升,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的分工关系从“量”、“质”亦有一定深化,但目前中国制造业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依然与日韩两国存在较大差距,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东南亚国家快速升级的竞争,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是否正面临来自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的“双重挤压”,这决定了中国制造业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市场关系。在国际市场中,国家之间的市场合作空间为双边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国家在贸易上的互补性则决定了双边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若是样本期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贸易互补性下降,则双方当下的关系将不具可持续性。<sup>②</sup>

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简称TCI)衡量中国与相应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在国际市场的关系。<sup>③</sup>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在显性比较优势基础上建立的,总体思路为若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恰是另一国的劣势进口产品,则认为两国在该产品上具有互补性。有关具体某类商品的贸易互补性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C_{c,d,i} = RCA_{c,i} \times RCA_{d,i}^m \quad (2)$$

式(2)中, $C_{c,d,i}$ 为 $c$ 、 $d$ 两国在产品 $i$ 上的贸易互补性, $C_{c,d,i}$ 越大则两国贸易互补性越强,当 $C_{c,d,i} > 1$ 时,则表明中国与相应的东亚国家在产品 $d$ 上存在互补性;反之若 $C_{c,d,i} < 1$ ,则表明中国与相应的东亚国家在产品 $d$ 上不存在互补性。 $RCA_{c,i}$ 为 $c$ 国在产品 $i$ 上的显性比较优势,而

<sup>①</sup> 邓军:“生产分割、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存关系——对东亚生产网络的考察”,《财贸经济》,2011年第3期,第61-66页。

<sup>②</sup> 李倩:“CAFTA 双边贸易前景研究——基于贸易互补和修正引力模型的分析”,《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4-18。

<sup>③</sup> 毕燕茹、师博:“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测算及分析——贸易互补性指数与引力模型研究”,《亚太经济》,2010年第3期,第47-51;周茂荣、杜莉:“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第45-52页。

$RCA_{d,i}^m$  表示  $d$  国在  $i$  产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

$$RCA_{d,i}^m = \frac{x^m(d,i) / \sum_i^m(d,i)}{\sum_d(d,i) / \sum_{d,i}^m(d,i)} \quad (3)$$

式 (3) 中,  $x^m(d, i)$  为  $d$  国  $i$  产品的进口量,  $\sum_i^m(d, i)$  为  $d$  国总的进口额。若研究当中同时存在多种不同行业, 则可以使用两国贸易中各类产品贸易额占为权数, 以相关产业的贸易互补指数为依据, 计算两国加权平均贸易互补指数即综合互补性指数

$$C_{c,d} = \sum_i C_{c,d,i} \times \frac{X_w^k}{X_w} = \sum_i RCA_{c,i} \times RCA_{d,i}^m \times \frac{\sum_d(d,i)}{\sum_{d,i}(d,i)} \quad (4)$$

式 (4) 中,  $C_{c,d} > 1$  时, 表明两国贸易互补性强,  $C_{c,d}$  值越大, 互补性越强; 当  $C_{c,d} \leq 1$  时则表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较不明显, 相应的  $C_{c,d}$  值越小, 则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越弱。

本文样本期间中国虽与绝大多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保持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表 6), 具体表现却有所不同:

首先, 中国与日韩两国在样本期间, 均维持了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但在中日贸易互补性出现波动停滞之时, 中韩贸易互补性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 1.29 上升为 1.83, 从基本与中日经贸互补性持平, 到大幅超越日本。结合表 3 与表 4 可知, 之所以如此与样本期间韩国制造业在中高技术环节升级, 可更好的“匹配”中国制造业的相关需求有关。但总体上中国与日韩两国较高的贸易互补性, 表明目前中国对两国较高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在中间产品领域的逆差是符合中国制造业发展需求的, 是中国制造业与日韩制造业比较优势互补的结果。

其次, 在东南亚方向上, 中国与除印度尼西亚外的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均保持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按照相关国家制造业主要门类不同,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样具有一定工业东南亚国家, 虽然有所波动, 但总体上中国均与其维持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新加坡这样的港口国家, 中国与其贸易互补性更是在样本期间的大多数年份均维持在 2 的“高位附近”, 这表明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中国与东南亚, 甚至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枢纽”; 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后发国家, 中国与其贸易互补性均呈现一定改善, 尤其是越南、老挝等国始终维持较强的贸易互补性。这些东南亚国家在样本期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有较大发展, 但与中国的分工关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这表明其制造业升级明显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非替代<sup>①</sup>; 文莱以油气工业为主, 样本期间中国经济能源需求大增, 对外能源依赖度不断上升, 所以中国与文莱贸易互补性的亦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sup>①</sup> 施展:《溢出: 中国制造未来史》,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表5 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制造业互补性制度变动  
(中国进口与相关国家出口)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缅甸	老挝	文莱	柬埔寨
2003年	1.29	1.29	1.74	1.07	1.15	0.56	1.70	2.60	0.80	1.40	0.74	0.25
2004年	1.34	1.30	1.84	1.04	1.16	0.54	1.67	2.66	0.67	1.30	0.62	0.29
2005年	1.39	1.52	1.34	0.98	1.23	0.55	1.93	2.79	0.56	1.24	0.70	0.28
2006年	1.38	1.60	1.39	0.94	1.29	0.58	1.97	2.85	0.49	1.22	0.62	0.27
2007年	1.27	1.65	2.15	0.89	1.21	0.64	1.84	2.74	0.46	1.26	0.61	0.26
2008年	1.27	1.59	2.13	0.88	1.14	0.61	1.41	2.75	0.44	1.04	0.59	0.29
2009年	1.31	1.56	2.04	0.85	1.11	0.61	1.80	2.41	0.42	1.14	0.70	0.37
2010年	1.27	1.55	2.07	0.81	1.08	0.61	1.62	2.03	0.40	1.05	1.14	0.34
2011年	1.29	1.45	1.96	0.83	1.08	0.69	1.70	1.87	0.42	1.04	1.20	0.33
2012年	1.27	1.52	1.95	0.82	1.05	0.87	1.75	2.18	0.47	0.95	1.31	0.32
2013年	1.26	1.58	2.08	0.79	1.06	0.90	1.84	2.32	0.36	0.79	1.03	0.24
2014年	1.27	1.54	2.07	0.80	1.09	0.85	1.85	2.27	0.41	0.91	1.02	0.32
2015年	1.20	1.51	2.11	0.80	1.06	0.90	1.85	2.40	0.58	1.34	1.09	0.32
2016年	1.19	1.55	2.16	0.80	1.11	0.99	1.90	2.52	0.58	1.14	0.97	0.34
2017年	1.22	1.68	2.10	0.83	1.09	1.02	1.89	2.07	0.53	1.05	1.11	0.33
2018年	1.20	1.83	2.03	0.82	1.05	1.01	2.04	2.17	0.53	1.11	1.21	0.35

简言之，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绝大部分成员制造业虽在样本期间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产业升级趋势，但中国并没有面临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双重挤压”，相反在以“中国进口”为基础考察时，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相关成员国均表现出较高的贸易互补性，表明中国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进口对自身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较为重要的正向影响，而中国进口需求的变化亦符合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制造业产业升级要求。综上所述，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之间，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高、中、低等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产业体系。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不仅没有面临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国制造业所谓“挤出”或“抢走”效应，反而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通过更为细致的产品内分工推动了彼此制造业产业发展，这也为各方在外贸领域的关系的良性发展和较强互补性创造了基础。<sup>①</sup>

## 五、结论与建议

### （一）结论

本文以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关系，及其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升级的影响为切点如，研究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在中国制造业升级中的影响。具体而言包括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经贸关系、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贸易互补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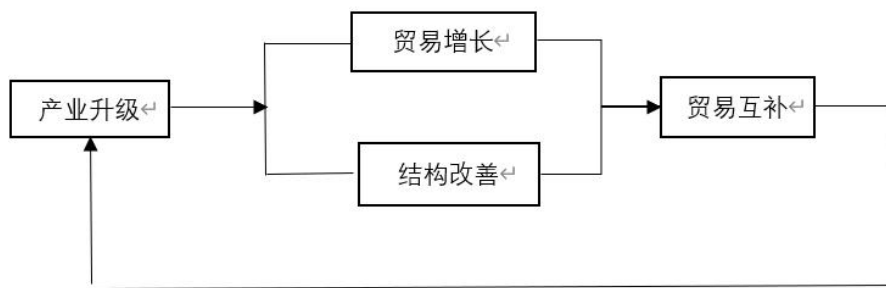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与东亚国家贸易、制造业产业发展关系

Fig.7 China's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高水平产业分工关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但因为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则意味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产品可以更好的进入国际市场，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都可从中获益。<sup>②</sup>因此，虽然整个过程当中，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均出现

<sup>①</sup> 邓军：“生产分割、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存关系——对东亚生产网络的考察”，《财贸经济》，2011年第3期，第61-66页。

<sup>②</sup> David Roland-Holst, Iwan Azis and Li-Gang Liu,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Trade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January 2003, pp.1-50.



较为明显的产业升级趋势，但不仅贸易规模稳步增长，同时贸易结构也逐渐改善，从最初的立足于制成品的产业间贸易逐渐向以中间产品为主的产品间贸易转变。换言之，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组成了某种性质的“生产共同体”，有效抑制各方之间贸易不平衡向政治问题发展，并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面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时做出相对积极的反应，最终使得的彼此经贸关系呈现出“产业升级——贸易增长——结构改善——贸易互补——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模式（图7）。

## （二）建议

首先，加快落实“双循环”战略。样本期间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高水平分工关系得益于域外消费市场的支撑，使得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当前的分工关系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美国2018发动对华贸易战，正是试图通过发挥自身终端消费市场的优势，推动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双循环”战略的实质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从供需两方面减少对以贸易为主的国际循环的依赖，加强由生产、销售、流通和消费形成的国内循环。其核心内容是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以及旨在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和产业升级的供给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强化中国与外界的分工关系，使其进入一种内外互动的良性发展轨道。<sup>①</sup>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下一阶段的分工关系建设亦应建立在中国自身需求与发展基础上。

其次，转变对外经贸关系审视标准。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间互利的分工关系，决定了彼此产业升级并不会导致经贸关系滑向恶性竞争，相反会推动彼此分工关系进步向互利共赢方向发展。因此，面对部分制造业，尤其是日韩制造类企业由中国向东南亚转移，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中国制造业被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孤立，而应积极加以引导，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业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产业分工关系，将其作为自身产业升级的新起点。事实上，部分日韩终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同时，中国与日韩两国在高科技上游企业展开深入合作，而前者的转移又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

最后，通过区域经济制度的建设可以有效稳固中国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间的分工关系。东亚国家长期以来只能通过东盟为平台的“东盟+N”框架，已无法适应当下形势发展的需要，更遑论还要面临各种相互叠加重复的区域制度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效率的损失。<sup>②</sup>2020年11月15日，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全球化进程停滞，中美贸易关系恶化长期化的大背景下，RCEP对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也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创造了有力条件。

<sup>①</sup> 关志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https://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201013.html>，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5日；崔志刚：“科学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09/c\\_112671454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09/c_1126714546.htm)，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5日。

<sup>②</sup> 成新轩：“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国产业战略地位的调整”，《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29-46页。

但 RCEP 目前各项具体规定仍属于常规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国应力争尽快加入 CPTPP。日本官方在是否吸纳中国加入 CPTPP 的问题上的态度已相对灵活。

## 新冠疫情冲击与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深化

李冰洁

**【摘要】** 新冠疫情暴发肆虐促使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深刻变迁，各国“自保”心态更加突出，更加希望在变局中保障国家发展并获取战略优势。疫情下的美国对维系自身霸权更为忧虑，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与科技、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安全等领域深化推动对华竞争，令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持续考验。然而，美国抬升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一面亦会受到潜在对华合作需要、国内利益集团不同诉求以及其他国家的自主心态等因素对冲，将会呈现更多动态性、复杂性。未来，美国需要校准对华战略认知和实践，不让竞争对抗过度主导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关键词】** 新冠疫情；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 李冰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US Competitive China Policy

Li Bingjie

**Abstract:** The raging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has prompte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order. The “self-protection” mentality of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hoping to ensur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obtain strategic advantages in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Since the outbreak, the United States is growingly worried about maintaining its hegemony. It regards China as its primary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deepens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diplomacy, military and security, while pushing Sino-US relations towards continuous challenges. However, the emphasis on the competitive aspects of the US China policy is also hedg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potential necessity fo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its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autonomous mentality of other countries, leading to more

dynamic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alibrate its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oward China in order to prevent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aspects from overly dominating its China policy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Author:** Li Bingjie,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灾疫，人类生产生活、国家间关系互动无不受其重大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格局亦随之加快演变。与新冠疫情的全方位冲击同时到来的，是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和2021年新政府上台执政，其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安全政策也在经历种种变革，其对华政策进一步向战略竞争方向调整则是变革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分析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以及疫情下的美国从哪些方面推动对华政策调整至更加具有竞争性，并探究对冲美国进一步推动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内外因素。

## 一、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治理的挑战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次跨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更是一场全球性的动荡危机，推动全球秩序和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有学者指出“疫情堪比世界大战，既有国际秩序难以为继”。<sup>①</sup>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更加脆弱乏力，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国家间竞争升温，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令国际安全治理面临更大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更加混沌，供应链危机、通胀危机、债务危机多重叠加，大国实力对比分化组合加快。一方面，全球供应链被严重扰乱，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遭遇打击，跨境贸易显著下滑。全球“芯片慌”缺口突出，半导体供应不足，多家车企、智能产品企业因之停产停工。美国持续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恶果显现，给全球供应链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全球供应链形态可能被迫转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涨、普涨，铜价、煤价、油价2021年内涨幅均超30%，供给侧失调严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供给端成本压力，传导消费品价格上扬，通胀率持续上行压力较大。国际物流全面受阻，原有跨境运输网络遭遇严重扰乱，海运危机尤为紧迫：2021年3月，“长赐号”货轮搁浅造成苏伊士运河大拥堵，上百艘船只被困或被迫绕道，如美国沃尔玛、瑞典宜家等大型跨国企业甚至自行购买集装箱和独立租船以应对航运危机。与此同时，与港口衔接的交通网络滞缓，铁路运输“一柜难求”，推动空运价格大幅上涨。“后疫情时代”意味着疫情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限制逐渐

<sup>①</sup> 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第1页。

下降，但疫情仍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周期性、中断性、效率性的安全冲击。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全球推进和各国经济刺激措施出台，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但是对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仍将持续。另一方面，大国力量对比呈现中美加快接近、其他国家不同程度受损的态势：中美实力对比日趋接近，诸强实力受损。经济方面，中美GDP规模差距快速缩小，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24.1万亿国际元，美国为20.9万亿国际元，两国差距加速拉大。<sup>①</sup>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美国GDP萎缩3.5%，创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的2020年“亚洲力量指数”（Asia Power Index），美国虽然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军事能力、国防网络和文化影响力领先，但疫情暴发以来，其综合得分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尤其是在经济关系、经济发展前景和外交影响力失分于中国，国际威信前所未有下滑，两国整体差距加速缩小。<sup>②</sup>传统强国实力受损，日本2020年GDP同比实际增长率为-4.4%，创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个人消费、出口和企业投资大幅下降，2021年经济复苏依然迟滞<sup>③</sup>；欧元区经济2021年内两次陷入衰退，缓慢的疫苗接种进度和新冠封锁限制阻碍经济反弹，欧洲虽然多次试图重启经济，但皆因疫情再次爆发而叫停。新兴经济体也遭遇重创，如巴西2020年GDP下跌4.1%，印度2020-2021财年GDP增长率为-7.3%，创40年来最低水平。各国无论大小强弱，皆受到疫情的严峻考验。

第二，国际政治面貌更加失序，疫情下的全球治理脆弱和国家间竞争加剧交织发酵。一方面，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措手不及，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脆弱不堪。疫情暴发初期，欧盟的政治应对机制基本失灵，各国自顾不暇，在关闭边境等问题上各行其是，甚至发生互相截留物资的闹剧。欧盟各成员国彼此相互指责，凝聚力大受冲击，单一市场、共同边境政策在疫情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sup>④</sup>。在东南亚地区，由于边境管控措施，原有的庇护通道被关闭，一艘载有数百名罗兴亚穆斯林难民的船艇，被马来西亚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靠岸，漂流回孟加拉途中有数十人死亡，罗兴亚船民危机再现<sup>⑤</sup>。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有2.6千万至4千万人口因疫情陷入贫困，由

<sup>①</sup>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Updated by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 accessed on July 2, 2021.

<sup>②</sup> Hervé Lemahieu, Alyssa Leng, "Asia Power Index Key Findings 2020", Lowy Institute, 2020,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ownloads/lowy-institute-2020-asia-power-index-keyfindings-report.pdf>, accessed on July 2, 2021.

<sup>③</sup> 內閣府。「國民經濟計算（GDP統計）」、<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検索時間：2021年11月17日。

<sup>④</sup> 金玲：“世界秩序演变中的欧盟一体化前景”，《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第32-34页。

<sup>⑤</sup> “‘罗兴亚船民危机’再现：联合国表示疫情防控不能关闭庇护通道”，<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6702>，上网时间：2020年7月2日。



于封锁政策导致部分民众的短期收入锐减，诸如发放现金的社会保护措施覆盖率仅为5%（全球平均水平为22%）<sup>①</sup>。无论是欠发达地区还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医疗资源丰富、公共卫生体系先进的发达国家，在疫情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多边合作则显得口号大于实际行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多边机制并没能有效阻止大多数国家采取单边应对的态度。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特别峰会除了发表声明承诺共同应对威胁外，也没能达成其他更加有效的国际协调。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号召为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但G20成员国并没有在会议上做出明确的承诺。世界卫生组织在专业性和权威性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其权威不断受到美国的断供挑战和威胁。这些都反映出疫情的特殊性质，以及各国自顾不暇的现状。疫情的蔓延极大地暴露和放大了多边主义在治理效率上的不足，现有多边机制应对疫情的“乏力”，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和行动力。<sup>②</sup>另一方，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回潮，国际社会更显“丛林化”。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之久和波及范围之广已远超预期，不少国家在疫情暂时得到缓解时，非但没有致力于国际抗疫合作，反而急于寻求替罪羊来转嫁责任，上演索赔闹剧。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特朗普政府及对华强硬的美国右翼鹰派片面指责中国要为“疫情担责”，并由此对中国展开空前的战略施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人文交流等领域。美国还借助疫情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接连对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等国家实施严厉制裁，全然不顾人道主义。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成为美国权力争夺的工具。美国利用“疫苗外交”拓展影响力，拉拢印日澳三国合作生产疫苗，试图对印太地区的疫苗生产和分配施加更多控制。不过，美国此举并不能改变国际体系向多极化演进的方向，新冠疫情将进一步催化新旧世界秩序过渡。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掌控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大国与中小国家共同协调全球疫情防控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秉持客观专业的精神，坚决抵住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sup>③</sup>。有学者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也是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结束，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建立和维持一种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将趋于扁平化”<sup>④</sup>。

第三，国际安全态势更加复杂，非传统安全危机空前影响国际安全态势，新型安全问题凸显令国际安全治理难度加大。一方面，公共卫生安全一直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新冠疫情让人类前所未有地直观感受到了全球化时代大流行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在人口、物资、信息快速流

<sup>①</sup> Ugo Gentilini, Mohamed Almenfi, Ian Orton and Pamela Dale, "Social Protection and Jobs Responses to COVID-19: A Real-Time Review of Country Measur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635>, accessed on September 28, 2020.

<sup>②</sup> 杨原、张宇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政治与安全”，载张宇燕、邹治波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1》，2021年1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7页。

<sup>③</sup> 杨洁勉：“新冠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4-5页。

<sup>④</sup> 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64页。

动的背景下，防治工作的艰难程度。新冠疫情对非传统安全一般认知提出的最大挑战，是迫使当事国面临“自助”和“助他”两线作战的局面<sup>①</sup>，既要控制国内疫情，应对短期内自身面临的医疗物资短缺，彼时国际响应也因自顾不暇而受限；“助他”还意味着要向他国提供援助，不仅出于人道主义、互相援助的考虑，还要防止疫情倒灌。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缓解的第一时间，就向伊朗、意大利等国派遣医疗团队并捐赠关键的医疗物资。而反观欧洲各国则在意大利疫情恶化时乱作一团，迟迟未能响应意大利的求助。由于地理上相邻，欧洲国家面临即将暴发的国内疫情，优先选择了自保。“自助”和“助他”之间的矛盾对一般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现有的国际公共卫生体系还不足以应对此类危机。作为非传统安全，新冠疫情产生了严重的外溢效应，不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在个别国家还加深了政治动荡、社会对立、种族仇恨的程度，甚至引发骚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属于“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百年未遇的流行疫情、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并外溢为经济、社会和安全的综合安全威胁。<sup>②</sup>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还加剧了国家对新兴技术安全的强烈焦虑，病毒基因组测序技术、物联网、无人机、GIS（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以及5G技术都被广泛应用于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sup>③</sup>，这些新兴科技成为挽救生命、高效抗疫的法宝。而因未掌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由于疫情导致断供停产，国家对于突破技术封锁和垄断、攻克技术难关的渴望愈发强烈。疫情之下的新技术应用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大量员工被迫远程办公，为网络安全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麦肯锡、毕马威等多家知名咨询机构发表报告警示信息保密性、完整性和网络稳定性正面临危机<sup>④</sup>，重新审视国际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 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竞争性

新冠疫情促使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安全环境加速变动，美国越发难以维系冷战结束自身主导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领导全球的能力、意愿和效果均严重下降，“霸权焦虑”在美国决策层、战略界以及社会民众中广泛蔓延。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消极面大幅凸显，将“战略竞争”设为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性。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基本承续此

<sup>①</sup> Lina Gong, *Covid-19: Is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Prepared?*, 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ear in Review 2020, p17.

<sup>②</sup> 杨洁勉：“新冠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6页。

<sup>③</sup> Zahra Mastaneh, Ali Mouseli, “Technology and its Solutions in the Era of COVID-19 Crisis: A Review of Literature. Evidence Based Health Policy”,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4, 2020, pp.138-149.

<sup>④</sup> Jim Boehm, James Kaplan, Marc Sorel, Nathan Sportsman, and Trevor Steen, “Cybersecurity tactics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cKinsey & Company, March,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risk-and-resilience/our-insights/cybersecurity-tactics-for-the-coronavirus-pandemic>, accessed on July 2, 2021; Steve Bates,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impact of COVID-19*, KPMG International,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20/04/managing-the-information-security-impact-of-covid-19.html>, accessed on July 2, 2021.

前由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对华“超强硬”路线，持续推动实施竞争性对华政策。

首先，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美国对华经贸施压加剧，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围遏力度增强，部分领域对华“脱钩”倾向愈发明显。经贸方面：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受疫情冲击尤为深重，不断遭遇卫生防护物品等基础性物资供应紧张的困境。<sup>①</sup>对此，美政策界、战略界以及公共舆论强化炒作“供应链安全”问题，特朗普政府尤其将此纳入其“美国优先”执政议程，以中国为归咎对象推动对华“脱钩”；在为2020年总统选举准备的“第二任期执政议程”中，特朗普方面还将“结束对华依赖”设置为优先任务，鼓动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本土<sup>②</sup>。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没有立即改变前任政府的对华经贸施压，而是以“人权”“贸易公平”等为名在经贸领域维持甚至强化对华强硬立场。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向国会介绍贸易政策时着重强调“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sup>③</sup>。与此同时，国会中的对华鹰派议员把对华“脱钩”作为重要政策主张：2021年2月，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发布《击败中国：定向脱欧和经济持久战》（Beat China: Targeted Decoupling and the Economic Long War）报告，提出美国需要摆脱“同中国经济的纠缠”，在重要制造业、战略资源供应（药品、稀土等）领域免遭“中国的侵蚀”。<sup>④</sup>在疫情催动的紧张氛围下，拜登政府加紧对供应链脆弱性的审查，于2021年6月初公布《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和培育广泛增长》长篇报告；该报告提及中国450余次，提出考虑强化对“中国违规行为”的贸易调查；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对华贸易政策演说，提出中美要在不同基础上寻求“再挂钩（recouple）”，但同时不排除延续单边方式对华施压<sup>⑤</sup>。科技方面：新冠疫情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激发经济新动能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美不愿科技霸权旁落，将中国的科技进步视为“紧迫威胁”，尤其在半导体、通信、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强化对华科技打压。一方面，美政府和国会联动，动用强力手段打击中国科技企业和相关人士。2020年以来，美国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范围，利用“长臂管辖”方式打压中国出海科技企业，一度对腾

<sup>①</sup> “COVID creates shortages of an array of U.S. medical suppli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he-great-reboot/covid-creates-shortages-an-array-us-medical-supplies-2021-09-20/>, accessed on September 22, 2021.

<sup>②</sup> “Trump’s Second-term Agenda”, [https://ballotpedia.org/The\\_Republican\\_Party\\_Platform,\\_2020#cite\\_note-Core-6](https://ballotpedia.org/The_Republican_Party_Platform,_2020#cite_note-Core-6), accessed on September 5, 2021.

<sup>③</sup> “白宫要义：戴琦：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将与布林肯讨论是否抵制冬奥会”，<https://www.voachinese.com/a/ustr-human-rights-trade-policy-force-labor-xinjiang-20210513/5889758.html>，上网时间：2021年9月25日。

<sup>④</sup> “Beat China. Targeted Decoupling and the Economic Long War”, [https://www.cotton.senate.gov/imo/media/doc/210216\\_1700\\_China%20Report\\_FINAL.pdf](https://www.cotton.senate.gov/imo/media/doc/210216_1700_China%20Report_FINAL.pdf), accessed on September 22, 2021.

<sup>⑤</sup>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utlin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october/remarks-prepared-delivery-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 accessed on October 7, 2021.

讯（微信）、抖音海外版（TikTok）等中国企业发布禁用行政令。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更将科技竞争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部分，不仅动用自身力量采取“小院高墙”的高技术封锁，更倾向于拉拢盟友伙伴对华形成“包围”。2021年6月，美国和欧盟宣布成立“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提出将对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协调监管外国对敏感技术产品的投资等，不点名地将矛头指向中国<sup>①</sup>。国会也在密集形成旨在强化美科技实力、阻遏中国科技进步的“无尽前沿法案”等立法提案，而旨在禁止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进入美国电信网络的“2021年安全设备法”则已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即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sup>②</sup>。

其次，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一面大幅上升，“全政府”对华竞争的政策范式不断固化深化，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转而瞄准中国“甩锅”，将施压中国视为转移国内指责、服务自身总统选举的“策略”。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急剧转向蛮横、强硬，推出了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中美战略互信的消极政策和言论。2020年，面对疫情形势恶化和总统选举压力，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末期将其对华政策的非理性一面推向极致：特朗普本人在当年5月白宫玫瑰园讲话中、9月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对中国展开毫无根据的污名和攻击，并派出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部长以及国务卿等就对华政策发表系列演讲，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危害中美战略互信的根本，影响极为恶劣<sup>③</sup>。这一时期，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鹰派议员也组建了“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围绕一系列涉华敏感问题提出数百余条体现对华强硬的立法建议；众议院共和党最大核心小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则推出《强化美国与应对全球威胁》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面对的“头号威胁”并提出强化对华制裁等举措。此外，为展现进一步展现对华强硬，特朗普政府还打压中国机构在美合法活动，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极大伤害两国正常交往。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改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而是宣称中美将会迎来“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国务卿布林肯将处理对华关系称为“美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强调对于中国“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国家安全委员会印

<sup>①</sup> “冲突摆一边 美欧新平台剑指北京”，<http://www.dw.com/zh/冲突摆一边-美欧新平台剑指北京/a-59358702>，上网时间：2021年9月25日。

<sup>②</sup> “Senators Markey and Rubio Hail Congressional Passage of ‘Secure Equipment Act’”，<https://www.markey.senate.gov/news/press-releases/senators-markey-and-rubio-hail-congressional-passage-of-secure-equipment-act>，accessed on October 29, 2021.

<sup>③</sup> “特朗普总统白宫玫瑰园有关中国问题讲话全文”，<https://www.voachinese.com/a/trump-rose-garden-china-remarks-full-text-translation-20200529/5441618.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日；“特朗普联大发言 主张对中国问责并展示美国国力”，<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9/1067232>，上网时间：2020年10月2日。



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则进一步宣告美国对华“接触”时代终结，“竞争时代”开启<sup>①</sup>。同时，拜登政府亦深化“全政府”对华竞争态势。上台以来，拜登政府国防部组建“中国战略工作组”审议对华军事政策，中央情报局组建“中国任务中心”强化对华情报工作力度，国务院也酝酿增加对华人力投入“监视中国在全球的活动”。此外，在民主党看重的意识形态领域，拜登政府也在外交层面展现对华强硬姿态，其不仅继续在涉疆问题上延续前任政府“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不实论调，在涉港问题上发出消极言论，还继续炒作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再次，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美国将中国视为“步步紧逼的威胁（pacing threat）”，通过强化炒作“中国威胁”谋求维系军事霸权。新冠疫情肆虐对美军的海外部署和人员健康带来严重挑战，这一现实激化了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借机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臆测和渲染<sup>②</sup>。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军事竞争。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任职听证会上即提出“会像激光一样聚焦来自中国的竞争”，上任之初向国防部全体雇员发送备忘录，强调“优先应对中国这一步步紧逼的头号挑战”，“发展正确的作战概念、能力和规划以支撑威慑，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sup>③</sup>。就职后不久，拜登访问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已向其报告准备成立新的“中国工作组”审议对华军事战略。该“中国工作组”由多名来自国防部、情报界及作战司令部的资深人员组成，由曾任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中国军事安全问题专家（现任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领导。经过近半年的政策审议，奥斯汀发布政策指令，宣布将根据“中国工作组”的评估结果“重振盟友伙伴网络，加强威慑并加速研发新的作战概念和战争能力，调整未来军力姿态并令文职和军事人员更加现代化”<sup>④</sup>。在战略规划、行动作战和装备发展等方面，美国均优先考虑“中国威胁”的影响：战略规划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拜登政府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科林·卡尔宣称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应对中国”，并称“从经济、技术、政治、军事等层面而言，中国是唯一可以对美国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国家”<sup>⑤</sup>。据此，拜登政府

<sup>①</sup>“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PEECH,”<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accessed on October 30, 2021.; “White House Top Asia Policy Officials Discuss U.S. China Strategy at APARC’s Oksenberg Conference,” <https://fsi.stanford.edu/news/white-house-top-asia-policy-officials-discuss-us-china-strategy-aparc%E2%80%99s-oksenberg-conference>, accessed on October 30, 2021.

<sup>②</sup>“Coronavirus may be giving Beijing an ope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edition.cnn.com/2020/04/07/asia/coronavirus-china-us-military-south-china-sea-intl-hnk/index.html>,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21; “China Uses Pandemic to Boost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12/china-coronavirus-military-pressure-taiwan/>,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21.

<sup>③</sup>“Memorandum For All Department of Defense Employees”, <https://www.politico.com/f/?id=00000175-af22-d1da-a775-bf6625d10000>,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21.

<sup>④</sup> “Secretary of Defense Directive on China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651534/secretary-of-defense-directive-on-china-task-force-recommendations/>,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21.

<sup>⑤</sup> “Official Talks DOD Policy Role in Chinese Pacing Threat, Integrated Deter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641068/official-talks-dod-policy-role-in-chinese-pacing-threat-integrated-deterrence/>, accessed on October 23, 2021.



提出“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并谋求以此为基础制定下一版《国防战略》；国防部长奥斯汀对此表示“综合威胁”强调整合美国各方面力量优势，在海、陆、空等为传统领域威慑外，增强太空、网络和信息领域威慑能力，以“让对手感到冒进的风险成本与任何预想的收益都不一致”。<sup>①</sup>此外，拜登政府执政后立即着手开展“全球态势评估”（Global Posture Review），研究如何向对华竞争凸显的印太地区倾斜军力资源投入料将成为此次评估的重点<sup>②</sup>。行动布局上，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潜在冲突中的对手”，演习行动的对华针对性、实战意味都更加突出：2021年8月，美国陆军部公布介绍中国军事战术和战略文化的专门报告《中国战术》，着眼在专业军事教育和职业培养中更加突出对“中国威慑”的理解和应对。美军一系列旨在应对同中国“大国冲突”风险的新型作战概念，如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海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等已在美军新近行动演练中逐渐得到试验。

最后，从单边强力打压中国走向联合盟友伙伴“抱团”围堵中国，是美国深化竞争性对华政策的最新动向。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美国正值特朗普执政最后一年，疫情蔓延、选情焦灼、经济社会运行出现紊乱，致使特朗普政府选择单方面动用强力升级对华打压，以实践所谓“美国优先”的执政口号。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其不再延续特朗普时期单边强硬的对外政策思路，而在外交中更加强调整联合盟友伙伴以促进“共同利益”。2021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明确提出重振和更新全球盟友伙伴关系，将之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支柱之一。在拜登政府看来，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局势更为紧张复杂，“民主国家愈发遭遇外部敌对威权力量的挑战”，需要“民主国家形成共同阵线，产生统一的愿景”。因而，拜登政府将强化“联盟对华”态势作为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一环：一是拉拢核心盟友一致对华。欧洲方向，拜登政府着力修复此前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极力将中国推为美欧“共同威胁”。拜登在2021年度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宣称“世界正处于民主与威权博弈的历史关口，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准备好同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sup>③</sup>。在“维护共同价值观和规则”的旗号下，美欧将贸易和技术领域作为联手对华的重点：2021年9月，美欧联合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强调抵御“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塑造规范、标准和规则，使之反映民主价值观和对人权的尊重”。亚洲方向，美日同盟进一步突出遏华共识，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访美期间同美联合发布首脑声明，时隔52年再度提及台湾问题；拜登政府提名

<sup>①</sup> “Defense Secretary Says ‘Integrated Deterrence’ Is Cornerstone of U.S.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592149/defense-secretary-says-integrated-deterrence-is-cornerstone-of-us-defense/>, accessed on October 23, 2021.

<sup>②</sup> “Reposturing US Defense to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1/03/reposturing-us-defence-to-the-indo-pacific>, accessed on October 23, 2021.

<sup>③</sup>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accessed on October 25, 2021.

的美驻日大使人选拉姆·伊曼纽尔在任职听证会上极力渲染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制衡”，将美日同盟称为“地区安全的基石”<sup>①</sup>。二是强化利用各类旨在遏制中国的“小多边”机制。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扩大渲染为“民主同威权的对决”，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中不断要求形成对华“联合阵线”：在北约层面，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总部发表演说突出渲染“中国威胁”，拜登政府推动在北约峰会公报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七国集团（G7）层面，2021年G7峰会将中国推为重点关切，在涉疆、涉港、南海、台湾、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层面，拜登政府重视四边机制的制华作用，首次召开线下面对面Quad峰会，再次强调所谓“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在技术规范、地区治理等方面不点名地针对中国。三是组建新的遏华联盟。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结成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共同承诺“支持基于规则的秩序”，深化防务和技术合作：美国宣布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三国宣布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在地缘政治、科技竞争中对抗中国的意味不言而喻<sup>②</sup>。

### 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多样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由特朗普到拜登的权力过渡，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此前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主基调，在具体操作上更加深化“全政府”的内部协调、更强调联合盟友伙伴和发挥美国自身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持续、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也不会单向度地一味强硬，而将呈现更多动态性、复杂性：

第一，新冠疫情肆虐凸显全球性威胁日益深重，拜登政府并不希望中美关系完全“跌破”，同时寻求在可能条件下对华合作。拜登政府《临时国家安全指南》指出“最近的情况异常清楚地表明，我们面临的许多最大的威胁是没有国界和围墙的，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给予应对”。拜登政府基本秉持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观，能够认识到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于维护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挑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比之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非理性色彩、情绪化色彩相对没有那么浓重；对拜登政府而言，与中国共存是当前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和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曾撰文表示中美关系不是美苏冷战，

<sup>①</sup>“Submitted Statement by Mr. Rahm I. Emanuel Nominee for U.S. Ambassador to Japan”,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102021\\_Emanuel\\_Testimony2.pdf](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102021_Emanuel_Testimony2.pdf), accessed on October 25, 2021.

<sup>②</sup>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accessed on October 28, 2021.

双方应当寻求“没有灾难的竞争”，相互增进意图了解，避免无谓冲突<sup>①</sup>。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美国“不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裂成僵化阵营的世界”<sup>②</sup>。同时，拜登政府重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在气候变化领域寻求对华合作的愿望比较突出。拜登政府执政后，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多次就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同中国沟通，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sup>③</sup>。2021年11月16日，中美举行元首视频会晤，拜登表示美方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的体制，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sup>④</sup>。可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具有复杂性，并不寻求无端推高对华紧张，体现“竞合并存”的特点。

第二，美国国内利益群体的诉求和想法多元，其中希望美对华政策理性务实、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声音也在试图对拜登政府产生影响。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美国国内宣扬向中国“追责”“索赔”的极端言论不绝于耳，主张对华政策极度强硬的论调更加突出；特朗普时期，一批抱有对华偏见的鹰派战略人士取得政策影响力，与国会中的对华鹰派议员一道，通过行政、立法等多种手段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竞争乃至对抗。然而，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美国对华政策的取向并不会单一取决于某一政治势力的推动。尤其是这种一味推动对华政策极端强硬的倾向事实上并没有让美国民众真正获益，反而伤害本可更多惠及中美两国人民的双边关系发展。上台执政后，拜登政府没有迅速纠偏前任政府对华政策的错误导向，而是不断宣称将同中国“激烈竞争”，美国内至少有两个群体对此不甚认同：其一是美国工商界。美国工商企业在多年来的对华经贸往来中获益巨大，“贸易战”带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下行令这些企业受损严重，他们希望拜登政府上台后能够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带来积极变化。2021年1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有损美国经济，呼吁美国政府削减对华关税<sup>⑤</sup>；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美国零售联合会等30余家工商业团体联名致信拜登政府财政部长珍妮·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要求美相关部门重启关税豁免程序，减轻对美国工薪阶层等的伤害<sup>⑥</sup>。其二是美国左翼进步力量。美国左翼进步力量具有反帝国主义、反战等政治传统，不支持右翼鹰派积极推动的对华强硬路线。佛蒙特

<sup>①</sup>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pp.99-101.

<sup>②</sup> “拜登总统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https://www.state.gov/translations/chinese/拜登总统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上网时间：2021年10月29日。

<sup>③</sup> “中美气候特使将开展面对面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08/t20210831\\_864725.shtml](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08/t20210831_864725.shtml)，上网时间：2021年11月2日。

<sup>④</sup> “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受媒体采访问答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16/c\\_1128070793.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16/c_1128070793.htm)，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7日。

<sup>⑤</sup>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呼吁美政府削减对华关税”，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15/c\\_112698744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15/c_1126987446.htm)，上网时间：2021年11月5日。

<sup>⑥</sup> “‘Lay out the strategy’: Corporate America grows impatient on Biden’s China trade review”，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8/16/corporate-america-biden-china-trade-504889>, accessed on November 5, 2021.

州联邦参议员、美国左翼政治家伯尼·桑德斯公开撰文反对开启对华“新冷战”，表示“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零和博弈将适得其反，导致政治局势更加危险”<sup>①</sup>；数十个美国左翼进步团体致信拜登和国会议员，提出在对华交往中优先考虑气候变化合作，而不要谋求“新冷战”<sup>②</sup>。

第三，新形势下许多其他国家地区谋求战略自主的愿望更加强烈，并不愿意在对华政策上完全跟随美国，拜登政府的“联盟制华”策略并不总能获得盟友的全力支持。新冠疫情令各国自顾不暇，“自保”心态更加突出。尽管拜登政府一再宣称要“重建美国领导地位”，希望动员“民主国家”联合应对中国，但许多国家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和交往方式。一方面，欧洲国家在对华问题不完全是和美国步调一致，战略自主倾向凸显。德国等认为中国是自身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前总理默克尔即提出对中国应“拥抱而不是谩骂”，认为在气候变化、环保和全球健康领域必须“同中国一道进步”。<sup>③</sup>另一方面，东南亚等位于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也不愿在中国之间“选边”，不希望印太地区成为冲突爆发点。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特朗普政府对华空前施压的背景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撰文《濒危的亚洲世纪——美中对抗的危害》，提出“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希望与双方培养良好关系，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sup>④</sup>。对于美英澳三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印度尼西亚等也看到了其中的地缘政治风险，担忧这将“持续引发军备竞赛和力量投射”，表态谨慎<sup>⑤</sup>。

## 四、结语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进而深度调整，拜登政府将特朗普政府开启的竞争性对华政策进一步战略化、机制化，在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试图压制中国的发展进步，令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一面持续凸显。不过，疫情冲击亦更加反衬出美国霸权地位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各国协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要性，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完全转向竞争对抗，各国也不会全然跟随美国制约中国。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sup>⑥</sup>。未来，美国需要校准对华战略认知和政策取向，不让竞争对抗过度主

<sup>①</sup> “Washington’s Dangerous New Consensus on China Don’t Start Another Cold Wa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6-17/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 accessed on November 7, 2021.

<sup>②</sup> “Biden’s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will result in climate collapse, progressives warn”,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7/07/biden-china-climate-collapse-progressives-498588>, accessed on November 7, 2021.

<sup>③</sup> “客座评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远远超出经济考量”，<https://www.dw.com/zh/客座评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远远超出经济考量?/a-59201039>，上网时间：2021年11月5日。

<sup>④</sup> “李显龙：濒危的亚洲世纪——美中对抗的危害”，《联合早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200604-1058602>，上网时间：2021年11月7日。

<sup>⑤</sup> “Statement on Australia’s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Progr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2937/siaran\\_pers/statement-on-australias-nuclear-powered-submarines-program](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2937/siaran_pers/statement-on-australias-nuclear-powered-submarines-program),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21.

<sup>⑥</sup>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906016.shtml>，

导对华政策，与中方一道探索符合两国利益和世界利益的互动新框架，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 以“复数性”为中心的世界图景——汉娜·阿伦特世界主义思想新探

周毅

**【摘要】** 汉娜·阿伦特的世界主义思想以人的“复数性”为核心，通过重构政治的概念、厘清权力与暴力的关系，反思了战争和民族国家体系非政治性。在此基础上，她主张以沟通替代暴力、以共存存在论替代个体存在论、以存在主义替代本质主义，提出了“联邦体系”的世界国家构想。

**【关键词】** 汉娜·阿伦特；世界主义；复数性；联邦体系

**【作者简介】** 周毅，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教，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编 510642，电话 18819805903，电子邮箱 zhouyi@scau.edu.cn。

### The Plurality-centered Cosmopolitanism: A New Analysis on Hannah Arendt's Cosmopolitanism

Zhou Yi

**Abstract:** Arendt's cosmopolitanism is centered on the "plurality" of human beings, reflecting on the non-political nature of war and nation-state system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and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violence. On this basis, she advocates the substitution of violence with communication, individual ontology with ontology of coexistence, and essentialism with existentialism. She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a "federal system" as a world state.

**Keywords:** Hannah Arendt; Cosmopolitanism; Plurality; Federal System

**Author:** Zhou Yi, Counselor/Assistan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0642, Tel: 18819805903, email: zhouyi@scau.edu.cn.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犹太人的身份是她学术思考与政治实践的起点和中心。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对现代性的追问，以及对人精神生活

的关照，使之极负盛名。作为政治学家、哲学家的阿伦特广为人知，而阿伦特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贡献却鲜人问津。

恰如她在《政治入门》中所指出：“自从原子弹发明以来，我们时代首要的政治议题就是：武力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或者)如何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排除对武力手段(force)的使用？”<sup>①</sup>诚然，作为一个学者，她究其一生也从未写过哪怕一本专著详细探讨她眼中的“首要问题”，即“武力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问题。阿伦特也从未以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进行过研究，但从她的作品中，却可以还原出她对一问题的回应。

阿伦特对于理想国际社会的想象、对于国际冲突问题的回应，多散见于其自由政治理论的相关讨论中。具体到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史中，阿伦特大多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大致判断相似，但对于其世界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评价则各有不同。比如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通过对阿伦特主要作品的诠释，围绕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全球贫困问题、无国籍者问题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四项“政治之恶”，重建了阿伦特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将其归纳为“现实世界主义”(realistic cosmopolitanism)。<sup>②</sup>安娜贝尔·赫尔佐克(Annabel Herzog)将之命名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anarchic cosmopolitanism)”，认为去权威化是阿伦特国际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特征。<sup>③</sup>克里斯蒂安·克洛卡(Kristian Klockars)认为阿伦特世界主义中的复数性(plurality)想象可以通过“无限交往”(limitless communication)的方式实现，因而是一种较为贴近现实、有操作性的世界主义设计。<sup>④</sup>罗兰·阿克斯特曼(Roland Axtmann)基于全球化的视角，重构了阿伦特的政治自由理论，认为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公民政治自由的保障。<sup>⑤</sup>彼得·维罗妮卡(Peter J. Verovšek)将阿伦特视作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认为欧盟的经验可以验证阿伦特的世界主义理想。<sup>⑥</sup>扫罗·托拜阿斯(Saul Tobias)则将阿伦特的世界主义描述为一种“实用主义多元主义(Pragmatic Pluralism)”，引入阿伦特的早期作品《爱与奥古斯丁》，将阿伦特的世界主义运用于国际宗教团体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上。<sup>⑦</sup>

上述学者对阿伦特的世界主义观点持赞赏态度，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比如安东尼·布鲁克(Anthony Burke)在欧文斯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阿伦特的人权观存在内在的矛盾：她一方面要求以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杰罗姆·科恩编，张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

<sup>②</sup> Patrick Hayden, *Political Evil in a Global Age: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sup>③</sup> Annabel Herzog, "Political itineraries and anarchic cosmopolitanism i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47, No.1, 2004, pp.20-41.

<sup>④</sup> Kristian Klockars, "Cosmopolitan plurality in Arend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th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thics Network* 15, No.2, 2008, pp.193-211.

<sup>⑤</sup> Roland Axtmann, "Globality, Plurality and Freedom: The Arendtian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1, January 2006, pp. 93-117; Roland Axtmann, "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ity: Kant, Arendt, and Beck on the Global Conditio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Issue 100, Vol. 29, No. 3, Autumn 2011, pp.20-37.

<sup>⑥</sup> Peter J. Verovšek, "Unexpected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Memory, Rupture, and Totalitarianism in Arendt's Political Theor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76, No. 3, Summer 2014, pp.389-413.

<sup>⑦</sup> Saul Tobias, "Pragmatic Pluralism: Arendt, Cosmopolitanism, and Religion", *Sophia*, No. 50, 2011, pp.73-89.

去国家化的视角看待人权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家保障人民“拥有权利的权利”；一方面反对世界政府，另一方面要求通过完善国际法以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她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糟糕的世界主义（troubled Cosmopolitan）。<sup>①</sup>

总体而言，前人的研究共同建构了一种以“复数性”为中心的国际观察视角，这为我们理解阿伦特的哲学思想和世界主义观点提供了清晰的路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的世界主义观点不止于观察视角，还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国家想象，也就是“联邦体系”（Federal System）。在过往研究中，以卡诺凡为代表的解释者们，往往将阿伦特的“联邦体系”和“议事会体系”视作其“新共和主义”的理论主张，将之放置于国内政治的维度进行讨论。<sup>②</sup>但本文认为，阿伦特提出“联邦体系”时，所讨论的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在理论上是同构的，这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拓展了传统的政治世界主义观点，是既有研究中值得补充的部分。

## 一、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以“复数性”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说，“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意思是一个主体但凡有意识地行动，必有一套知识、理论或观念为导引——此谓人的行动逻辑。而组成理论与观念的基础，便是概念。同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讨论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所持之行动逻辑，此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政治”的概念。人们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政治行为逻辑，它在规范性的维度决定了政治行为的价值取向。

阿伦特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源自其对政治概念的理解，这便是我们考察其世界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政治学中的政治概念常与国家治理相关，但作为跨国移民，以及一位曾经的无国籍者，阿伦特意识到全球化对于公民概念的解构意义，于是她开始追问：“不属于任何政治体的生活何以可能？在无政治体或者是今天称之为无国家状态下生活何以可能？”<sup>③</sup>换言之，如果脱离了民族，摆脱名为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那么人们该如何界定自身？对于跨国移民和无国籍者而言，什么是政治？

在《政治入门》的开头，她指出：“政治（politics）建立在人的复数性（plurality<sup>④</sup>）这一事实上。上帝创造了单数的人（man），但只有复数的人（men）才是人类（human），才是尘世的产物、

<sup>①</sup> Anthony Burke, “Recovering Humanity from Man: Hannah Arendt’s Troubled Cosmopolitan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45, 2008, pp. 514–521.

<sup>②</sup> 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sup>③</sup> 汉娜·阿伦特著：《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sup>④</sup> Plurality 是阿伦特作品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内主流的译法是“复数性”，也有学者将之翻译为“多元性”或“多样性”、“复多性”等其他表述。本文取用“复数性”的译法，是因为阿伦特的这一概念是对“单数的人（man）”的反思而来，所以复数性较为准确。

人性的产物。”<sup>①</sup>这里的单数、复数形式，意指理解人类存在方式的两种不同视角：单数的人，意味着将人类视为同质化的存在，用一种标准化的眼光审视作为群体的人类；而复数的人，则着眼于人类的差异性，通过考察主体间的结合与互动关系来理解人类群体。由于“政治”要处理不同的人之间的共存与联合<sup>②</sup>，所以只有理解人的复数性，以复数的眼光理解人类，才能理解政治的概念。

“复数性”作为人类存在条件之一，它天然地具有平等的特性。若以复数性的视角观察世界，世界就像一张不可见的圆桌，人们围桌而坐，虽视角迥异，却共同地面对这张桌子，就如盲人摸象一般。我们这里谈论的“世界”，就是阿伦特所指称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realm）。她认为，公共领域代表两个彼此相连又有所不同的现象：第一，“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第二，“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有别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住处而言”。<sup>③</sup>简言之，同一个世界向每一个人敞开，人们也共同经验着同一个世界。尽管由于位置不同，人们眼中的世界看似各不相同，但无疑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因此它们也都是真实的。各人眼中的真实各异，它往往被视作个人的“意见（opinion）”，但其真实性又意味着意见中蕴含“真理（doxa）”。<sup>④</sup>在这个推论中，我们不难想象阿伦特眼中的世界景象：一个大体共通，却又充斥着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又能得到平等对待的世界。

此外，言说和行动使人们走出孤立状态，建立起彼此间的关系，公共空间由此显现，于是权力（power）的概念便产生了。用阿伦特的话说，“权力是使公共领域——行动和言说的人们之间潜在的显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sup>⑤</sup>人们的共在状态，是政治权力得以存在的基础，即政治权力能且只能存在于复数性的人类境况之中。

可见，政治依赖于复数性，存在于公共空间，通过行动和言说的方式得以表现，与权力共生，并最终指向平等与自由。这种阿伦特式的政治理解方式，是我们思考其世界主义思想的逻辑基础。

## 二、作为权力对立面的暴力：反战思想的逻辑推论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如何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排除对武力手段的使用？如克莱尔·托马斯（Claire Tomas）的评论，尽管国际关系不常使用“暴力”这一表述，但国际关系学又总是围绕国家间的暴力问题而展开<sup>⑥</sup>。笔者以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涉及战争、暴力与权力的关系。

<sup>①</sup> 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5, p93.

<sup>②</sup> 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5, p93.

<sup>③</sup>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4页。

<sup>④</sup> 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5, pp.14-15.

<sup>⑤</sup>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sup>⑥</sup> Claire Thomas, "Why Don't We Talk About 'Viol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4, October 2011, pp.1815-1836.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战争视为政治的延续<sup>①</sup>，根据他的经典定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sup>②</sup>而另一方面，在人们关于权力现象的讨论中，暴力常常被视为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恰如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说法，“一切政治均为权力之争，而终极的权力便是暴力”<sup>③</sup>。由此可见，如果政治与复数性的人类境况必然相伴相生，而战争又并非必然之事，那么我们就需要澄清权力与暴力的关系，进而分析战争的非政治性，以作为克劳塞维茨这一经典命题的理论回应。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中最具典型性的公民案例，苏格拉底的言行在政治传统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关于权力概念的讨论，就从苏格拉底与克力同（Kriton）的狱中对话<sup>④</sup>开始。面对不公的死刑判决，苏格拉底坚持留狱赴死而不愿逃亡，是因为他将雅典城邦的法律视作众人彼此协定的契约。他身为雅典公民，既享受了城邦的福祉，便理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我们可以窥见两种政治意涵：一方面，城邦的法律审判具有规训和教化的功能，当公民大会以蛊惑青年之罪论处苏格拉底死刑时，实则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迫使民众规避苏格拉底的行为；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的服从，则是基于公民共同体的承诺所为，是一种平等原则下的政治行动。这两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史中演化出两种对立的政治传统：前者，是以“命令-服从”关系界定的支配性权力概念<sup>⑤</sup>，这是一种纵向的权力观念，其本质就具有暴力的属性；后者，是以群体的政治承诺为中心的权力概念，是一种横向的权力观念，这也是阿伦特所主张的非暴力的权力观念。

纵向的权力观念是将权力与暴力相混淆的产物。在古希腊城邦开创的传统中，政治及其共生的权力只存在于共同体内部，暴力只发生于国与国（或城邦与城邦）之间，作为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而存在。<sup>⑥</sup>而城邦内的暴力则是最羞耻的手段，被视为暴政最显著的特征。<sup>⑦</sup>古希腊城邦的这一传统，自15世纪开始，渐次受到一系列挑战，其中以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霍布斯（Thomas Hobbes）、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施米特（Carl Schmitt）最具代表性——他们将暴力融入权力的本质，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就是阿伦特所批判的对象。

《理想国》中记录了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关于正义的讨论<sup>⑧</sup>，后者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是最早将权力与暴力联系起来讨论的经典文本，但这一观念以谬误的角色出

<sup>①</sup>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

<sup>②</sup>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页。

<sup>③</sup>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1956, p60, cited in 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134.

<sup>④</sup> 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94页。

<sup>⑤</sup> 理查德·J·伯恩斯坦：《暴力：思无所限》，李元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97页。

<sup>⑥</sup> 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sup>⑦</sup> 历史上，苏格拉底之死也常常被认为是雅典民主中“多数人暴政”的典型案列。

<sup>⑧</sup>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页。



现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并未形成政治传统。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规范维度拉向现实，他极力怂恿君主以暴力手段夺取对国家的支配权，以此强化统治<sup>①</sup>，这是纵向的权力观念之开端。

在霍布斯的论述中，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常态，人们为了抵抗“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原初状态，选择向“利维坦（Leviathan）”让渡自身权利，缔结社会契约以求自保。强大的利维坦对于共同体内部而言是安全的保障，但对于外部而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仍在持续，国家间依然维持着对峙状态。这意味着，国际政治被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民族国家成为相互区隔的部落，用阿伦特的话说，这就陷入了“部落民族主义”的逻辑中。<sup>②</sup>在这套论述下，国家就是一种至高的暴力化身，民众的服从性与国家施予的安全保障都来自于国家暴力的运用。

对马克思来说，国家的本质被描述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暴力以及暴力手段的占有，则是政府的重要构成要素。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学说<sup>③</sup>进一步加强了暴力与权力的联系，而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所有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即“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命题，是对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政治传统构成的一项根本性的挑战。<sup>④</sup>

施密特更进一步，他从政治本体论的角度，将政治概念建立在诉诸对立性的基础上，直接将冲突对立的概念赋予政治本身。他认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必然内在地存在某种对立关系，比如审美领域的美丑对立、道德领域的善恶对立、经济领域的利害对立，据此推论，敌友对立，就是政治的内在本质——此所谓“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他声称只要存在他者，就必然面临敌我划分的问题，二元对立的境况普遍地内在于多元化的世界，这是政治本质之规定。既然敌对性是政治的内在属性，而战争又是敌对性的显性形式，那么战争的合理性自然不言而喻了。<sup>⑤</sup>

以上将暴力与权力相混淆的传统，隐含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即“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而且永远是谁统治谁的问题”<sup>⑥</sup>，这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战争表现为一种国家符合其本质的行为。”<sup>⑦</sup>在这种观念下，战争仿佛不再是一种需要规避的事物，甚至成为具有规范性的应当之事。这正是阿伦特所希望纠正的问题。

<sup>①</sup> 参见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sup>②</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3-224页。

<sup>③</sup>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阿伦特思想生成的重要来源。她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人的境况》、《论革命》、《论暴力》以及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要素》等等，都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而来的成果。但阿伦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否准确，学界多有争论，本文无意探讨。本文只讨论阿伦特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以此交代阿伦特世界主义思想的生成。

<sup>④</sup> 参见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113; 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5, pp.14-15.

<sup>⑤</sup>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46页。

<sup>⑥</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sup>⑦</sup> Bertrand de Jouvenel, *Pow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ts Growth*, London, 1952, p122, cited in 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134.

为了澄明暴力与权力的关系，阿伦特细致地区分了“权力（power）”、“强力（strength）”、“武力（force）”、“权威（authority）”以及“暴力（violence）”等关键词<sup>①</sup>。在“谁统治谁”的问题上，这些词汇具有近乎相同的功能，也就是迫使人服从支配的功能，因而被误认为同义词。她对权力的定义是这样的：“权力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群体聚集在一起，它才依旧存在。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sup>②</sup>由此可见，根据阿伦特的理解，权力以人类的复数性为前提，它代表着人们授权的结果，并伴随政治行动而存在，是共同体所固有的，于是权力构成了一切政府的本质。但暴力不同，暴力总是根据不同的目的而被使用，具有鲜明的工具性，换言之，暴力的合法性需由其目的进行指导和证明。“如果一个东西由别的东西来证明，它就不可能是任何事情的本质”<sup>③</sup>，所以作为工具的暴力绝非政府的本质特征。

进一步说，由于暴力是通过外部力量强迫服从，而权力来自于共同体内部平等自愿的结合，于是“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而暴力的极端形式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sup>④</sup>，权力和暴力便构成了一组相对立的概念。同样的，由于战争所具有的强迫性，使落败方向获胜方屈服，其本质是破坏两方共存的公共领域，取缔他们共同建立的复数性。所以在阿伦特的语境下，战争不但不是政治的延续，甚至是非政治的。以上推论，从哲学上挑战了战争在政治领域的合理性。

### 三、走向一种横向的权力结构：阿伦特对民族主义的省思

战争的非政治性可以为反战思想提供逻辑依据，但依旧无法回应无国籍者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窘境。对此，我们从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无国籍者的关系开始讨论。

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概念既复杂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不断地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工具性的姿态依附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具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方式；说它简单，是因为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民族主义总是对人们共有身份的建构。<sup>⑤</sup>

16世纪，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人们以民族自决为口号，要求依据民族身份建立国家，于是“这些政府在世纪演变过程中使民族性（nationality）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使全体居民的同质性

<sup>①</sup> 阿伦特对五个词语的具体分析，可参见 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p.142-152.

<sup>②</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sup>③</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sup>④</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sup>⑤</sup> 关于民族主义的这一观点，来自赵鼎新于2021年1月10日在广州“海国图志”研究院所作的《帝国政治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演讲。

成为政体的显著特点。”<sup>①</sup>这宣告着“民族对国家的征服”，因为当民族身份成为公民身份的前置条件时，就意味着“国家从法律的执行者转变成了民族的工具”<sup>②</sup>，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方式。

以此方式建构国家的结果，是国家内部呈现出民族层面的同质性。如果人只有在民族国家中才能获得完全的人权，无国籍者就无法保障自己的人权，进而少数民族就只能算是“半无国籍”——他们在法律上拥有权利，但又有可能被取缔公民身份。<sup>③</sup>公民身份是一个人拥有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阿伦特所谈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A right to have right）”<sup>④</sup>。人自出生起，便有其所在的民族，因其具有公民身份，而受国家庇佑，承担作为公民的应尽之责，并得到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是人之境况的常态。这些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权利与义务，都约束在法律的限度内。法律限定了公民身份，也保护了公民权利。同样的，当公民身份被撤销，人随即失去法律状态的保护，也就失去了人权的根基。所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就将通往极权政治的路径概括为三个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sup>⑤</sup>，也就是通过取消被迫害者公民身份的方式，剥夺其获取人权的基础条件——这就是无国籍者所面临的困境。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进一步发展了阿伦特的理论<sup>⑥</sup>，他的工作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无国籍者的困境。如果我们将政治共同体内的法律状态视作人类社会的常态，那么阿甘本所关注的，就是非常态的状况，即所谓“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例外状态，本质上就是对法律状态的暂时性悬置。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涉及两个主体：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和神圣人（homo sacer）。“至高权力”就是主权者，因为“拥有悬置法律之有效性的法定权力，主权者乃合法地将他自己置于法律之外”<sup>⑦</sup>，主权者就是决定法律边界者。“神圣人”是阿甘本从罗马法中继承而来的概念，指的是在古罗马被神圣领域和世俗双重排除的人，他们“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sup>⑧</sup>，因其失去了国家的庇佑，而被视作“赤裸生命（bare life）”。因此一旦进入例外状态，常态下的法律随之失去效力，这使人普遍性地沦为“赤裸生命”，陷入一种相对的无权利境况——用阿伦特的术语讲，此时他们失去了“拥有权利的权利”。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同质性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增强了同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使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在政治待遇上陷入窘境。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欧洲犹太人。犹太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页。

<sup>②</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13页。

<sup>③</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6页。

<sup>④</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3, p.296.

<sup>⑤</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72页。

<sup>⑥</sup> 阿甘本称自己关于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思考，是从福柯的生命政治问题与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发展而来，参见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sup>⑦</sup>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sup>⑧</sup>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民族历经多次大流散，早已成为一个遍布世界的流动民族。作为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当欧洲诸国在民族主义浪潮下，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建立民族国家时，犹太人便自动地居于尴尬的“民族中的民族”<sup>①</sup>之境地了。当国家成为民族的共同体，而犹太人作为“民族中的民族”，则成为了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中的异质性残渣。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方式，蕴含着主流族群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这是反犹主义诞生的一项重要历史要素。

除了国家内部的族群问题外，民族国家体系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一种紧张关系。阿伦特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主权意味着一件事，即国际间的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而得以解决，没有其他余地”<sup>②</sup>，这一判断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一致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体两面的，主权的边界仅限于本国之内，一旦国际冲突无法通过协商处理，战争无疑是最终且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且，民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立场<sup>③</sup>，在全球交往日益繁密的当代，也加剧了国际冲突的风险。

依据前文，政治总存在于复数的人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只有当人们共同行动、彼此言说时，政治才得以显露出来，而试图取消人的复数性，以暴力破坏公共空间的事物，本质上便是非政治的。如果我们将民族视作一种人的存在单位，那么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对人的复数性境况构成了威胁。所以，在阿伦特以“复数性”为中心的政治概念下，民族国家体系是非政治的。

经过上述讨论可知，国家暴力与民族国家体系都因其对人复数性境况的伤害，被阿伦特归之于非政治的范畴，这是用哲学分析的方式解构战争的正当性。这些批判性的话语，也为其世界主义观念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反抗国家间的暴力行动、突破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性，阿伦特提出了“联邦体系”的制度构想，这既是其世界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继续深入批判民族主义的产物。

#### 四、“联邦体系”：阿伦特世界主义的制度构想

阿伦特的世界政治构想，是基于民族国家体系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所以我们还原她的世界主义思想，便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替代方案开始讨论。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伦特赞同马格尼斯（Judah Magnes）关于建立联邦国家（federated state）的替代方案，期望通过一个建立在犹太-阿拉伯议事会（Jewish-Arab community councils）基础上的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页。

<sup>②</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sup>③</sup> Hannah Arendt,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18, p272.



联邦结构，使犹太族群和阿拉伯族群得以在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进行对话，以此避免主流族群与少数族群间的权力失衡，进而化解冲突。<sup>①</sup>阿伦特认为，联邦主义不仅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有效路径<sup>②</sup>，而且也是有望成为后民族国家体系时代的世界秩序形态。她设想“在一个联邦（federation）内，旧有的少数民族问题都将不复存在”<sup>③</sup>，而且随着联邦制在巴勒斯坦的推行，“最终，一个联邦制国家可能会成为日后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建立更大联邦制结构的天然跳板。”<sup>④</sup>由此可见，阿伦特所谈论的联邦制国家不止局限于特定的领土范围，而是一个在地球上无限延展可能的区域性共同体，其最理想的形态便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因此，阿伦特对世界共同体的理解，与对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国家的理解，是同构的。

对于国家而言，政治权力往往呈现一种垂直的金字塔结构，人数众多的公民位于金字塔底，而政府权力则居于塔尖。这种垂直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大体有两种生成方式：自上而下的威权制度，或自下而上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然而，无论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权力的垂直分层总是存在的，这意味着政治空间的不同个体居于不平等的境况，而且在凝聚个体意志的过程中，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公共意见。然而，阿伦特认为，“一种一致持有的公共意见的统治，与意见自由之间，定然是不相容的。……因为在多数人势不可挡的权力下，少数的声音丧失了一切力量和一切说服力。”<sup>⑤</sup>换言之，阿伦特眼中的公共意见总具有“多数人暴政”的性质，它伴随着垂直性的权力而存在，决定了后者并非善政。

同样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制度想象，若要应对无政府状态的困境，往往需要设定一个全球性权力的所有者，然而如果此权力归之于某一个体（或国家、民族、文明）手中，以垂直的权力结构整合国际社会，就有可能出现某一种标准或意志凌驾于其他所有主体之上的情况，这就与政治的“复数性”相悖了。为了保护多样性意见，捍卫人的复数性，阿伦特选择探索一种水平性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体系。

阿伦特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面对国际冲突，“在主权国家之间，除了战争别无选择，如若战争不再能解决问题，那就说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概念。……联邦体系（the federal system）是我目力所及唯一的新的国家概念之雏形。……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议事会体系（the council system）。”<sup>⑥</sup>阿伦特所谈论的联邦体系/议事会体系，就是一个依赖人们平等承诺所形成的政治共同

<sup>①</sup>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400.

<sup>②</sup>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401.

<sup>③</sup>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336.

<sup>④</sup>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400.

<sup>⑤</sup>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1 页。

<sup>⑥</sup> 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230.



体，本质上是一种水平的权力结构。在这一制度想象中，“联邦体系”的至高权力不是超国家的（**supernational**），而是国家间的（**international**）。<sup>①</sup>

然而，恰如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指出的，诸如美国和瑞士等联邦制国家的案例，都建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民族遗产、共同的道德信念和共同政治利益”<sup>②</sup>，所以联邦制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阿伦特也认为，基于全球公共风险所凝聚成的全球共同体并不牢靠，因为“这种共同的、实际的现在，却并非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过去之上，也无法保证一个共同的未来”<sup>③</sup>，各民族异质化的民族特性似乎阻碍了联邦体系的理想。对此，雅思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与交往理论，为突破困局提供了可能。

雅思贝尔斯的历史哲学始于对基督教历史哲学的反思。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人类的历史总是始于神明的眷顾，而末日审判则成为历史的必然结局。然而，世界历史的传统不止一种，以基督教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构成了对其他历史观念的竞争性假说，换言之，它是一种拒绝与异质文明对话的历史哲学。对此，雅思贝尔斯考察了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历史传统，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论。<sup>④</sup>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东西方不同的古老文明同时萌发了哲学反思的冲动，各种经典的哲学流派喷涌而出，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走出了迈向普遍性的一步。”<sup>⑤</sup>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在历史事实方面，提供了异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无限交往”（**limitless communication**）也是一个雅思贝尔斯的哲学术语，阿伦特对它的解释是“对所有真理的可理解性的信念，以及作为一切人类对话的首要条件的展示与倾听的善良意愿”<sup>⑥</sup>，这一概念为人们相互理解、异质文明相互对话的意愿提供了哲学依据。至此，通过吸纳雅思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与交往理论，阿伦特的“联邦体系”至少在哲学意义上获得了实践的可能。

客观地说，“联邦体系”并不足以称作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设计。回望文本：在阿伦特回应犹太复国主义的系列文章中，主要篇幅用于批判犹太国家的困境，而并未给出可操作性的论证。尽管她声称联邦体系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但在文章中更多地是一种理想的倡导。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和《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Republic*）中，阿伦特不断强调联邦体系/议会体系的价值，将其视作后民族国家体系时代的希望，但她自己也承认，“这一体系是不是纯粹的乌托

<sup>①</sup> Hannah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2, p230.

<sup>②</sup>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

<sup>③</sup>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sup>④</sup> 卡尔·雅思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sup>⑤</sup> 卡尔·雅思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sup>⑥</sup>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邦——无论如何，它会是人民的乌托邦，而非理论家和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我还说不准。”<sup>①</sup>说明阿伦特本人对于一个世界性联邦国家的可行性，也持怀疑态度。

在此，笔者希望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正如赵汀阳对“天下体系”的辩护，政治理想不在现实中，而在概念里。和“天下体系”类似，阿伦特的“联邦体系”也只是讨论了“理想的可能生活所需要的可能世界的存在论条件。”<sup>②</sup>所以，对于“联邦体系”而言，相比于现实的实践性，其对于世界国家的水平权力结构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

## 五、“联邦体系”在世界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位置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一个希腊语词，本意为世界公民，后被引申为一种哲学理念，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相对。作为一个渊源深远的概念，世界主义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语境的用法都不一样，但所有世界主义观点共有的一个模糊的核心思想是，“所有人，无论他们政治背景如何，都是（或能够是或应该是）一个共同体的公民”<sup>③</sup>。世界主义的谱系与理路极为繁杂，据蔡拓的总结，仅从领域的视角划分，就有多达十余种分类方式<sup>④</sup>。本文探讨的世界主义，属于“政治世界主义”（political cosmopolitanism），关注的核心是具有超国家权威的政治模式的设计与构建，由此“保障个体在全球享有平等道德地位和权利义务的全球秩序”。<sup>⑤</sup>总体而言，形态各异的政治世界主义可以归之于两种世界想象，即世界国家与世界联盟：前者试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主权，将异质化的政治体统摄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以此实现世界的内部化；后者则试图通过国家联盟的方式，使世界各国处于稳定的合作状态，以此避免国家间的纷争。令人意外的是，尽管阿伦特秉持联邦体系的主张，但她对上述两种世界想象都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谱系中，阿伦特的观点总是有些格格不入。根据博格（Tomas Pogge）对世界主义的著名定义，西方世界主义有三个要素：一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即以个人而非任何形式的社群作为世界主义理论的价值主体；二是普世性（universality），即强调所有个体的平等地位，不因其身份差异而不同；三是普遍性（generality），即强调个体间平等地位在全球范围的适用性。<sup>⑥</sup>博格的三要素说常被认为是对世界主义的经典定义<sup>⑦</sup>，但个体主义的观点不适用于阿伦特，因为复数性的概念并不着眼于个体，而是着眼于复数个体共同存在的状态，以及主体间的关系。阿伦特对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sup>②</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对当前一些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第52页。

<sup>③</sup> 波琳·克莱因盖尔德、埃里克·布朗：“西方世界主义思想”，《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8期，第19页。

<sup>④</sup> 蔡拓：“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19页。

<sup>⑤</sup> 蔡拓：“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19页。

<sup>⑥</sup> Tomas Pogge, “Cosmopolitanism and Sovereignty”, *Ethics*, Vol.103, No.1, 1992, pp.48-49.

<sup>⑦</sup> 比如：高景柱：“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东方论坛》，2017年第4期，第60页；蔡拓：“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17页。

于传统世界主义理想的批评，也以此为前提。

阿伦特对世界联盟的怀疑态度，主要源自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提防。在1970年的访谈中，她曾表示：“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国家概念，当然，这一新的国家概念不会来自新的国际法庭的建立——这法庭或许会比海牙的国际法庭运作得更好——或者一个新的国家联盟，因为主权或者貌似主权政府间的冲突只会在那里一再重演。”<sup>①</sup>由此可见，阿伦特认为，国际联盟与国际法仍停留在民族国家体系的窠臼里，国家的权力无法在国际社会得到有效的限制，所以国家联盟的方案难有成效。

论及世界国家，则可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两种类型。竞争性的世界国家想象，是以民族国家的同质化逻辑组织世界政府，希望用某种单一的“普世价值”引导世界秩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是分析普世价值破坏性后果的精彩作品<sup>②</sup>。具体到政治实践中，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皆属此类。新保守主义以民主和平论和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对“非自由国家”抱有强烈的敌意，期望通过积极的人道主义干预（如反恐战争）以输出“民主价值观”。<sup>③</sup>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则可视作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其对非市场的经济模式报以敌意，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冷战思维的延续。<sup>④</sup>

无论竞争性的世界国家想象，抑或以国家联盟呈现的世界秩序设计，都以主权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于存在论的层面属于个体存在论，在异质文明的冲突中仍难摆脱囚徒困境。而非竞争性的世界国家想象，则以世界的内部化为己任，期望通过共在存在论的方式重构世界秩序，最有代表性的主张就是中国的“天下”理想，而这一想象与阿伦特的观点最为相近。

“天下”是一种传统中国的世界想象，也是中国版本的世界主义观点。许多中国学者都曾以“天下”的概念为中心阐发中国式的世界想象，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sup>⑤</sup>、崇明的“天下主义”<sup>⑥</sup>、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sup>⑦</sup>、刘擎的“新世界主义”<sup>⑧</sup>、陈玉聘的“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sup>⑨</sup>等等，这些学者选择的术语或有不同。比如刘擎就认为“天下”的表达具有一种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差异秩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sup>②</sup>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3页。

<sup>③</sup> 关于阿伦特思想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参见：伊莉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以及 Patricia Owens, *Between War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1-128.

<sup>④</sup> 关于阿伦特思想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参见：Patrick Hayden, *Political Evil in a Global Age: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92-122.

<sup>⑤</sup>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sup>⑥</sup> 崇明：“民族国家、天下与普遍主义”，《知识分子论丛》，2015年第1期，第40-53页。

<sup>⑦</sup>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知识分子论丛》，2015年第1期，第3-25页。

<sup>⑧</sup>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第5-15页。

<sup>⑨</sup> 陈玉聘、王欣：“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二辑》，2011年，第12-34页。

序，此中有中心-边缘之分、远近尊卑之别，于是他选用“新世界主义”的表述。但这些不同版本的“天下”观，都同时包含“四海一家”的普遍主义与“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义，期望建立一种“后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秩序——它们的要旨是极为相近的。笔者认为，在众多设计中，对天下概念挖掘最深入、讨论最全面的，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所以我们下面以赵汀阳的论述为例讨论“天下”理想与阿伦特的世界主义理想之异同。

根据赵汀阳的观察，“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争霸模式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sup>①</sup>，因为现代政治框架由“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所构成，此结构以个人为最小的政治单位，由此定义了“个人利益、个人权利、排他的利益结算方式以及相关的政治问题”。<sup>②</sup>其结果是国际无政府状态成为常态，排他性利益冲突成为政治的主题，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逻辑无力应对全球时代的新问题。为此，赵汀阳提出了“世界内部化”的问题，期望通过重新定义政治概念的方式，化解国家间看似不可协调的竞争状态。他借用老子“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的认识论和管仲“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的方法论，期望以“天下”的概念兼容世界的一切关系，因而开拓了分析世界问题的尺度。这里的“以天下观天下”是站在天下的立场看待天下的事物，“以天下为天下”则是站在天下的立场处理天下的问题。这时，国家间的分歧都统一于天下的视角，因而能实现“天下的内部化”。

赵汀阳称天下体系的存在论为“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sup>③</sup>区别于一般存在论，共在存在论主张“共在先于存在”<sup>④</sup>，意即“我”与他者的关系先于“我”自身的存在。在赵汀阳看来，人的意义不在于其存在本身，而在于人的行动以及行动之于他者的影响——只有存在于关系之中，人才能是其所是。一旦关系置于个体存在之上，人们便会将人际的共同价值置于自身私利之上，便突破了个体存在论的局限性。

不难发现，阿伦特的“联邦体系”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所面对的理论问题是极为相似的：他们的反思都针对民族国家体系的限度展开，将民族国家的症结归之于存在论问题，并以各自的方式重构政治的概念，最终选择了共在存在论的政治诠释路径。但不同的是，阿伦特的共在存在论将人的存在本身视作“二而一”的产物，以复数性作为人的存在条件，即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且人与关系在概念上是合一的。而赵汀阳则将二者分开，认为人们的关系先于人的存在。在这里，赵汀阳的关系理性将人的关系性存在凌驾于人的个体存在之上，具有一种社群主义的色彩，这是阿伦特所

<sup>①</sup>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页。

<sup>②</sup>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2页。

<sup>③</sup> 赵汀阳、H. 费格、S. 戈思帕、L. 缪勒、王惠民：“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世界哲学》，2020年第3期，第90页。

<sup>④</sup> 王路阳：“共在存在论：一个中国哲学的新解法”，《哲学动态》，2018年第12期，第43页。

不能接受的。可以说，赵汀阳与阿伦特的共在存在论，分别对应着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由主义的共在存在论观点，也可视作阿伦特的“联邦体系”在世界主义理论中的一项创见。